

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



Economics and Power

A Marxist Critique

经济学与权力

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朱里奥·巴勒莫 (Giulio Palermo) 著

范静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关注、追踪、分析、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代表性理论成果，试图为国内读者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助力。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总体面貌，进行通览性的系统介绍和解读；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些经典论题开展深入挖掘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存在矛盾和危机的内在必然性的揭示；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交叉领域开展创新话语研究。

《经济学与权力》是作者朱里奥·巴勒莫长期研究权力和“新权力”的一项最新成果。书中的第一部分批判性地回顾了经济学中关于权力的辩论，并探讨了权力与竞争的隐含本体论作为不可调和的实体，在经济领域中的运作。基于将批判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本体论和社会学，书中充分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对后瓦尔拉斯权力观念的反对。

书中的第二部分重构了马克思对竞争的分析及其在对资本的一般批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还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概念。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本体论中，竞争起着核心作用，它是调节社会和人关系的强制性机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剥削的社会强迫机制。



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



Economics and Power
A Marxist Critique

经济学与权力

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朱里奥·巴勒莫 (Giulio Palermo) 著

范静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意)朱里奥·巴勒莫(Giulio Palermo)著;范静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

书名原文:Economics and Power: A Marxist Critique

ISBN 978-7-5642-3260-3/F·3260

I. ①经… II. ①朱…②范…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7029 号

□ 策 划 陈 佶

□ 责任编辑 陈 佶

□ 封面设计 贺加贝

经济学与权力

——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朱里奥·巴勒莫 著
(Giulio Palermo)

范 静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装订

2021 年 6 月第 1 版 202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9.75 印张(插页:2) 175 千字
定价:55.00 元

图字:09-2018-398 号

Economics and Power : A Marxist Critique

Giulio Palermo

ISBN: 9781138923096

© 2016 Giulio Palermo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2021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1947/12/10

由野地

出野地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1947/12/10

总 序

习近平同志曾在 2017 年 9 月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43 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指出：“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①“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②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译的这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正是遵循着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关注、追踪、分析、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当中的一些代表性理论成果，试图为国内读者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一份助力，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最新动向，更精准地诊断资本主义的症结、批判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把握资本主义的变化脉络，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持续深入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国内理论界就已经初步开展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若干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的关注，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和阐释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到 21 世纪初，党中央领导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5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7 页。

级学科,其中专门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科学界定了这项研究工作的地位和使命,研究好国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在马言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面对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面对着中国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昂首阔步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面对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地完善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并在实践进程中不断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文明图景,让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 21 世纪的中国高高飘扬。当此时刻,通过比较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积累和当代前沿成果,尤其可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富源,我们应当像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以“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态度,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做出深入的分析,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事业。

而且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之前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十年间,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相关译介和研究的重心集中于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②。习近平同志讲话当中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阶级、危机等理论主题的阐述,也正是完全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问题域的重点关切,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学属性,指引我们在关注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成果时,必须尤其注重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同它们在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话语相结合,这样才能厘清资本主义的结构、演进过程、新形态及本质的完整图景。

由于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体系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难题、困境、波折,特别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等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冲击之下,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左翼理论家的研究、分析、批判工作尤其得到了激活,包括国内出版界也注意译介引入了一些相关论著,例如前几年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等作品就在我国引发了一阵关注和热议。但严格来说,国内这方面的努力还不够,对照马克思主义科学事业深入发展的要求,对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精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我们可以遵循习近平讲话精神,突出提炼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9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84 页。

国外马克思主义这种揭示和分析工作的两大特点：一是“新”，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做出新的批判，而不是抽象地把握既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理论和做法，将它们简单重复、搬动、套用到今天；二是“大”，是要把握住资本主义的趋势和命运这类宏大叙事，而不是纯粹学究式地沉浸在一些哲学思辨或文本考据功夫当中，或者说这种细节功夫最终一定要落实到为宏大主旨服务中去，彰显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鲜亮底色。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方面，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前提下，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分析社会现实的重要概念，比如劳动、资本、价值、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与时俱进地反思和拓展其内涵外延，从而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其论述中展现出了与经典作家和正统叙事不同的新见解，例如要结合全球化、金融化、数字化等新形态分析劳动、资本、价值、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之类范畴的构成方式 and 经济意义，这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当中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的方面，其中的许多论者注意到劳工问题、性别问题、种族问题、生态问题等与资本主义社会当中重大现实政治格局和实践走势有着紧密联系的议题，特别是注意到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的新型社会关系尝试和萌芽，阐发其理论意义，给予其理论前瞻，而这就促使许多论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抓住经济分析的切入点，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运动机制，揭示全球性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和内在对立冲突，在新的高度上再次确证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宏大前景。

上海财经大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这也是同我们积极关注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元素分不开的。例如在“论”的方面，上财学人批判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论题、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规范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研究有机统一，上财努力成为国内推进政治经济学学科范式创新的代表性学术高地；在“史”的方面，上财学人积极构建科学全面的评价话语体系，以程恩富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为代表，纵览世界范围内的代表性学术流派，给予深入分析和公正评价，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发展性；在“人”的方面，上财学人在研究工作中注意同大卫·科兹等一批当代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持密切往来，多次邀请这些学者前来讲学交流，包括引进他们所培养的优秀青年学人加盟上财团队，保持上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朝气和活力。那么同样地，我们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和借鉴也要体现在“书”的方面，我们以上海财经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的学科建设为依托,系统筹划,遴选出9部具有代表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甘做冷门,甘坐冷板凳,以追求真理的热忱将之译介给中国读者,以求开阔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这9部著作^①的研究方向和阐述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总体面貌,以及政治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和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进行通览性的系统介绍和解读,带有一定的教材性质。《劳特利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ian Economics*)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著名的通识读本“劳特利奇手册”的一员,全书37章依次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经典到前沿的一系列研究课题的基本内容、研究情况和发展动向,由当今英语世界学界的骨干学者亲自撰写,十分便于读者了解当今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马克思主义体系:经济、政治与社会观》(*The Marxist System: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则对马克思思想中的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卓越的阐述,并着重对其政治经济学要义及相关思想脉络做了翔实的回顾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s*)充分借助了数学分析工具和图形推演,对劳动价值理论、货币增长、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等丰富的话题开展了细致的探讨,从而使得本书无论在分析方法上,还是在结论呈现上都有着独特的价值。

第二个层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一些论题的深入挖掘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存在矛盾和危机的内在必然性的揭示。《价值、技术变革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探索》(*Value, Technical Change and Crisis: Explorations in Marxist Economic Theory*)针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些重要主题,如价格、价值、利润、工资、剥削等进行了系统评述,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完善这些概念,充分结合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时代性。《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稀缺性、劳动与金融》(*Marx's Crises Theory: Scarcity, Labor, and Finance*)为解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展示了如何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去严格分析各种资本要素,进而揭示了这些要素之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矛盾和未来发生经济危机的内在必然性。《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作的新视角》(*Globalis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以一种宏大的政治经济史框架来开展研究,帮助读者以全球视野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

① 因本译丛各书的翻译和出版存在时间的先后,因此,所涉各书名以该书出版时为准。

之处,充分体现其先进性和科学性,并结合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内容,向读者展现了《资本论》等巨著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深入剖析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

第三个层次,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交叉领域开展的创新话语研究。《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Economics and Power: A Marxist Critique*)探讨了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对于“权力”和“竞争”等经典概念的创新阐释,分析了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极端自由契约主义,作者的观点充分基于“批判现实主义”哲学,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中的权力与高压政治的解释。《知识与阶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则采用某种“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对辩证法、矛盾、知识、真理、阶级和资本主义等核心概念做出了重构性的阐述,力求突破各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视野,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做出了新的构建。《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Second Edition)*]主张以具体的雇佣劳动为主线建构起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型叙事,突出人的需要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之间的内在关系,其理论话语颇有启示价值。

具体就《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一书而言,可以将其视为作者朱里奥·巴勒莫长期研究权力和“新权力”的一项最新成果。作为一本原创性著作,书中充分发展了不同视角下的批判观点,探讨了权力在资本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权力与竞争是密切相关的。

作者认为,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是通过资本决定法律的主要胁迫机制,冲击社会对资本的需求,控制社会阶层的产生,以及管理权力在个体关系中的平衡。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相比于其他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权力关系产生并且存在于竞争法则中。竞争是人们理解资本主义权力的唯一要素。

书中的第一部分批判性地回顾了经济学中关于权力的辩论,并探讨了权力与竞争的隐含本体论作为不可调和的实体,在经济领域中的运作。通过逐步的阐释,作者揭示了这一概念正是通常所称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基于将批判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本体论和社会学,书中充分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对后瓦尔拉斯权力观念的反对。

书中的第二部分则致力于将这一重要的思路发展成一个有机的概念,重构了马克思对竞争的分析及其在对资本的一般批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还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概念。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本

体论中,竞争起着核心作用,它是调节社会和人关系的强制性机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剥削的社会强迫机制。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推动研究分析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话语,进一步推进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事业。

我们诚恳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对我们的译文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鞭策我们保持初心、砥砺前行!

章忠民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

2021 年 6 月 18 日

序言和致谢

本书是长期研究权力和“新权力”的一个结果，来源于1997年我的经济学博士答辩论文。^①从那时起，我发展了不同视角下的批判观点，这本文记录了过去的争论，可以说是一本原创性著作。

这些年为了努力保持我的批判观点的延续性以及解决与学院派的争论，对抗后者基于权力的机械主义和他们本身在资本主义系统中所扮演的社会和经济角色，已经导致我非常不愉快地被孤立了，还有来自学术机构和审查的压力。^②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原因。

自然地，我的思想在这些年已经被学术的争论所影响，我的著作也受益于很多学者的评论和批评。但是学术争论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社会。没有院士可以直接发展一种关于权力的批判性观点而不成为与权力作斗争的一分子。与其提到对我帮助重大的教授和学者，我更愿意记住那些与社会强制条件继续斗争，并从禁锢它的权力机制中争取自由批判性思维的所有同志。这是反资本主义的行为，包括所有的形式和发展，并以此奉献给我的读者。

在这本书中，我也引用了一些之前我已经发表的文章，非常感谢《剑桥经济学杂志》、《资本和阶级》、《经济问题杂志》、《经济学方法论杂志》和《科学和社会》给我自由使用下列文章的权利：

① 协调、竞争与经济权力：“新权力”在国家、企业与市场关系分析中的理论界限，博士论文，罗马大学。

② 除了参与政治斗争，在大学内外，我还批评意大利大学系统中的权力作用，在意大利政治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出版了两本书：(1) *L'università dei baroni: Centocinquant'anni di scoria tra cooptazione, contestazione e mercificazione*, Milano: Punto Rosso, 2011; (2) *Baroni a portaborse: I rapporti di potere nell'università*, Roma: Editori International Riuniti, 2012.

朱里奥·巴勒莫(1999):奥地利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收敛性:方法论的非连续性和政治动机,《经济问题杂志》,第33卷,第2号,第277—285页。

——(2000):经济权力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形式:两个复杂的问题,《经济问题杂志》,第34卷,第3号,第573—601页。

——(2007A):权力的误解: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到鲍尔斯和金蒂斯,《资本和阶级》,第92卷,第147—185页。

——(2007B):资本主义中权力的本体论: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剑桥经济学杂志》,第31卷,第4号,第539—561页。

——(2014):权力的经济博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经济学方法论杂志》,第21卷,第2号,第175—192页。

——(2016A):权力、竞争和自由贸易模型,《剑桥经济学杂志》,第40卷,第1号,第259—281页。

——(2016B):后瓦尔拉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科学和社会》,第80卷,第3号,第346—374页。

目 录

总序 / 001

序言和致谢 / 001

第一章 简介 / 001

第一部分 经济学中的权力

第二章 对权力的经济学辩论 / 021

第三章 权力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 / 042

第四章 权力去神秘化 / 055

第二部分 关于资本主义权力和竞争的 强制性法则的本体论

第五章 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 / 077

第六章 作为权力运转的资本主义 / 102

第七章 结束语 / 130



第一章



简介

本书讨论的是权力在资本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两个方面,权力与竞争是相关的。根据马克思(Marx)的观点,我认为,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是通过资本决定法律的主要胁迫机制,冲击了社会对资本的需求,控制了社会阶层的产生以及管理权力在个体关系中的平衡。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其他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权力关系产生并且存在于竞争法则中。竞争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权力的唯一要素。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权力也与竞争相互联系,但奇怪的是,这种联系是一种对立的因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非正统的发展理论将权力认定为完全竞争的否定因素。在完全竞争的统治下,强调没有人的权力是高于他人的。因此,它们并没有通过竞争去了解权力是什么,而是将权力定义为不是什么。无论如何,竞争的力量以及这一概念的核心只是作为一个负面的基准而存在。

一方面,权力取决于“积极”的竞争,因为在资本主义中,竞争本身就是一种胁迫机制,它规定了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动态。另一方面,它取决于“消极”竞争,因为作为一项定义,后者被设想成无权力关系的标准。在界定我的策略并且探讨权力的研究之前,有两件事应该是已经明确的:第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权力的态度不能从竞争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所扮演的强制角色中抽象出来;第二,关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竞争概念的系统性批判不可避免地也是对这个定义中关于竞争影响力的一个批判。这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经济学权力的一本著作不可避免地也会成为一本关于竞争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这种讨论明显是悖论——事实上,由于它的存在,了解权力、竞争才是至关

重要的,而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这也是这本书的主题。我的科学目标是双重的:首先,不只是在抽象的术语,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了解权力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其次,要解释为什么这种关系表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二分法。正如马克思在阐述竞争和平等交换背后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时一样,我的目的是解释资本主义力量在竞争和自由互动背后的本质。我的论点是,权力和竞争在资本主义中并不是真正的对立,而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表现资本的本质和外观。

像所有的生产模式一样,资本主义有其具体的工作和再生产机制,以便于对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胁迫和权力压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再生产过程中,主要机制是竞争。因此,竞争也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负责各种形式的权力和胁迫机制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一个神秘的系统,其在人际交往中的个人自由的表象,往往会混淆阶级关系的剥削性质。竞争是表象与本质之间的这种矛盾所存在的特点。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是关于竞争的抽象分析,同时也是对竞争在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种理性批判,它允许解释其明显的无权力内容和基本强制性质。

权力作为竞争的否定代表反而是普遍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进一步导致其在抽象、历史、条款处理甚至权力问题中产生一定的后果。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自我产生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自我发展的生产模式而进行描述,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中的权力关系并没有进行简单的调查,但作为一套经济规律将永存。这些普遍的规律中的第一条就是竞争。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竞争是经济现象的毁灭,它是解释一切的普适原因,但无法解释这是一种基于个人自由和自发互动的自然条件。从逻辑上讲,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权力”只作为关于自由权力的普遍概念中的一个例外,更一般地,正是在这个概念中本质与现象没有区别。

在我尝试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和竞争的概念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与竞争不同,权力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是一个关键类别。马克思并不直接关注人际关系的权力内容,而是关注资本。他的想法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积累的法则决定社会关系。因此,在解释这些社会关系之前去讨论权力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竞争是这个社会法则的一部分。如果权力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处于前列,那是因为从逻辑上讲,这个问题只能在对资本和竞争进行批判讨论后才能被探讨。

当然,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权力研究方法并不遵循马克思的方法。相

反,它从原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的神秘概念中发展出了它的权力概念。因此,我对这种方法的批评只不过是试图通过发展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以及显示资本强加于社会关系的强制形式,来揭开这种权力概念的神秘面纱。

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从批判到建设性的角度,发展权力和强制的有机概念,最好的办法不是直接关注权力,而是发展它对竞争的批判。只有充分理解了这种生产方式下竞争的强制性特征,我们才能严格地解释强制和权力影响社会和人人际关系的不同层次。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首先介绍关于社会科学权力的辩论。这次辩论是围绕“精英主义者”和“民主多元主义者”之间的一般争议展开的。前者争辩说,在资本主义中,权力集中在小部分主体的手中;而后者则认为它存在于社会中,没有显著的不对称。

然后,我专注于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辩论是“浅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忽略了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许多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将完全竞争与无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从而将关于社会中权力角色和权力集中的争论转化为关于完全竞争在经济中传播的争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到了竞争无处不在,激进分子认为它是现实世界中罕见的例外。然而,这些明显相反的观点,汇集在同一个观点上:只有在完全竞争是不可能情况下,权力关系才会发展。

在介绍了学术辩论之后,我会讨论方法论和本体论问题,这些都是我的批评和我的建议的基础。

首先,我专注于权力的解释性类别的选择。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这些范畴并非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关系的分析,而仅仅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副产品,此方法论是该经济学派唯一严谨的方法论。马克思的批判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解释类别和方法论的选择明确地建立在本体论论点的基础上。他对资本的批判不是简便方法论的结果,而是对资本主义基本范畴的本体论研究的发展。商品、价值、货币、社会阶层和所有更加复杂类别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抽象的以及方法上简便的概念进行介绍,而是作为资本主义本体的必要实体而引入的。

其次,我将讨论这些类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作用。尤其是,我特别分析了阶级关系、剥削、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的权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我表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胁迫和人类权力是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然而,从逻辑上而言,在资本主义中社会强迫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人类的权力,而是取

决于社会阶层。

最后,在这些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前提下,我阐明了我的策略,即从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开始,揭示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神秘性,并阐述资本主义权力的另一种概念。

在最后一节中,我将介绍这本书的结构。

社会科学中权力的维度

“权力”这个主题最早主要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进行研究。在这些调查研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68, Vol. 1, p. 53)将权力定义为,无论是否存在阻力,一个人都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①在学术辩论中,这一定义主要研究当其他人都公开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才能够在社会关系中做出他/她的决定。^②

辩论产生于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er, 1953)、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 1956)、埃尔默·沙特施奈德(Elmer Schattschneider, 1960)的作品中,他们认为,在美国,权力是不对称分布和集中的。论文引起了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 1961)和纳尔逊·波尔斯比(Nelson Polsby, 1963)的注意,并通过一些实证分析而得出结论。他们认为,在美国社会中,权力的多元化传播已经非常普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对立的定义都是这些作者基于韦伯的定义而建立不同理论框架的结果。例如,在达尔的框架中,行使权力的前提是两个或更多的群体有相互冲突的偏好,并且他们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条件下,作者假设的是任何人都是没有余地行使权力的。

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 1974)在他的著作《小而有影响力》中指出,一种权力的限制性概念可以被称为“一维的权力”,它确定了另外两种权力观点:由彼得·巴赫拉奇和莫顿·巴罗兹(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Baratz,

① 英语翻译可能会误解术语“机会”(翻译为“概率”),但也意味着“机遇”。

② 政治科学中的权力问题常常与福柯(Foucault)的工作有关。在他的分析中,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绝不会构建一个权力理论(福柯,1990, p. 39)。在福柯(福柯,1980, p. 93)的概念中,权力存在于纯粹的名义下,而不是从任何实质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关系的属性。正如卡曾斯和侯赛因(Cousins and Hussain, 1984)所注意到的,福柯的主要兴趣不在于什么是权力,而在于它是如何行使的。正如福柯(福柯,1977, p. 26)所说:权力是用来行使而不是拥有的;“它只存在于行动中”(戈登,1980, p. 89)。他也没有兴趣量化和争论是否存在任何可量化形式的权力。

1962, 1963, 1970)提出的“二维”观点,以及他自己的“激进”或“三维”观点。^①

巴赫拉奇和巴罗兹(1962)的第二个维度的权力——他们称之为权力的第二个“面”,包含对集体决策的目标进行约束的能力。如果A设法将决策的范围局限于特定的问题,并且阻止B提出可能不利于他/她自己的偏好的问题,则A实际上是对B行使权力。在这个更广的范围内控制议程理论框架,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形式。这使人们怀疑民主多元论的一般合理性。^②

但是,对卢克斯来说,此二维观点依然是不足的。他认为,政治议程不一定受特定个人的有意行动的控制;它取决于集体行动和组织系统(系统效应)的形式。此外,权力的概念不应局限于可观察到的冲突,因为对个人的权力也可以通过影响、塑造或决定他/她的迫切需要来行使。在这个框架内,即使没有抱怨,也不意味着有真正的共识,因为那些掌权的人可能无法表达自己真正的兴趣,甚至可能不了解这些。最重要的是,个人选择可能存在强制形式,这取决于决策制度的整体结构,不能归因于任何个人的行为。

除了这些作为人际交往的关系概念之外,卢克斯(1974, pp. 31—37)批评了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57, 1963A, 1963B)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70)阐述的概念:

他们专注于惯用语“权力”,忽视了“政权”。因此,权力指的是“能力”“设施”,而不是“关系”。因此,权力的冲突方面,即对人的行使完全从观点中消失了。

(卢克斯, 1974, p. 34)

卢克斯还坚持认为,通过“权力”的概念可以更清晰地表明自己是立足于“权”的概念。

虽然我对经济权力的分析是尝试发展卢克斯的三维观点,但我认为重点不在于确定关系的权力概念(“对某人的权力”)是多于还是少于一般性的有倾向的概念(“行动的权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由不可观察的结构和机制来管理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研究“系统效应”的唯一方法,卢克斯本人认为这是他激进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问题是要正确地指出管理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系统性影响。与其他

① 在卢克斯的书出版之后,这一关于权力的“维度”的辩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几乎已经成为典范。然而,权力的“维度”这一术语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它表明权力是一种向量,它的单个元素应该是相互独立的。

② 在对巴赫拉奇和巴罗兹的批评之后,一维的观点得到了沃尔芬格(Wolfinger, 1971)和波尔斯比(1980)的捍卫。

在道德、正义或民主中寻求的方法不同,我关注经济,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程强加了资本主义的权力和强制的基本形式。在我对马克思的解释中,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也是制约社会发展、限制自由行动、在人际关系中加上资本印记的机制。因此,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批判来看,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权力观。这并不是说文化、政治、道德或宗教领域与权力无关。相反,为了理解上层建筑在其不同的历史形态中的强制作用,我们首先必须解释资本主义权力的一般形式,因为它们源于这种形式的本质,即剥削关系。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批判,即使像卢克斯(1985)这样的批判作家也会将权力和“真正的自由”对立起来,并将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自由描述为真正的自由。事实上,卢克斯对唯物史观持批判态度。在引入系统效应作为其三维观点的基本要素之后不久,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卢克斯,1974,p. 26)。然而,当他在资本主义中发展他自己的权力观时,他撇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卢克斯(1985,2005)在他的著作《自由交流与竞争的解密》中,没有遵循马克思的理论,而是发展了一种权力和自由的概念,而这种概念直接否定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任何具体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巴托莫尔,1983)关于“解放”的条目中,巴托莫尔总结道,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特别是在列宁之后,并没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把握形式自由的角色,并且倾向于否认资本主义中真正自由的可能性:“自由贸易是有限自由的,因为它基于资本的统治,因此同时也是彻底的所有个人自由的暂停。”(《资本论》,笔记6,企鹅出版集团版本,p. 652)“……这样的表述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并且实际上已经非常糟糕。”(卢克斯,1983,p. 173)

然而,这个重要的结论只是卢克斯在他自己的权力观念中,用独特的方式说明系统效应的结果。从理论上讲,他淡化了经济的作用,更笼统地说,他质疑历史唯物主义,质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逻辑区别(卢克斯,1982)。因此,权力似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文化、道德、法律和政治——相关,没有任何明确的优先权。经济基础只是许多可能的权力来源之一,其具体的剥削性质变得无关紧要。在这个概念中,一个人可以合法地寻求竞争和真正的自由之间兼容性的条件。但这只是假设竞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涉及任何胁迫,最终问题出在政治、法律或文化领域,就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神秘概念一样。

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和在这种生产模式下解放过程的发展——权力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家的动机——是科学问题和紧迫的政治挑战。但是,只有在理解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强制性经济形式和竞争带来的幻想之后,这些过程才能一致地

发展。这是现代权力理论的主要缺陷,即使采用了最先进和最激进的表达方式,而这也是我打算填补的空白。

但现在我们必须讨论的是经济学家如何更好地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胁迫作用这一问题上,事实上,他们仍然依附于一维观点,而不考虑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批判性辩论。

经济学中权力的一维观点

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权力的争论主要是作为解释“公司性质”的子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37)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会有等级制的存在?企业内的协调机制是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解决。然而,对演绎主义的接受,尤其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接受,造成了严重的限制,使一维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是在经济异端的重要部分里也是如此。从元理论的角度来说,即使是致力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比如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学派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发展出了同样的一维观点,与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无法区分。

一维观点包括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市场力量的分析,阿芒·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的契约方法,科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Coase and Oliver 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奥利弗·哈特和约翰·摩尔(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的产权方法,以及其他内容。部分制度经济学观点和激进学派接受方法论个人主义,即使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理论挑战,并且会根据不同作者进行个性化处理,如维克多·戈德堡(Victor Goldberg)、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等人。

如果我把那些经常被认为是相互竞争的理论整合起来,那是因为它们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预设了相同的本体论。在本体论上,这些理论假设完全可以通过与现实相吻合的实证方法来检测。在方法论上,它们通过将经验现象减少到系统中最小的单位来寻求(它们认为的)解释,这些单位被假定为彼此独立,并且系统是它们所属的系统。这些单位都是理性的经济主体。虽然这种方法论侧重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但这两个对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在此本体论中,资本家和工人都只是个人。因此,他们在公司内部的最最终权力关系并不是所谓的资本—劳动关系,而是存在于他们个人的固有品质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环境特征中。

例如,新制度主义通过假设权力关系自发地从不完美的环境中的不完美个体的相互作用中出现,来解释资本主义等级制的起源。威廉姆森(1975, p. 21)的理论始于这样的假设:一开始就有市场的存在,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能推导出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出现的等级制度。他的“解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个人具有不同的天然禀赋,如“不平等分配的管理才能”、“演讲天分”、“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技能”(威廉姆森,1975, pp. 47—52),并且它们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相互作用。

然而,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不是以强制形式出现的说法在历史上没有记载,而是以演绎的方式论证。威廉姆森的问题不是去调查已经有效地发生了什么,而是要找出使一个机构优于另一个的条件,且(不合理的)假设总是自动选择效率。在这个概念中,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不存在的情况下,等级制度才能存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不对称性才能在个体之间产生直接的权力关系。

这个构想与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权力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人际关系被假定为不存在权力关系,并且权力关系产生于完全竞争并不存在的实证条件下。^①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是以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不存在完全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为前提的。因此根据这种方法,权力关系只能存在于这些“完全”条件之外。从经验上讲,它们必须在人际关系中寻找,其特征是在决策环境中存在某种不完善。因此,在资本主义和其他任何生产和交换模式中,不完美才是权力产生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方法中,每一个权力理论家都可以自由地将其视为规范或经验的稀缺性。但是他们都认可:没有不完美,就没有权力关系。

方法论的选择和本体论的重要性

从逻辑上讲,可以解释权力关系性质的类别选择,是任何权力方法最初的问题。然而,在关于权力的辩论中,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被讨论过。相反,抽象的个人和他们应该相互作用的抽象决策环境是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简单后果而被引入的,后者被认为是一种批判性的经济理论方法,没有任何本体论的

^① 这种权力概念也可以推广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杨(Young, 1995)表示,虽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是自由的竞技场,其中互动纯粹是自愿的,但他们的资本主义概念不涉及权力关系的先决条件是原子论和竞争。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批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市场进程概念在解释个别计划的趋同性时,忽视了权力关系。

辩护。

但是,解释类别不能只是为了方便方法论的选择。首先,我们必须发现资本主义“必要的”本体论实体,这些实体是系统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逻辑上讲,这些实体的存在是因为该系统基于它们,通过它们的自发行动,系统可以实现再生产。私人财产、阶级、资本及竞争不是一般抽象的概念。它们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实体,它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假设的,而是由它们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发挥的必要作用所证明。

考虑一下阶级关系。它们在马克思批判中的核心作用不是先验方法论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简单的本体论论证的结果:没有劳动力的买卖双方,资本主义就无法自我复制。科学的问题是解释控制这些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以及这种社会不对称对劳动力购买者和销售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后果。

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有关。但是必要的关系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单一人际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重要:他们每个人都可能会终止关系,但是资本主义仍然会继续下去。只有一般的资本—劳动关系才是资本主义运作所必需的。这是阶级关系对这种生产模式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体论的论点也提出了分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单一人际关系的一般方法。这些人际关系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具有自主性,但它们总是受到社会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关注孤立的单一关系,而必须从对所有关系进行约束的一般关系开始的原因。

现在考虑一下新古典主义方法是如何分析涉及权力的典型人际关系的:老板与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关系。通过将这种人际关系与社会系统隔离开来,前者与后者之间的最终权力关系似乎必然是某些相互作用的结果的特征。显然,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天真的假设排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会造成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作用——按照一个是老板、另一个是工人的事实;甚至使他们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剥削概念变得荒谬可笑。

然而,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不受任何本体论论证的支持。老板和工人的信息集和技能之间的不对称只是应该存在,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要性。这里对老板如何获得超人的才华和技能不做任何解释。相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对称已经存在,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对称,才会导致一个人成为老板而另一个人成为工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天生的不对称发生了变化,或者决策制定环境中的一些不完善之处从一方面演变为另一方面,那这个理论意味着,老板也会变成一名工人;反之亦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抽

象世界,但不是资本主义。

在本体论中,老板和工人不仅是天生具有适应不完美环境的认知能力的个体,而且是对立阶级的成员。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出现在一个抽象的(完全的或不完全的)情境中,个人不仅是在同一地点相遇,而且是在资产阶级体系中相遇,这是一种基于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历史生产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在引入“不完全”之前,有必要充分促成这种社会不对称的原因。在不需要想象不完美的决策环境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力量可以被解释为强加给工人阶级的社会胁迫的一种表现:在工作场所,老板的命令与工人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因为一个人更好或者比另一个更聪明,而是因为一个是剥削阶级的代理人,要努力完成他的角色;另一个是被剥削阶级的成员,“一个人把自己的皮囊带入市场,没有期待,只是隐藏着”(马克思,1867, ch. 6)。知识和认知技能可能与工作场所中的等级职位相关,但这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结果,而无法证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资本主义权力的特殊性确实是谁更有知识或认知技能无关紧要: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代理人的命令,工人都得服从,即使前者是文盲,而后者有博士学位。

从一开始,选择“不完全”作为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解释方式就是误导性的。缺陷可能为解释资本主义的强制力量增加有用的因素,但不能成为这些力量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即使没有它,资本主义也可以发挥作用和发展。

相比之下,如果没有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甚至无法启动。如果他/她可以选择没有任何工作义务的经济租金,那没有人会在剥削条件下选择一项陌生的工作。如果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确实存在于这个体系中,他们都会选择成为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并且在开始之前系统就会崩溃。在添加新的也是不必要的权力和强制的解释类别之前,我们必须分析源于这种资本主义本质关系的权力和强制形式。这些形式的权力和强制在资本主义中是必要的,正如解释它们的类别一样。由于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不相容而抛弃社会阶级的做法,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资本主义权力的核心。

如果我们不讨论权力的社会性质——由历史决定的社会,由历史决定的再生产机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具体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权力会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我们可能在各种可能的不完善条件下,把对人际权力的分析无限放大,但在方法论上,这种做法无法阐明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胁迫,以及资本主义相对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历史唯物主义观、剥削和社会胁迫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对权力在人际交往中的普遍原因的研究是一个空洞的问题。权力关系是社会组织模式的一个结果,并且随着后者的历史变化而发生改变。社会并不是普遍和永恒的,而是具有历史决定性,所以权力关系也是如此。科学的问题不是要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孤立出一个特定的人际关系,并根据一个特定的定义来验证其最终的权力内容,而是要解释不同形式的胁迫,它们象征着不同的社会组织的历史模式。

在社会组织模式的不同方面,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讨论生产与交换的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的规则相对应的再生产模式。生产和再生产的规则对社会成员施加各种形式的胁迫。因此,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权力和胁迫的具体形式,我们必须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Marx and Engels)对劳动分工的发展如何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了历史和理论上的研究。家庭的转型、内部组织、社会和生产过程中的角色、私有财产和社会阶层的出现、国家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恩格斯,1884)。正如他们所主张的,这些历史变革并非随波逐流,而是由特定的经济力量和机制所控制和指导。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没有必要把这些力量和机制的作用抬得太高,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机械决定因素。但我们也不能认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历史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

所有阶级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剥削。剥削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产生:例如,在封建制度下,它通过地主对工人的直接权力关系确保由后者去为前者劳作。在资本主义中,马克思表示,这种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并不直接发生在人际层面。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批判有必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虽然资本主义剥削从表面上看是无形的,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逻辑结果。它的存在是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独立于个体之间的关系。

剥削的存在对权力和胁迫有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胁迫存在,剥削是不可能产生的。对各种形式的胁迫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社会阶级的资本主义权力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它等于假定社会阶级——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存在剥削的原因——与强迫一个阶级的成员为另一个阶级的成员工作的机制没有关系。

在不同生产模式中,针对剥削发展而来的各种形式的胁迫也是不同的。但

每个阶级社会都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胁迫以确保剥削阶级的生产。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的其余部分。因此,像剥削一样,社会胁迫也是阶级社会的必要范畴。它的存在主要不是经验证据的问题,而是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在一些生产模式下,它可能采取一套凭经验可测的人际权力的形式,但这也只是一个可能性,不是必要性。从逻辑上讲,社会胁迫先于权力泡沫,最终可能出现在人际层面。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方法不能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问题。问题不在于解释具有自然交换倾向的孤立个体是如何决定互动,并最终建立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是发现各个阶级社会的特定的社会胁迫形式,以及对剥削关系的通行模式进行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说是寻求共性的力量和它们的历史原因(如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或有限理性),还不如说我们必须发现某种形式的胁迫是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必要条件。

为了捍卫方法论个人主义,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科学劳动分工,根据这种分工,应该可以以方法论的形式来研究现有的社会胁迫形式。从数学上来说,如果社会胁迫和个人权力被附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方法论的结果就可能要加在一起。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其偏好性,而不存在误导性;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的权力会并肩存在,但一个人绝对不会影响或者调节另一个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将是自然的补充,每一个都遮蔽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不幸的是,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其他关系。因为它们不是独立的个体,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相反,它们是严格的相互依存和辩证的关系。社会胁迫通过大量的人际权力关系进行运作,并被这种关系复制。人际权力的存在形式反过来又表现为社会普遍存在的胁迫。这是我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研究社会胁迫和权力关系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资本和权力的批判

发展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能力的辩证关系的尝试引发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在研究社会胁迫和人际权力之间,哪一方面是正确的、简单的或最便捷的?和马克思一样,我不认为可以选择方法论为这项研究提供便利。相反,它必须在本体论上得到辩护。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的想法是通过讨论由资本积累产生的权力形式和胁迫,来发展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从本体论出发,马克思清楚地区分了“社会总资本”和其得以形成的众多

“个人资本”。正如我们在对竞争的批判中看到的更多细节一样,它们都不是纯粹的抽象。它们都存在于现实中,问题在于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是如何辩证地发展的:社会总资本的发展是如何将其逻辑强加于其单一组成部分的发展之上的,以及个人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具体地改变社会总资本的范围和组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采用的一般方法论的明显错误是要切断这一辩证关系,否认任何本体论和方法论对社会总资本的作用。在他们的概念中,资本仅作为一组独立的单个资本存在,对资本积累的研究被归结为对个体资本如何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的分析,这种相互作用下的结果不受社会约束的隐含和错误假设的限制。

针对这一概念,在对资本竞争这个问题开展研究之前,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他首先解释了社会总资本的发展规律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这一系统性发展是如何将其规律强加于个体资本之间的关系之上的。马克思以《资本论》的前两卷来对社会总资本进行分析,之后才在第三卷对资本竞争进行分析。

通过保持社会总资本的水平,作为剥削过程开展的必要条件——社会胁迫——已经显示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不对称权力关系,而是依赖于社会总资本的存在。

然而,作为一套人际关系的前提,对权力的适当研究是第二步,即向个人资本之间关系层次迈进。在这里,竞争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不是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所暗示的那样作为没有权力关系的基准,而是作为资本规律的执行者。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是否真的是一个没有权力关系的世界,或者没有社会胁迫的世界,取决于这些资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它们是不可见的,如果没有对社会总资本的批判,那就很容易遵循它们根本不存在的假设。这直接导致了一种神秘的概念,即竞争似乎是自由和平等的最佳保障。

有了这些前提,我的批判逻辑就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可以分解为三个重要的逻辑:社会总资本的批判、竞争的批判以及这两个的综合,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神秘系统的批判:

1. 对社会总资本的批判往往都是先于对竞争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

2. 他对竞争的批判表明,在流通领域中,剥削是如何变得不可见的。在流通领域中,个人资本似乎是自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受约束的,仅仅由

竞争和平等交换来调节。

3. 综上所述,马克思批判的这些独立但必要的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隐藏在竞争和平等交换面纱后面的剥削制度的神秘本质。

这种对资本的明确批判,对权力和胁迫有直接影响:

1. 阶级剥削的前提是存在通过社会阶级运作的社会胁迫形式。这些形式的胁迫不依赖于竞争,并且在逻辑上先于竞争。

2. 然而,社会的胁迫在流通中是不可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相互独立的(也不受阶级剥削的一般关系的影响),只受竞争和个人自由的约束。

3. 在它们的统一中,这两个批判的情况显示了资本主义的神秘性,是一种隐藏在竞争和个人自由面纱背后的社会胁迫制度。

这一逻辑结构也揭示了新古典主义权力理论家提出的神秘概念的逻辑渊源。他们否认生产与流通之间任何逻辑上的分离,而且像老派的庸俗经济学家一样,解释称所有经济关系是无限循环的。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步骤如下:

1. 阶级剥削和社会胁迫不仅被忽视,而且被假定为不存在。

2. 因此,竞争并不被视为生产中剥削和胁迫关系的神秘表象,而是普遍存在于经济的平等交换和个人自由中的真实图景。在这个概念中,权力只能作为违反竞争法则的行为而存在。

3. 这两个情况的统一为资本主义作为个人自由体系的表象提供了一种复杂的合理解释,在这个体系中,权力只存在于由于缺乏竞争而导致的最终缺陷之中。

本书的其他部分就是在发展这种逻辑,首先是对新古典主义权力概念的批判,之后是尝试在资本主义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权力和胁迫的历史观。

本书的结构

我从第二章开始,会批判性地回顾经济学中关于权力的辩论,并讨论权力与竞争的隐含本体论作为不可调和的实体在脱节的经验领域中的运作。在第三章中,我认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更广泛的科学项目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因此,它不能逃避后瓦尔拉斯研究项目的内部问题。在第四章中,我转向了外界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我的目标是打破竞争产生的幻觉(并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来合理化),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并非是一个理想的无权力社会。我的批评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本体论和社会学。在每一个方面,我都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我反对后瓦尔拉斯的权力观念。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把这条关键的道路发展成一个有机的概念。在第五章中,我重构了马克思对竞争的分析及其在对资本的一般批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概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和竞争理论的关键和建设性的要素被推翻了。马克思的批判和对新古典主义概念的批评是马克思整体构想的必然结果。在第六章中,我用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来发展资本主义中的权力和胁迫本体论。我认为,在资本主义本体论中,竞争起着核心作用,它是调节社会和人关系的强制性机制。它并不是无权力关系的保证者,而是一种经济剥削的社会强迫机制。

最后一章提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权力和竞争观念将如何改变科学研究和政治斗争方向的问题。提出科学和政治问题不仅是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的力量,而且是为了在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改良主义中扭转霸权主义倾向,以将资本主义胁迫的本质形式视为是自然的,而其发展是不可抑制的。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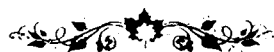
- Arendt, Hannah (1970), *On violence*,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Baratz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6, n. 4, pp. 947—952.
- (1963),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7, pp. 632—642.
- (1970), *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ttomore, Tom (1983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 4, pp. 386—405.
- Cousins, Mark and Athar Hussain (1984), *Michel Foucault*, Basingstoke, Macmillan.
- Dahl, Robert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ngels, Frederick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4/origin-family/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enguin.
- (1990),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New York, Routledge.
- Gordon, Colin (1980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by Michel Foucault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 Hunter, Floyd (1953),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Lukes, Steven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 (1982), Can the base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uperstructure?, *Analyse & Kritik*, vol. 4, n. 2, pp. 211—222.
- (1983), Emancipation, in Bottomore, Tom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985),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Power: A radical view—The original text with two major new chapters*, 2nd ed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Marx, Karl (1867),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l/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Mills,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lermo, Giulio (1998), Economic power and the market process: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convergence of Hayek and Kirzner, *Revista de Economia*, vol. 24, n. 22, pp. 49—77.
- Parsons, Talcott (1957),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 *World Politics*, vol. 10, pp. 123—143.
- (1963A), 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7, pp. 37—62.
- (1963B),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7, pp. 232—262.
- Polsby, Nelson (1963),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Ha-

- 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0), Potere locale e democrazia: Una critica empirica ai neo-elitisti, *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vol. 10, n. 1, pp. 149—166.
- Schattschneider, Elmer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Wolfinger, Raymond (1971), Non-decisions and the study of loc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pp. 1063—1080.
- Young, David (1995), The meaning and role of power in economic theories, in Groenewegen, John, Christos Pitelis and Sven-Erik Sjöstrand (eds), *On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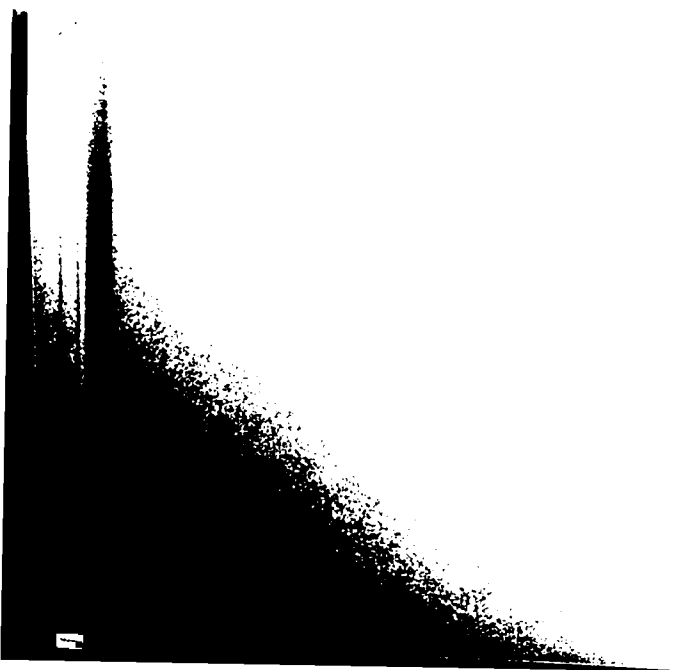


—— · 第一部分 · ——



经济学中的权力

作者：[模糊]
译者：[模糊]
出版社：[模糊]
[模糊]
[模糊]



第二章



对权力的经济学辩论

通常情况下,公司的特点是**有权通过法定的、权威的或者纪律处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种处罚优于传统市场上的方法。这是错觉。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p. 777)

针对公司“没有权力单位、没有权威,以及任何纪律处分都与一般的市场合同没有差别”的论点(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p. 777)是完全错误的:公司可以做平衡的尝试,但是市场却不能。

(威廉姆森,1994,p. 325)

权力的行使是在私人交换无处不在的前提下实现的。

(鲍尔斯和金蒂斯,2008,p. 1)

尽管**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维塞尔(Friedrich Wieser)**等作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讨论了权力、胁迫和政治的概念,但现代学术争论很少回到这些作者身上。相反,权力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已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学术争论中占主导地位,且主要是关于企业性质的争论的副产物。可以对比**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 1972)**与**斯蒂芬·玛格林(Ste-**

phen Marglin, 1974, 1975) 的理论。前者认为, 正式权力在公司内部只是表面性的, 而老板和工人之间隐藏着完美的互惠自由现实; 后者的主张则相反, 权力关系在公司的组织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 科斯(Coase, 1937) 认为的公司的性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一篇论文中, 科斯明确规定了公司内部的权力和指挥机制, 以协调的方式来应对市场价格机制。

可以知道, 科斯的论文不是关于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性质的: 相反, 它定义的企业性质,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并不怎么重要, 因为公司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人们就可以了解公司和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

然而, 这一问题如果放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背景下就是琐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里的经济体制被视为普遍和永恒的, 就像它要解决的经济问题一样: 稀缺资源的分配。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 企业 and 市场是两种替代性的资源配置机制。理论问题是, 在一般均衡模型中, 孤立的个体和消费、生产领域之间的协调出现在完全竞争市场中, 这使得所有其他经济机构变得冗余。研究描述的一般均衡模型, 有时是指公司以及其他组织(如家庭), 但分析时, 它们是多余的加载项。这使得公司的内部关系待定。正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1957, p. 894) 说的那样, 在一个完全竞争模型中, 谁雇用谁真的不重要, 是劳动力雇用资本。

一般均衡模型, 像任何有决策制定者的理论模型一样, 由决策环境(DMC) 和组织结构(OS) 定义。前者定义了代理交互的世界的特性以及使用的决策标准: 它指定最终存在的风险、逻辑或历史时间等相关信息, 它们完美或不完美的方面, 以及充分或有限理性知识的不确定性。后者指的是机构的关系类型以及交互的方式: 它描述的是一个代理人的行动影响别人, 最终存在分层或权力关系, 而市场的互动是在不同经济部门的普遍的市场结构中。

瓦尔拉斯模型的 DMC 描绘了完全信息、充分理性和交易成本为零。我将它称为“完美”的 DMC。而 OS 是完全分散的, 这是市场关系和完全竞争的基础。

在瓦尔拉斯模型的前提下, 从公司冗余的事实出发, 科斯提出了两个科学问题: 层次结构在市场体系中为什么存在? 公司内部的权力关系的来源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 科斯探讨了在特定环境下为什么权威和指挥可能是经济上优于市场关系, 从而交易费用为正的原因。在方法论上, 科斯拒绝完美的 DMC, 并探讨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如何可能比瓦尔拉斯的理论更好地得到执行。在这一逻辑中, 科斯在对公司性质的解释中坚持认为, 在市场关系中没有

正式授权的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在新古典主义的模型下,科斯只是介绍了一种权力并用它来解析描述公司是有别于市场的机构。如果权力具有影响其他人的条件,那么公司内部权力可以说是权力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形式,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主观命令和其他服从。

理论上,将权力作为公司内部具体的协调机制引入,可以解决科斯的问题(企业的性质),然而,这破坏了瓦尔拉斯模式所提供的人际关系和谐的愿景。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重建自发的(也可能是帕累托效率的)相互作用的和谐观点。在这种背景下,除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外,企业里还存在一个指挥机制。

发表四十多年后,科斯的论文已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旨在解释资本主义和其内部的权力关系的起始点。这个研究项目尤其得到了在经济辩论中影响日益增大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使科斯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我解释这一学派的理论中,研究了两个不同的维度。首先,科斯的直觉是通过否认公司内部的真正的权威关系,并且通过解释指令的机制是一种特定的竞争形式而发展起来的。这条线的主要方向是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在第二种方法下,通过竞争和命令的成本和效益,系统性地分析了市场和层次结构的优缺点。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及哈特和摩尔的产权理论是这条线的贡献者。^① 在新制度经济学背景下,这一对资本主义制度权力的研究尤其得到了激进的政治经济学派(如鲍尔斯和金蒂斯等)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如戈德堡(Goldberg)等]的支持。

虽然在苛刻的辩证性论调下,这些方法都有面对彼此的机会,但我的论文提供了一种研究权力的方法,在接受新古典主义(和其隐含的本体论)后,已允许它们之间充分结合,并在产生共同概念的情况下,作为例外向瓦尔拉斯竞争趋同。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基于不同的方法,一直停留在辩论边际利润,并且经常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曲解和误读。这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历史主义经济学家中,相反,我认为新古典主义方法所讨论的权力作为纯粹的人际关系,包含了所有的矛盾,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对政治经济的掩饰而不是揭示,认为其是在特定形式下的社会强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概念。

首先,我要探讨在辩论中制定的主要理论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我挑出的这些方法具有常见的方法论和本体论特点,涉及理论在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权

^① 在巴勒莫(Palermo,2000)中,我认为在这两股新制度主义的潮流中,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的张力:首先,从理论上描述资本主义的公司;其次,显示资本主义的无权力性质。在安格鲁和巴勒莫(Ankarloo and Palermo,2004)中,我们的重点是对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进行批判。

力关系下的不同立场。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契约方法

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有力辩护——他们的“契约方法”(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詹森和麦克林,1976;张五常,1983,1987,1992)。他们于1972年发表的文章只是在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方面最常引用的文献之一,现在已成为新的理论方法的起点。在他们的财产权利方法中,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或权威,即使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形式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

作者认为,在公司内部生产是作为个人与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团队生产的本质特征在最终的生产过程中是不可能得到明确的,这使得它很难衡量团队的每个成员的相对贡献来确定不同的工作活动的有效薪酬,以及防止在团队内的疏忽和搭便车行为。这种困难引发了监管问题。基于监管的收益(总生产力的提高)大于其成本(监管的工资)的假设,因此监管是有激励作用的。然而,监管者相对于团队的其他成员并无实际区别,因为他同样被市场竞争的规定所束缚了;在较低的价格下,他会被团队的其他成员取代提供相同的监管服务。通过这种方式,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将公司的所有关系都带回到市场关系,并表示公司内部的等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他们讨论雇佣关系的方式。

人们普遍认为,公司的特点是有权通过法令、权威或记录行为来解决问题,而这在传统市场上是优于现有方式的。这是错觉,公司并不拥有所有的收入。在普通市场上,两个人之间没有权力、没有权威、没有不同的纪律处分。我可以“处罚”你,但只能通过取消未来业务或寻求向法院讨回公道。这正是所有的雇主可以做的。他们可以发火或起诉,就像我可以通过停止从杂货商购买或控告他交付了有缺陷的产品一样。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p. 777)

根据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观点,权力关系在理论上没有地位的原因是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此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对立只是虚幻的。市场上的完全竞争是普遍的,甚至是在公司内部。公司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价格将不断地被重新谈判,只不过结果是相似的。

这一立场显然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激进的经济学家的批判。与其相反的是,他们看到了公司的组织严格依赖权力(布雷弗曼,1974;玛格林,

1974, 1975, 1991; 爱德华兹, 1979) 的问题。但也许最好的限制方法是顺应其内部的发展和其不可避免的死亡。

要否认公司内部存在的权力关系, 阿尔钦的学生张五常发现没有什么比否认公司本身作为社会领域对象的存在更合理。在他看来, 我们通常所称的“公司”, 其实只是市场复杂的合同关系, 公司本身作为一种市场从理论上被区分开来。因此, 公司的概念是不重要的, 理论上也是无用的。没有人能比作者本人更清楚:

通常情况下, 控制了就业合同的企业家(尚不清楚是企业家雇佣工人, 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可能会与其他公司签订分包合同; 分包商可能进一步签订子合同; 工人可能与大量的“雇主”或“公司”有合同……这种方法与公司规模相比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

(张五常, 1987, p. 57)

如果我们不能在任何经济意义上确定“公司”的概念, 那么作为独立的实体, 当我们在现实的世界中看到一个公司时, 我们并不能确定什么是公司。

(张五常, 1992, p. 56)^①

张五常的贡献是特别的: 他假定市场是普遍和永恒的, 并在此基础上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形成自己的逻辑结论。面对他的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他并不考虑重新批判自己的理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理论上他希望解释公司是现实存在的。然而在他的公司理论中, 公司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

威廉姆森的贡献是尝试系统性发展科斯的直觉并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范围内解决公司的问题(科斯, 1937; 威廉姆森, 1975, 1985, 1994, 1995, 1996A, 1996B, 2003, 2005; 威廉姆森和乌奇, 1983; 西蒙, 1951, 1991)。由于这些贡献, 威廉姆森于 2009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市场层次结构框架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中定义和发展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然而, 威廉姆森明确将自己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契约方法区分开来:

针对公司“没有权力、没有权威以及不做任何纪律处分, 与一般的市场契约

^① 贝克尔(Becker, 1992, p. 68)的评论是尖锐的:“我们通常知道一个公司, 当我们看到一个时。”

没有差别的”的论点(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p. 777)是完全错误的:公司可以做平衡的尝试,但是市场却不能。

(威廉姆森,1994,p. 325)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公司被解释为使集权的组织机构(COS)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比市场更有效率的条件。^①他的方法可以描述如下:为研究的方便起见,假设“一开始就有了市场”(威廉姆森,1975,p. 21)。通过连续的比较静态分析,他介绍了基于不同形式的层次结构的非市场机构每次都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权力。最后,通过解释这些比较静态分析,就好像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威廉姆森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构。

在这种方法下,为了同样的目的(以完成交易),市场和层次结构被视为替代工具,而它们的存在被解释为相对有效率。如果市场和层次结构在现实中共存,那是因为交易成本阻止了它们有效地解决整个分配问题。它们的关系就是替代。一旦引入等级制度,替代的(虚拟)过程就会继续,直到集中化的经济效益超过经济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威廉姆森不仅解释了公司的性质,而且最优的中央集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公司的最优维度。

威廉姆森的市场和层次结构框架建立在三大理论范畴上:(1)机会主义;(2)有限理性;(3)资产专用性。(1)、(2)和(3)产生交易费用,并可阻止任何单一的机构有效地分配资源。^②层次结构超过市场的优势源于如下事实:(1)减少机会主义(通过权力和团结);(2)衰减问题源于有限理性(通过促进适应性的顺序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在自然条件下的偶然的合同是不可能的,并且现货市场是有风险的);(3)降低谈判成本造成的资产专用性(通过权威和产生聚合的期望)。市场有关层次结构的好处包括:(1)竞争;(2)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与层级组织相关联的激励机制。

作为威廉姆森框架的初始类别,有限理性的假设是有问题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在新产权学派的发展中被抛弃了。事实上,这一假设与威廉姆森的方法相冲突,即该制度变迁的基本假设遵循经济效率。简单地说,一方面,个人应

^① 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中,交易成本从未被定义过。引述(不是非常精确)阿罗(Arrow, 1969, p. 48)的定义,威廉姆森(1985, p. 18)是指“运行系统的成本”;后来威廉姆森(1985, p. 19)把它定义为“等同于物理系统中的摩擦力”。

^② 由于缺乏三因素之一,市场仍然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给公司:(1)没有有限理性,所有未来的潜在问题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机会主义和资产的特殊性可以由市场来管理;(2)没有机会主义,管理可以被用来取代等级(因为双方可以相互依赖,以尊重承诺);(3)没有资产的特殊性,竞争市场在鲍莫尔(Baumol)的概念中可以被定义(参见 Pitelis, 1991, p. 12)。

该有合理的边界;另一方面,他们非最优的决策是建立在最优的机构配置上的(参见格兰诺维特,1985;霍奇森,1988,1991,1993A,1993B,1994)。

市场和层次结构框架的首次应用与工作关系相关。正如克里斯托·皮特里斯(Christos Pitelis,1991,p.13)指出的,此应用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只有工作关系可以对市场现状解释所出现的层次结构。威廉姆森的框架的所有其他应用(垂直整合、m型、综合型大企业)预先假定了公司的存在,从而解决了公司的发展问题,而不是它的起源。(层次的)工作关系表示,“开始有市场”是关于市场的第一个抑制原则。随后在公司的内部结构和公司之间关系中的前提是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即工作关系的存在)。如果在时间0有市场,在时间1有市场和分等级的工作关系(即企业),那么,从时间2起,权力关系更复杂的形式将得以发展。

对公司的解释涉及工作关系的重要性,使威廉姆森的框架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不同。威廉姆森的框架意味着:(1)明确区分企业和市场的基础的层次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其他经济关系;(2)区分工作关系和其他的经济关系(例如杂货商和客户关系)。

哈特和摩尔的产权方法

产权的新理论(或只是产权理论)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的原创性贡献影响下由哈特和摩尔(Hart and Moore)创造和发展。同时,它的目的是克服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缺乏正式分析的问题,它的论点目前主要是在口头上(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1986,1988;哈特,1989,1990,1995,1996;哈特和摩尔,1988,1990,2005,2007,2008;摩尔,1992)。权力问题可以说是最接近威廉姆森的理论(以至于它经常作为一个成熟的版本提出),在许多方面,相当于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原始产权理论结论的对立面。

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样,产权学派假设合同中必然存在不完整基础上的不完美的DMC。然而,合同的不完整性仅取决于不完全的信息,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不同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还取决于有限理性。根据哈特(Hart,1990)的说法,问题不是代理人不能设想所有可能的突发事件,而是因为第三方(法庭)不可能核实合同的执行情况。换句话说,个人不受自己的认知能力影响,但能够影响第三方协议的条款。因此,有限理性是一个不重要的理论。这种方法克服了威廉姆森的框架中有限理性个人和有效率的体制安排之间的矛盾。

哈特和摩尔主要分析了在公司内部或者通过市场的作用何时应进行交易的问题。他们将合同权利分为两类：具体权利和剩余权利。前者是在合同中明确指定的权利；后者是在所有情况下，在合同中没有提及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资产的权利，即所赋予的所有权剩余权利。资产的所有者可以决定如何使用以及由谁（当然，这是在法律和具体合同的约束下）使用。尤其是，他有权利阻止另一方使用他有争议的资产。对于甲方而言，在乙方资产中列出所有特定权利的成本较高，甲方可能直接选择购买所有的剩余权利。以这种方式，假设掌握特定资产所有权的 A 获得剩余权利对其进行控制，并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处置它。

根据这种分类，作者对公司及其与市场的边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定义。公司实物资产由其所有者控制。如果两种资产有相同的所有者，就组成单一综合型公司；如果有不同的所有者，他们来自两个独立的公司，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市场。集中的决定非常重要，因为对资产的控制使商标所有人在意外发生时具有决策权。这种情况既以效率为理由，又以权力关系为基础。

从效率的角度看，这种方法是研究所有权的变更对工人和经理的激励机制的影响。在著名的科斯定理（1960）中，契约的不完整意味着产权分配具有效率后果。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相比，哈特和摩尔认为有关的比较不是在非集中的结果和完成合同的结果之间；将出现一体化产量完成合约时会发生的结果。然而，在不完全信息和资产专用性环境下，一体化不能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它只是根据哪个集团购买剩余的权利来修改。在任何情况下，机会主义都会造成扭曲，从而阻止理论上的第一个或最佳的解决方案的获得——这个方案从完全合同中得到定义。因此，有关的比较是介于没有效率的三种情况：非集中和集中，以及任意 A 或 B 获取剩余权利。

不过，有形资产的所有权是有效率的，而且是一种权力。根据这一思路，老板对工人的权力是由于他拥有有形资产的所有权的结果，而不是不完全信息的结果。正如摩尔（1992，pp. 496—497）说的，“因为发生争议，老板可以拒绝拿出重要实物资产，从而施加权力在工人身上”。这解决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杂货商悖论，基于工作关系而不是本质上不同于任何其他市场关系的假设：

当客户向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杂货商“发火”时，杂货商（作为一个独立的承包商）继续拥有这家商店；而如果杂货商只是这些客户的雇员之一，那这些客户（老板）可以拒绝选择这个杂货商（工人），并且可以选择劳动力现货市场上的另一个杂货商。

（摩尔，1992，p. 497）

方法论上,哈特和摩尔的办法和契约论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然而,其对理论缺陷的弥补导致相反的结论。由此哈特(1995, p. 5)表明,“鉴于对权力的关切,提出的方法……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资本家和员工的关系的共同之处”。然而,我们将看到这种相似性是正式的,另外,这个不同的理论是与马克思相似的,不是基于“缺陷”而形成在资本主义的概念下完全不同的权力关系。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交换架构是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分析权力关系的尝试(鲍尔斯,1985;鲍尔斯和金蒂斯,1988,1990,1993a,1993b,1993c,1993d,1994a,1994b,2000,2012;金蒂斯,1989;金蒂斯和石川,1981;鲍尔斯、金蒂斯和古斯塔夫森,1993 eds;鲍尔斯、弗朗兹尼和帕加诺,2004 eds;普特曼,1982,1984,1993,1995;斯克勒潘蒂,2001)。^①“它的目标是表明,权力关系不局限于公司内部,而是存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作者将竞争定义为一种以自由进入以及大量买家和卖家为特征的情况,但不是通过市场结算。这一定义证明了即使在竞争(非出清市场均衡)情况下,市场经济也支撑系统代理(竞争性均衡是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变控制变量,也不能改善情况)之间的权力关系。^②这个结果通过放松瓦尔拉斯DMC之一所得到,鲍尔斯和金蒂斯(像哈特和摩尔一样)的假设最令人难以置信:契约执行由第三方来完成并不成问题。

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 p. 325)定义权力为有些代理人影响别人的行为的一种能力,通过实行制裁的威胁提高自己的优势。威廉姆森模型中权力关系的缺乏源自于其供给等于需求的假设,这就意味着,每个代理人通过放弃一些东西来赞成接下来的最佳替代方案并没有什么损失:在均衡中,交换A与B付出的代价是零,所以,A不能通过终止关系影响B的福祉。因此,鲍尔斯和金蒂斯

①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激进做法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构想和整个激进学派的科学和政治观点做出了深刻改变,参见贝克尔和韦斯博特(Baker and Weisbrot, 1994),麦金太尔和希拉德(McIntyre and Hillard, 1995),斯宾塞(Spencer, 2000)。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鲍尔斯和金蒂斯逐渐放弃了这项基于“有争议的交换”的研究,疏远了激进学派,并将他们的科学计划转向行为科学。然而,他们的理论进化并不是一个方法论反省的结果,而是试图在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开发新型数学工具。

② 鲍尔斯和金蒂斯区分了“完美竞争”和“完美瓦尔拉斯竞争”:前者并不意味着市场出清,后者则相反(与通常所称的“完美竞争”的内容不谋而合)。最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声称,即使在完美竞争(与交易市场)的统治下,权力关系仍然存在。在这本书中,我将继续采用完美竞争的定义,这意味着市场出清。

继续解释称,A也无权力要求B。更一般地,在瓦尔拉斯均衡中没有代理人可以制裁其他代理人的事实下,意味着经济运行没有任何基础的代理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如果合同的执行是有问题的,这个场景从根本就发生了改变。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p. 332)称:“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交换是有争议的,当B的商品或服务对A来说具有非常好的属性,而B的成本是高昂的,这在一个强制执行的合同中就是有问题的。”“当由第三方(如司法系统)执行合同不能保证零成本时,交易双方必须自行执行他们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A会设立监管和制裁机制,确定有相互作用的条件,诱使B提供所需的有争议的属性。其中一种强制执行机制是或有更新:A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向B承诺如果满意的话续签合同,否则终止合同。”(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p. 333)

有争议的交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雇主—工人关系,其中“雇主支付工资的承诺在法律上是强制执行的,工人的承诺是适当程度的努力……”(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p. 333)。其他的鲍尔斯和金蒂斯研究的例子是所有者和管理者、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各方的关系(金蒂斯,1989;鲍尔斯、金蒂斯和古斯塔夫森,1993 eds; 鲍尔斯和金蒂斯,1994b)。在所有情况下,竞争均衡都是由非出清市场决定的,对市场的短暂代理优于长期代理(其中,超额供给存在,需求方面是短缺的,反之亦然)。

这种权力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与短期代理相比,长期代理有幸进入市场并享受“法定工资”(按照雇主和员工的关系,是工资),定义为事务终止时所得到的效用之间的差值。不完全的市场竞争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一种不对称的市场,进而影响买家和卖家双方之间的人际交往关系。

工资是雇主对工人不断受到威胁和他/她被吩咐滋扰的补偿工具(同样,鲍尔斯和金蒂斯表明,债权人对债务人拥有权力,企业的所有者对管理人员也拥有权力)。因此,失业情况比工作更困难,这使得雇主对工人的制约能力更强,也使得后者在工作中做出了“足够”的努力。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理论间接地揭示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的一致性,公司内部的权力是自由的。事实上,在非出清市场,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相反,无成本契约产生了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如下:如果说公司是(竞争性)市场的一种形式,就不足以证明公司内部的关系是无权力的,因为正如鲍威尔和金蒂斯所证明的,在一个不完美的DMC中,完全竞争的市场仍然可能涉及权力。如果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一直坚持与他们不完美的DMC,他们会意识到,在不完美的杂货商市场,他们不再能以零成

本开除他们的杂货商。工人可以离开而没有实际的损失,资本家的想法只有在完美的DMC时才能实现。除此之外,离开人际关系和个人可能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权力,即使只是为了个人的方便,代价也是很高昂的。

关于新制度主义,鲍尔斯和金蒂斯提供了一幅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图景。他们表明(非瓦尔拉斯)竞争均衡的特征通常是非自愿失业,基于性别或种族(或其他与生产力无关的特性)的工资差别,民主制度明显优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技术效率低下的。最重要的是,在自愿的市场交换下权力关系会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标准的瓦尔拉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论点。正如自由政治哲学所暗示的那样,在瓦尔拉斯世界之外,当市场并不一定出清的时候,其就不再被视为一种没有强制的自由互动的场所。

尽管存在这些理论上的差异,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方法在理论上仍不同于那些新制度和超自由主义者:缺陷是权力关系存在的原因,而在现实世界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模型是揭示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的方法。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方法与“效率工资”在方法论上也是一种衔接,专注于工人“逃避”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善的合同(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阿克洛夫和耶伦,1986 eds;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88,1993)。在这两种情况下,工资高于市场平均工资会诱使工人比他/她所希望的更加努力地工作。主要的区别是,在激进的方法中,缺陷是权力关系的原因,并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支,是分配效率低下和次优解决方案的原因(严格来说,效率工资与生产率有关,而与效率无关,因为总产出的增加并不是通过持续的生产投入,而是增加劳动力)。然而,这些方法存在的缺陷是必要的,可用以了解权力和效率低下的原因。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Bruce Greenwald and Joseph Stiglitz, 1993, p. 24)的话说:“现代凯恩斯主义者已确定真实世界‘不完美’的根源:他们离开了模型就像让哈姆雷特离开那出戏。”^①

戈德堡的制度视角

戈德堡(Goldberg, 1976, 1980)的理论并无不同,他的理论旨在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将威廉姆森和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作为这些经济学派的代言人。虽然他偏向于美国旧的体制传统,

^① 将异端经济学纳入主流的进程是社会科学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实现文化霸权过程的一部分。法恩和米洛纳基斯(Fine and Milonakis, 2009)详细讨论了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效用最大化和市场缺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反社会化和反历史性。

但是根据下述方法论个人主义开展了这项工作。让我们先看一下爱德华兹(1979)的观点。

通过引用马克思的观点(1867),爱德华兹反思了劳动和劳动者权力之间的区别:劳动者的权力,是雇主购买的商品,是执行某些类型的生产活动的能力;劳作是工人开展活动的具体过程。实际的劳动不仅受到劳动力的影响,而且受到雇主从劳动者中提取劳动能力的影响。在爱德华兹以及马克思看来,这种区分足以用来解释剥削(这里的剥削是经济力量的一种表现)。

劳动者提取劳动力的过程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广泛研究的目标。爱德华兹特别注意到,在这个具体的过程中,用人单位在市场上购买的劳动力和它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可能有差异。在戈德堡解读爱德华兹的过程中,这种差异是由于合同的缺陷。因此,他假定DMC的不完全信息、个人机会主义、昂贵的合同制约和流失的时间。在这种不完美的DMC下,劳动者提取劳动力是有问题的,因为缺陷妨碍当事方在合同建立过程中明确劳动时间。

根据作者的观点,这种情况导致了承诺与执行之间的差异,为行使权力腾出了空间。换句话说,戈德堡不解释爱德华兹自己提出的劳动合同是由于经济剥削。但由于一些实证方面特异性的工作关系,例如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需要花费的时间和信息,事实上是不完美的,正如爱德华兹自己所提出的一样。工作关系的实证属性因此被解释为在资本主义中权力存在的原因。

然而,戈德堡继续说,承诺和执行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在每次双方的关系不是瞬间发生的时候出现,就像在瓦尔拉斯的世界一样。因此,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雇佣关系并不是特殊的,而是不同程度的、大多数的交换关系(戈德堡,1980,pp. 252—253)。戈德堡的结论并不局限在企业内部,因为不遵守诺言的激励可能出现在几种合同关系中,甚至有可能是在公司以外的关系中。

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关系如果还存在,那只能说明承包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承包是合同中有缺陷的结果。戈德堡的理论与其说是新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不如说是马克思的新古典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导致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概念。价值与剥削的理论并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道德化的重要方面,而是作为无用的社会概念,并不涉及人际权力关系。然而,我认为,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剥削与承诺和执行之间的差异无关。相反,马克思表明,资本家们想要剥削工人,关键是他们通常都能这么做。

争议条款

所有的方法讨论了权力关系只存在于不完美决策环境的观点。作者明确坚持自由主义理论,并相信:完美的 DMC 是现实中的规则。在他们看来,这证明,至少在一般的规则下,经济理论忽略了权力关系。相比之下,他们的竞争对手关于权力的讨论中考虑到了瓦尔拉斯的 DMC 不切实际。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流失时间、有限理性或其他缺陷相比,他们认为,人际交往关系必然涉及权力。

在本体论下,这些看似相互竞争的理论发展出了对现实的同一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权力的存在依赖于代理人相互作用的 DMC 的特征。在完美的 DMC 中,是没有权力关系的余地的:公司的内部结构是不相关的,竞争出清了所有的市场;因此,没有人可以拥有对其他人的权力。相比之下,在不完美的 DMC 中,公司内部的关系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和市场。在这些情况下,他们认为,权力关系可以出现在公司内部和市场内。因此,在这些理论中,缺陷是权力关系的原因。消除它们,这些作者如此坚称——要么是含蓄的,要么是明确的,并且权力关系消失了。

因而,权力问题是一种经验,而解决方案是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具有关联性的缺陷。根据此本体论,经济现实会分裂成有无缺陷的两个不同封闭系统,人际关系受到完全竞争和事关权力的系统缺陷的影响。

虽然本体论仍然主要是隐含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话语中,但它是唯一的理由,经济现实必须由两套模型(不兼容但互补)来解释:瓦尔拉斯的竞争模型解释了完美 DMC 中的关系,另一组经济权力模型解释了系统中由不完善的 DMC 所描述的人际关系(不用说,前者定义了经济理论的主体,而后者则解释了前者所不能解释的)。

乍一看,作者在考虑现实世界中的不完美无处不在时,不需要这种本体论假设。在激进学派内,欧内斯托·斯克勒潘蒂(Ernesto Screpanti, 2001, p. 145)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他开始通过定义复杂的 DMC 描绘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然后表明,就算是作为极端情况,完美和完全竞争也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我的意思是,新古典主义的竞争,消除了所有的效率低下和权力傲慢。在他看来,完美的 DMC 只是一个没有经验对应的理论基准。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本体论实体,而是经济学家的方法工具。完善的竞争模型不是为了了解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而是弄明白如何不能。相反,你必须假设不完

美的 DMC 来描述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即便有了这个解释,至于为什么斯克勒潘蒂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的激进分子选择这个抽象的研究,且并没有将其作为本应更现实的理论基准,这一点还不清楚。

这一基础本体论解释了为什么权力关系的理论研究从公司开始,在这个领域中,等级和权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被认为是需要解释的现象。在辩论的第一阶段,市场关系已经被描述为,无权力的事实导致分析(公司内部)权力成了一般模型(市场)的一种例外。这种情况导致了“公司的边界”的问题,公司的权力关系要是反映到市场上,就是无权力关系。按这种方式,公司和资本主义市场的互补作用就一定是缺失的。

辩论的下一阶段,包括质疑权力在公司内部是否有效的假设,最终导致对问题的更准确的重新定义。这一理论问题形成了下列疑问:经济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或者,把它放在这种方法背景下,哪里是权力关系和无权力关系之间的分界线?

由于这个问题的狭义定义,权力关系的范围和无权力关系的范围可以用集合理论来表示。根据在 DMC 下是否存在完美和不完美,可以将现有的经济关系的集合分为两个不相交的子集。这些子集之间的界线区分了世界的各个部分,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瓦尔拉斯的竞争所统治的,并是由权力支配的。这个本体论可以用一个标准来表示,完美的 DMC 在界线的左边,不完美的 DMC 在界线的右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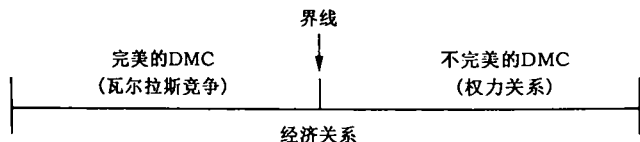


图 2.1 经济权力的边界

如果我们允许界线从左向右移动,则权力关系存在的范围逐渐被压缩。作为极端情况,如果界线位于经济关系的最左边,我们就有了一个概念,即权力关系包含整个经济。如果它处于最右边,我们就认为经济概念不涉及权力关系,正式表示为一般均衡模型。

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图形中,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是在右边最激进的一个。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完美的竞争,即使这种互动模式实际上受到其他经济机制的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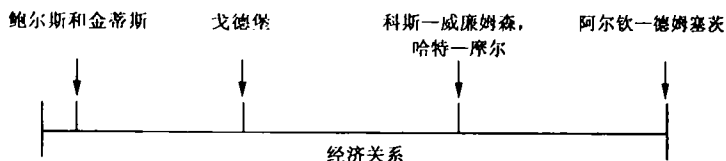


图 2.2 争议情形

为此，他们否认任何权力关系在经济中的存在并压缩权力的生存空间。他们潜在的 DMC 却是含混不清的。一方面，为了解释公司，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明确介绍了 DMC；另一方面，在不完全信息假设下，他们隐含假设了完美的 DMC，声称雇主对他的工人没有真正的权力。面对这一矛盾，一些学者仍然固执地站在中间。然而，张五常提出了一条明确的路线：为了坚定地捍卫资本主义没有权力的论点，他返回到完美的 DMC，在这种背景下，权力关系消失了，企业也消失了，就像一般均衡模型一样。

与这一立场相反，新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和威廉姆森，或哈特和摩尔，认识到权力关系确实存在。他们明确地定义不完美 DMC 来解释公司和识别出的权力关系与公司内部的关系。为此，他们将分析限制在权力关系中，这些关系存在于公司内部，即权力和层次结构的特定形式。同时，他们也承认，在企业之外，在市场上，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余地的。像阿尔钦、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一样，他们假定的权力边界与公司一致。然而，与这些人不同的是，科斯、威廉姆森、哈特和摩尔看不出公司是作为一种隐性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作为一种替代（而且，在某些条件下效率更高）的配置机制。

鲍尔斯和金蒂斯，还有戈德堡，进一步向左移动并显示权力关系的存在，甚至超出了企业边界，而且落在市场不完美的范围内。尚不清楚鲍尔斯和金蒂斯是否处在权力和瓦尔拉斯竞争之间。作者明确声称，权力关系是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这也许暗示了权力关系在他们的概念中无处不在。然而，这只是因为他们看到现实世界中缺陷是无处不在的。就像他们那些不太激进的同行一样，权力关系的存在范围也与 DMC 中不完美的扩散相吻合。因此，如果它发生在一个需求等于供给的特定市场中，那么他们的理论就意味着，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子集里，人际关系中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因此，新古典主义激进派并不挑战传统的权力关系概念。他们的激进主义仅仅是把界线稍微往左移一点。然而与此同时，这完全是主流经济学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不完美是权力关系的根源。

参考文献

- Akerlof, George and Janet Yallen (1986 eds), *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chian, Armen and Harold Demsetz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n. 1, pp. 777—795.
- Ankarloo, Daniel and Giulio Palermo (2004), Anti-Williamson: A Marxian critiqu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8, n. 3, pp. 413—429.
- Arrow, Kenneth (1969),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 in US Joint Committee, 91st Congress, 1st Sessi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PPB system*, Vol.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printed in Haveman, Robert and Julius Margolis (1970 eds), *Public expenditures and policy analysis*, Chicago, Markham.
- Baker, Dean and Mark Weisbrot (1994), The logic of contested ex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8, n. 4, pp. 1091—1114.
- Becker, Gary (1992), Comments to Cheung, in Werin, Lars and Hans Wijkander(eds), *Contract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Bowles, Samuel (1985),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Marxian and neo-Hobbesian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pp. 16—36.
- Bowles, Samuel, Maurizio Franzini and Ugo Pagano (2004 eds),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Bowles, Samuels and Herbert Gintis (1988),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pp. 145—150.
- (1990),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8, n. 2, pp. 165—222.
- (1993A), Power and wealth in a competitive capitalist econom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21, n. 4, pp. 324—353.

-(1993B). The revenge of homo economicu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 1, pp. 83—102.
- (1993C). Post Walr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 Bowles, Samuel, Herbert Gintis and Bo Gustafsson (eds), *Markets and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effici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D). The democratic firm: An agency-theoretic evaluation, in Bowles, Samuel, Herbert Gintis and Bo Gustafsson (eds), *Markets and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effici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4A). Power in economic theory, in Philip Arestis and Malcolm Sawyer(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1994B).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incidence of worker-owned firms, *Metroeconomica*, vol. 45, n. 3, pp. 209—223.
- (2000). 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n. 4, pp. 1411—1439.
- (2012). Power, in Steven Durlauf and Lawrence Blume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Bowles, Samuel, Herbert Gintis and Bo Gustafsson(1993 eds), *Markets and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effici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heung, Stephen (1983),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 1, pp. 1—21.
- (1987).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 Eatwell, John, Murray Millgate and Paul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1992).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Werin, Lars and Hans Wijkander(eds), *Contract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 4, pp. 386—405.

-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n. 3, pp. 1—44.
-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s Books.
- Fine, Ben and Dimitris Milonakis (2009), *From economics imperialism to freakonomics: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between economics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Gintis, Herbert (1989),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11, pp. 311—322.
- Gintis, Herbert and Tsuneo Ishikawa (1981), Wages, work discipline,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 pp. 195—228.
- Goldberg, Victor (1976), Toward an expanded economic theory of contract,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10, n. 1, pp. 45—61.
- (1980), Bridges over contested terrain: Exploring the radical account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1, pp. 249—274.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ology*, vol. 91, n. 3, pp. 481—510.
- Greenwald, Bruce and Joseph Stiglitz (1988), Pareto inefficiency of market economies: Search and efficiency wage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 2, pp. 351—355.
- (1993), New and old Keynesia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 1, pp. 23—44.
- Grossman, Stanford and Oliver Hart (1983),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conometrica*, vol. 51, pp. 7—45.
-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 4, pp. 691—719.
- Hart, Oliver (1988),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4, n. 1, pp. 119—140.
- (1989),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o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Columbia*

- Law Review*, vol. 89, n. 7, pp. 1757—1774.
- (1990), Is bounded rationality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46, n. 4, pp. 696—702.
- (1995),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Clarendon.
- (1996), An economist's view of authori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8, pp. 371—386.
-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1988),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 *Econometrica*, vol. 56, pp. 755—785.
- (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 6, pp. 1119—1158.
- (2005), On the design of hierarchies: Coordination versus special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n. 4, pp. 675—702.
- (2007),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ownership: Some new thou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 2, pp. 182—186.
- (2008), Contracts as reference poi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n. 1, pp. 1—48.
- Hodgson, Geoffrey (1988),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1), Economic evolution, intervention contra Panglos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5, n. 2.
- (1993A),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3B),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in Pitelis, Christos (ed.), *Transaction costs,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4), Evolution and optimality, in Hodgson, Geoffrey, Warren Samuels and Marc Tool (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Jensen, Michael and William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u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n. 3, pp. 305—360.
- Marglin, Stephen (1974),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

- 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Part 1,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6, n. 2, pp. 60—112.
- (1975),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Part 2,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7, n. 1, pp. 20—37.
- (1991),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Control versus efficiency, in Gustavsson, Bo (ed.), *Power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Marx, Karl (1867),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l/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McIntyre, Richard and Michael Hillard (1995), The peculiar marriage of Marxian and neoclassical labor economic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7, pp. 22—30.
- Moore, John (1992), The firm as a collection of asset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6, n. 2/3, pp. 493—507.
- Palermo, Giulio (2000), Economic power and the firm: Two conflicting problem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34, n. 3, pp. 573—601.
- Pitelis, Christos (1991), *Market and non-market hierarchies: Theories of institutional fail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Putterman, Louis (1982), Some behavioral perspectives on the dominance of hierarchical over democratic forms of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3, pp. 139—160.
- (1984), On some recent explanations of why capital hires labor, *Economic Inquiry*, vol. 22, pp. 171—187.
- (1993), Ownership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7, pp. 243—263.
- (1995),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information: On a paradox i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26, pp. 373—390.
- Samuelson, Paul (1957), Wage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7, pp. 884—912.
- Screpanti, Ernesto (200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Shapiro, Carl and Joseph Stiglitz (1984),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4, n. 3, pp. 433—444.

Simon, Herbert (1951), A formal theory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Econometrica*, vol. 19, n. 3, pp. 293—305.

——(1991),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5, pp. 25—44.

Spencer, David (2000), The demise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n essay on the evolution of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4, pp. 543—564.

Williamson, Oliver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Visible and invisible govern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4, n. 2, pp. 323—326.

——(1995), Hierarchies, markets and power in the economy: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4, n. 1, pp. 21—49.

——(1996A),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B), Efficiency, power, author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Groenewegen, John (ed.),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and beyond*,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Examin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ract,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2, n. 4, pp. 917—942.

——(2005), The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pp. 1—18.

Williamson, Oliver and William Ouchi (1983), The market and hierarchies program of research: Origins, implications, prospects, in Francis, Arthur, Jeremy Turk and Paul Willman (eds), *Power,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Heinemann.

第三章



权力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是上帝的行为，不是人的作为。它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它不是一种调查的产物，需要被研究。相反，它是一些假设，理所当然……它被视为自我生成的现象，并不是原罪和童贞女所生的产物。

(达格, 1992, p. 8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权力的辩论导致在本体论中，权力和完全竞争是不相交的实证集：有一个概念，而不是其他。从理论上讲，在这个概念中，权力和竞争是完全对称的。然而，辩论只关注权力关系的性质，而竞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自然条件，不应得到理论解释。在此方法论中，权力是一种解释，竞争是解释的一部分。

作为解释权力的起点的完全竞争假设与 DMC 中不完美的介绍是齐头并进的。更确切地说，一般尝试解释权力缺陷是这种假设的后果。在本章中，我认为：完全竞争的假设和不完美的介绍并没有实证证明。

首先，我把关于权力的辩论放在一个更广泛的研究项目中，这是由所谓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发展起来的。^①

然后，我讨论瓦尔拉斯经济学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第一，逻辑上的权力关系不依赖于不完善之处。我的论点是反事实：我认为完美的

^① 从狭义上说，“瓦尔拉斯经济学”这个词也被用作鲍尔斯和金蒂斯开创的关于权力的激进方法的代名词。

DMC 假设充分表明,基于权力关系的 OS 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具有相同的逻辑。这意味着不完美在理论上不是必然的,从概念上讲,完全竞争在这种方法中没有特殊的作用。

第二,我认为,矛盾的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解释方法并不考虑所实现的瓦尔拉斯经济学理论结果:简单地忽略了稳定性问题和一般均衡的唯一性,存在和帕累托最优的作用被误解为市场失灵这一假设。这导致了一种神秘的概念,即权力和完全竞争,前者是由不完美造成的,后者是一种已存在的自然状态。

我的批判通过预先存在完全分散的 OS 在关于权力的不同方法中的作用继续展开。在前一章,我讨论了完美权力和不完美的 DMC 的作用条件,在这里我继续开展我的批评,也讨论完全和不完全分散 OS 的作用。

最后,我得出主要的理论结果和这种方法的逻辑矛盾。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

方法论上,关于权力的辩论是 OS 在不完美的 DMC 内运作的具有可比性的一种情况。起始点始终不变:完美的 DMC 瓦尔拉斯(完全竞争、完全分散)操作系统。这是所有讨论的显式或隐式的理论基础。

对这一基础的分析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利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74)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97)形式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在真正占主导之前持续了几十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关注点转移到存在的问题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阿罗和德布鲁,1954;德布鲁,1959;阿罗和哈恩,1971);之后是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杰拉尔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关于存在问题的解答,以及在 20 世纪 70 年代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的不可能性定理的稳定性和唯一性(索南夏因,1973;德布鲁,1974;曼特尔,1974)。^①

矛盾的是,权力只是在这时——当瓦尔拉斯经济学已经成熟,甚至是衰落时——才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严肃的一般均衡理论家大多已经认识到这一研究计划的总体一致性以及解释力的稳定性和唯一性带来的负面结果(参见

^① 麦肯锡(McKenzie, 1954)预计存在一般均衡的证明。阿罗和德布鲁(Arrow and Debreu, 1954)认为主要的区别在于:(1)麦肯锡并非从个人偏好和禀赋开始,而是按照总需求函数;(2)他不讨论帕累托最优。关于阿罗和德布鲁以及麦肯锡的文章的不同学术运用的讨论,由温特劳布(Weintraub, 2011)做出。

哈恩,1982;费舍尔,2011)。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开始在这些脆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项目。

如我们所见,这种理论框架是通过放松完美 DMC 的假设正式介绍了权力。这一在不完美的 DMC 中发展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尝试,并不体现关于权力辩论的方法论的专一性。这是一种普遍的方法,是用所谓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来处理那些不能在原始的瓦尔拉斯模型中讨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是由非正统的学派所发现的。下面是逻辑,在完美的 DMC 中,瓦尔拉斯经济学已经得出以下结果:

1. 国家不扮演经济角色,因为资源的分配可以完全通过市场发生。
2. 公司没有经济空间,因为生产可以通过人际关系契约进行,没有管理协调。
3. 由于完全竞争可能独自指导人际交往关系,这里的市场互动中不存在权力关系。

新凯恩斯主义者、新制度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激进分子的共同观点是解释国家的经济作用、公司的性质,更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以及通过修改瓦尔拉斯的 DMC 假设来维持权力关系。从方法上看,这些新的方法可以作为一个共同的研究方案,旨在扩大和推广瓦尔拉斯框架的一部分:其假定完美的 DMC;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研究“不完美”的 DMC。

这种方法的解释逻辑基于假设制度变迁产生帕累托改进。可以描述如下:当真实世界的情况接近完美的 DMC,则完全竞争的 OS 系统将接近帕累托最优,并将在现实世界中占上风。只有不完美的 DMC,瓦尔拉斯系统才会失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这种方法,基于权力的 OS 还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降低了帕累托的次优性)。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混合 OS 可能被解释为制度上的解决方案,用以解决由于 DMC 存在缺陷而产生的低效问题。

从方法上看,这是在建立 DMC 的特征和演变的 OS 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这一逻辑,国家、公司和权力关系的存在只有在它们在经济上优于现有的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下才有理由。

1993 年冬,《经济展望》杂志的编辑开辟了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包括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3)、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93)以及鲍尔斯和金蒂斯(Bowles and Gintis, 1993B),提出了他们“新”的理论方法和关系,他们对各学派创始者作了讨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美国的制度经济学派和马克思。浮现出的画面就是,尽管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在这些方法中存在着共同的方法论和理论背景,这使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契合彼此

和后主流经济学(尽管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整合已被证明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方法论个人主义、均衡和比较静态定义了这一过程的收敛性;所依据的一般框架的缺陷是克服瓦尔拉斯模型的限制性假设的理论要点。用此方法和理论表述,关于权力的整个辩论其实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从瓦尔拉斯到后瓦尔拉斯

首先要注意,瓦尔拉斯 OS 作为理论基准的假设是纯粹思想上的选择。

从逻辑上讲,在瓦尔拉斯的框架下,有三种方式介绍权力关系:(1)通过拒绝瓦尔拉斯 OS;(2)拒绝完美 DMC;(3)拒绝它们两个。然而,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第一种可能性(基于权力的 OS 中完美的 DMC 定义)完全被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关于权力的辩论只沿第二和第三个方法发展。然而,在有问题的 DMC 之前,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们可能在完美的 DMC 中研究权力,就像瓦尔拉斯经济学假设完全竞争一样。

原则上,任何 OS 可以定义任何 DMC。例如,在瓦尔拉斯模型的完美 DMC 中,就可以定义一个中央计划模型,基于纯粹的层次关系或 OS 与中间程度的中央集权,如多元规划模型、基于竞争与权力关系。因此,权力关系与完美的 DMC 是绝对相容的,它们的存在不服从经验领域中存在的缺陷。理论上,完美的 DMC 的假设并不意味着:(1)市场应该是唯一的分配机制;(2)生产应通过双边合同发生;(3)正如瓦尔拉斯经济学所建议的那样,人际关系应该受到完全竞争的约束。这些只是可能性,不是必需。

显然,假设一个基于权力的操作系统,仍然无法作出解释,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正如瓦尔拉斯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假设的竞争)。权力和竞争的影响可能会建立在帕累托最优或其他标准的基础上,但它们的原因出于模型以外。换句话说,竞争和权力在完美的 DMC 理论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对它们两个可以连贯地假设,但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假设。

事实上,权力关系存在于现实中,但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却没有,这并不意味着完美的 DMC 是不够的。事实证明,瓦尔拉斯模型并不是阐明与权力相关的问题的最佳起点。但问题可能与它的 OS 中的 DMC 一样多。比起解决 DMC 的问题,通过显性地在 OS 中引入权力,可以研究权力问题。所有作者都拒绝完美的 DMC,但保留瓦尔拉斯 OS,在这种方法中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性。这只是现象的一部分。它的原因并不是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解释方法,而是从瓦

尔拉斯经济学中继承的完全竞争的神秘概念。在这个概念中,竞争被假定作为一种自然条件,而所有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都需要解释。

这个研究项目,与对DMC中缺陷的介绍和瓦尔拉斯转化为自然现有的OS是一个相同的神秘过程,它们的原因不是在于经济理论,而是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瓦尔拉斯经济学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第二个有问题的方面,是前者从后者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对三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稳定性和唯一性的一般均衡、存在和帕累托最优的作用以及作用的结果是市场失灵。

稳定性和唯一性的一般均衡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瓦尔拉斯经济学发展了它的解释性框架,就好像瓦尔拉斯模型中关于稳定性和唯一性的负面结果没有发生一样。然而,由于可能的不稳定和多重均衡,这种基于比较静态方法的整个解释逻辑变得有问题。在技术上,我们总是可以比较均衡点,但理论上,就没有理由认为真正的系统实际上将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如果后者不是由系统所触发。还有,如果前者的均衡点是不稳定的,这里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假设:这个真实的系统实际上是处在这个假设过程的初始位置。最后,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个均衡位置应该代表实际的经济,哪个均衡应该收敛。

不幸的是,不排除不稳定和多重均衡的可能性正是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的不可能性定理的结果:与瓦尔拉斯模型的假设一致,一般均衡可能是稳定的或不稳定的、唯一的或不唯一的。所有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在下一章中,我将批判性地使用比较静态的方法来解释真正的进化过程。然而,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内部问题。与不稳定或多重均衡相比,比较静态分析是在不恰当地描述历史的进程,并深刻地触及了现实的经济现象。

从一开始,后瓦尔拉斯方法就包含内部矛盾。它希望发展和概括瓦尔拉斯经济学,但事实上它忽略了后者的理论局限,虽然瓦尔拉斯经济学派在所有方面寻找如何克服自己理论的稳定性和唯一性问题的方法。后瓦尔拉斯经济学

以瓦尔拉斯经济学作为其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方法论基础。^①

存在和帕累托最优

矛盾的是,瓦尔拉斯经济学错误地解释了瓦尔拉斯经济学关于存在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的正面结果。为了体现这一问题的后果,让我们假设一般均衡是稳定和独特的(没有保证这种情况会在一般情况下发生,但它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平衡点到另一个平衡点的转换可能被解释为向着帕累托改进的方向,就像瓦尔拉斯经济学所建议的那样:一旦DMC的复杂性使得一个均衡次优,系统就会朝着帕累托最优的均衡前进。

这种逻辑观点尝试去证明瓦尔拉斯OS在后瓦尔拉斯框架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事实上,它的帕累托最优在完美的DMC中解释了——根据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为什么它存在于真实的经验语境中而不存在缺陷,以及为什么它可能是在不完美的DMC中比较静态分析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如果这一论点有效,那么最初瓦尔拉斯OS的选择将不仅基于意识形态,而且基于经济理论的结果。

然而,这个解释的逻辑是虚假的三段论的产物。事实上,瓦尔拉斯OS在完美的DMC中,并不是唯一的帕累托最优OS。一个著名的理论结果、完善的规划与纯粹的层次关系,在一个完美的DMC的凸集程序模型中得到定义,这个模型是与帕累托最优(坎托罗维奇,1939,1965;库普曼斯,1951,1960)兼容的。这两个相等的OS基于完全竞争和完美的权力也可以与中等程度的集权OS(如OS基于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一样,反映影子价格在规划模型中作为分散的企业家多层次规划系统,中央计划者之间的层次关系,以及分散的企业家和竞争之间的关系的信号。

规划模型的作用——无论是在完美的DMC中,还是在不完美的DMC中——在经济学文献中并没有被忽视,正如获得诺贝尔奖的数理经济学家所证明的那样。^②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在关于权力的辩论以及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帕累托效率的OS被忽视了,瓦尔拉斯经济学的OS只不过被假定为一个自然的事实,存

^① 里兹维(Rizvi, 2006)讨论了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定理(Sonnenschein-Mantel-Debreu)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的研究主线。

^② 规划模型已经发展成线性规划的应用(然后概括为凸规划),于1939年由苏联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列奥尼德·V. 坎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evich Kantorovich)提出,他也了解它在工业化国家资源分配中的适用性。坎托罗维奇在1965年获得了列宁奖(苏联最有声望的奖项之一)和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斯共获该荣誉)。他在十年后,由美国空军和兰德公司资助,以一条独立的研究路径获得了同样的数学技术。

在于完美的 DMC 和不完美的 DMC 中,就是这样。

然而,如果我们真的遵循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观点,即 OS 是根据帕累托的运动发展的,那么规划模型表明我们可能会一致期望在完美的 DMC 中同时观察到基于权力和无权力的 OS。因此,即使遵循基于帕累托效率的进化逻辑,也没有理由引入不完美来解释在现实世界中基于权力的 OS 的存在。

在完美的 DMC 中,完美的竞争已没有特别作用,甚至在比较研究中不作为理论的起点。在这种演进的逻辑下,如果一种社会互动模式首先出现,那应该没有其他模式会出现。竞争和权力都可以假定为起始点,但它们不能被解释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因此,权力的本质和竞争的问题应该不会产生(因为它们的存在必须靠假定且无法解释),否则应该同时存在(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对称的,所以每一个假设都是多余的)。

市场失灵

与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的相反,在相当完美的 DMC 下,中央计划和完全竞争是不完全对等的。如果瓦尔拉斯 OS 是帕累托最优的完美 DMC,那么从瓦尔拉斯模型的假设看,这只是因为所有潜在的“市场失灵”(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市场分配)已被淘汰。

例如,(这几乎可以说是在现实世界中很罕见的)在规模收益递增与竞争市场失灵(而中央计划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瓦尔拉斯 OS 是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美的 DMC。根据这种方法论的进化概念,它应该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不会被观察到:事实上,如果它存在,将立即取代帕累托高级形式。

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遵循这个解释方法,从一个中央计划的 OS 开始,而不是从瓦尔拉斯的 OS 开始,那将会更加合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不完美确实有某种解释,它应该是竞争,而不是权力。

完全竞争在权力博弈中的角色

完全竞争的 OS 在整个权力辩论中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然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给予了它两个不同的角色,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实体或只是理论的基础。在一个案例中,它一直被简单地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充分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激进学派相反的收敛解释,一方面是鲍尔斯和金蒂斯,另一方面是同样深信瓦尔拉斯 OS 的现实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和威廉姆森,或哈特和摩尔,则是按照不同的路径。在他们看来,基于竞争和

层次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更能代表混合的 OS。然而他们保留了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特殊角色作为理论参考,并作为非瓦尔拉斯的 OS 解释的起点。让我在更多的细节上考虑这些理论观点。

表 3.1 权力、决策内容和组织结构

	完全分散的 OS	收敛的 OS
完美的 DMC	一般均衡模型 (阿罗·德布鲁)	规划模型 (坎托罗维奇,库普曼斯)
不完美的 DMC	契约论,激进的政治经济学 (阿尔钦·德姆塞茨,鲍尔斯-金蒂斯)	新制度经济学 (科斯-威廉姆森,哈特-摩尔)

一般的假设是,一般均衡模型,其完美的 DMC 和完全分散的 OS,使得权力关系没有空间。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相反形式的激进主义,都是基于瓦尔拉斯 OS 充分描述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系统的假设。在他们看来,一般均衡模型的问题不在 OS 上,但也同样不在用完美的 DMC 来描述真正的决策进程的现代资本主义上。鲍尔斯和金蒂斯(Bowels and Gintis, 1993B, p. 83)的标准瓦尔拉斯理论“描绘了一个迷人的维多利亚式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冲突无处不在,但握手依然是握手”。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所有人类关系受私人合同制约,但合同执行问题根本不存在,或如两个激进经济学家所说,是一次简单的握手。他们因此保持瓦尔拉斯模型的完全竞争 OS,但是质疑现实主义的完美 DMC。同样,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也引入了不完善的信息来解释公司,但同时将公司描述为完全竞争市场的一种形式,就像瓦尔拉斯 OS 一样。

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完美的竞争模型的解释。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即使是在公司内部,完美(瓦尔拉斯)的竞争也能调节人际关系。他们认为,这从经济上排除了任何可能的权力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然而,这一立场在理论上是不一致的,因为它预料市场关系一定是无权力的。鲍尔斯和金蒂斯相比之下表明,不完美的 DMC,甚至是完美市场的竞争(非出清)必然涉及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既不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也不是鲍尔斯和金蒂斯提出了完全竞争的 OS,现实主义的他们都认同一个高度分散的系统。基于竞争关系,资本主义并不提供任何证据。资本主义在某个地方、在某些时代,实际上类似于分散的模型。鲍尔斯和金蒂斯写道:

当然,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条件偏离了自由出入标准,并考虑到所观察到的经济实力的情况,那么就没有必要选择另做一种解释。我们不认为这是事实。

(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p. 328,笔记14)

他们不相信这种情况。然而,自由进入和退出不是常态的实证证据是充分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观点看来,这一问题在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得到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垄断现在已经被主要的国际组织承认了。例如,在美国进步智囊团“政策研究所”所做的研究中,莎拉·安德森(Sarah Anderson)、约翰·卡瓦纳(John Cavanagh)和西娅·李(Thea Lee)表明,如果“经济”指的是一个公司和一个国家,那么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只有49个国家。这应该会使得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OS与瓦尔拉斯式经济有共同之处的假设产生怀疑。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建者遵循略有不同的路径。根据DMC的特点,他们也会从完全竞争OS(威廉姆森认为:一开始就有市场)开始,但他们没有继续依附于它,而是根据DMC的特性“解释”它是如何“进化”的。当然,这一过程的演变并不发生在真实的资本主义历史中,而只是在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在这个概念中,瓦尔拉斯OS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而是一个理论。与左派和右派激进分子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质疑瓦尔拉斯OS的真实性,并尝试解释混合的OS问题的现实性,它是如何作为一个假设的起点的进化产物并因此已经存在。

面对集中和分散的OS之间的完美的DMC的等价结果,新制度经济学家拉开了与完美的DMC之间的距离。瓦尔拉斯OS仍然是理想的起点,但理论上是根本不必要的。在引入了DMC的缺陷之后,竞争和权力现在可以被解释为针对特定分配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在完美的DMC中,等价结果使得这种方法不足以确定最优的OS。相比之下,在新制度经济学不完美的DMC中,一般的等价定理是不成立的,而现有的系统(以其权力和竞争的形式)可以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解释,前提是假定有一种初始的交互方式是预先存在的。当然,比较静态分析保证了“最后的”OS不依赖于初始条件。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完美的DMC,为什么还要从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和完全竞争的体系开始,而不是从计划状态和完善的权力开始?

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在完美的DMC中找到,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瓦尔拉斯OS没有特殊的作用(而且,严格地说,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它甚至不是一个合理的理论起点,因为中央计划的OS在经济上是优越的)。然而奇怪的是,即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没有人从中央计划或其他基

于权力的 OS 开始,就像其他的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一样,所有人都同意并认为“一开始就有市场”是更“方便”的。

从方法论上来说,完美的竞争被赋予了特殊的角色,产生了双重问题:第一,通过假设存在一个原始的机构和一个原始的互动模式,后瓦尔拉斯经济学避免了解释它们,从而将它们视为普遍;第二,通过识别完全竞争市场体系这一起点,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绝对理想化的机构和它的运作模式。如果他们假设一个纯粹的计划的起始点,有严格的独裁关系,或者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权力的混合制度安排,那么将会更有条理地使用他们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完美的规划比完全竞争更优越)。然而,他们可能无法解释这些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部权力关系,因此,这个项目无论如何都是矛盾的。

但完全竞争选择作为一种自然预定的 OS 也是很遗憾的,因为它从市场换成一个常见的历史制度。威廉·达格(William Dugger, 1992, p. 89)指出:

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是上帝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它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自然市场是超越人类意志的。它是大自然现有的、在历史之外的产物。……但自发的市场、天然的市场,则是一种假设。它不是一种单位,要被追究和调查。相反,它是一些假设,理所当然……市场作为唯一真正的循环过程,只不过需要假定市场是存在的。它被视为自我生成的现象,原罪和童贞女所生的产物。

这种观念上的竞争不是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互动模式,而是历史之外的普遍范畴。

结 论

显然,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逻辑是直截了当的。在完美的 DMC 中定义的瓦尔拉斯模型中没有权力关系的空间。这与日常生活相矛盾。必须从完美的 DMC 中找出权力的原因。然而,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在静态框架中,像瓦尔拉斯学派一样,在不引入缺陷的情况下定义基于权力的 OS 是可能的。因此,从逻辑上讲:(1)没有理由拒绝完美的 DMC 来研究权力关系;(2)在完美的 DMC 中,没有理由对完全竞争的 OS 赋予特殊的角色。任何可能基于纯粹竞争、纯粹权力关系的操作,都可以假设,但其中的一些可以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解释。

第二,在进化的框架中,像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一样,一般均衡的

唯一性与稳定性的负面结果使得比较静态的使用变得矛盾。这令人怀疑这种方法的整体解释逻辑。

第三,在完美的DMC框架下,有一些等价定理,表明瓦尔拉斯OS并不是唯一与帕累托最优相容的。因此,在这些比较静态分析中,没有理论方面的理由来假定最初的瓦尔拉斯OS。起初,市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陈述,没有理论依据。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任何帕累托最优OS都可能是一个连贯的起点。

第四,在更仔细的考察中,完美的DMC市场失灵的存在表明,瓦尔拉斯OS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甚至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就有市场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偶然地出现一个纯粹的市场体系,在这种进化逻辑下,它将很快被经济上优越的OS所取代。严格地说,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框架中,一开始有层次和中央计划(唯一与帕累托最优相兼容的OS)是唯一一致的起点。

总而言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是错误的假设和弱逻辑演绎的严格性的混合物。这是这些创建者准备付出的代价,目的是为了提供一幅现有的权力关系图,作为帕累托最优解,以满足预先考虑的分配问题。

这些理论上的批判是所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内部的问题。这表明瓦尔拉斯经济学在自己造成的矛盾中坍塌了。它在摇摇欲坠的建筑上又造了一幢摩天大楼,当这幢大楼遭到谴责时,它就这么倒了。这种方法非但没有扩大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解释性框架,反而扩大了其矛盾。后瓦尔拉斯经济学通过简单地忽略其理论方面的死胡同来发展瓦尔拉斯经济学。

这些理论矛盾有助于我们理解本研究项目的意识形态偏差。它们也间接地阐明为什么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派这样看待权力问题。但要充分把握这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权力的神秘概念,我们现在必须从理论批判转向元理论,并讨论这种方法的方法论、本体论和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 Anderson, Sarah, John Cavanagh and Thea Lee (2005), *Field guide to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Arrow, Kenneth and Gerard Debreu (1954), 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vol. 22, pp. 265—290.
- Arrow, Kenneth and Frank Hahn (1971),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 Bowles, Samuels and Herbert Gintis (1993A), Power and wealth in a competi-

- tive capitalist econom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21, n. 4, pp. 324—353.
- (1993B). The revenge of homo economicu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 1, pp. 83—102.
- Debreu, Gerard (1959), *Theory of valu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4),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vol. 1, pp. 15—23.
- Dugger, William (199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in Dugger, William and William Waller (eds), *The stratified state: Radical institutionalist theories of participation and duality*, London, M. E. Sharp.
- Fisher, Franklin (2011), The stability of general equilibrium—What do we know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in Bridel, Pascal (e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A century after Walras*, London, Routledge.
- Hahn, Frank (1982), Stability, in Arrow, Kenneth and Michael Intriligator (eds), *The 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vol. II,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Kantorovich, Leonid (1939), *Matematicheskiye metody organizatsiyi planirovaniya proizvodstva*, Leningrad, Leningrad State University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1960); Mathematical methods of organizing and plann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6, n. 4, pp. 366—422.
- (1965), *The best use of economic resources*, Oxford, Pergamon Press.
- Koopmans, Tjalling (1951 ed.), *Activity analysis of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1960), A note about Kantorovich's paper 'Mathematic methods of organizing and plann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6, n. 4, pp. 363—365.
- Mantel, Rolf (1974),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aggregate excess demand,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7, pp. 348—353.
- McKenzie, Lionel (1954), On equilibrium in Graham's model of world trade and other competitive systems, *Econometrica*, vol. 22, pp. 147—161.
- Pareto, Vilfredo (1897), *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 professe a l'universite de Lausanne*, 2 tomes, Lausanne, F. Rouge. English translation (1971):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 M. Kelley.

Rizvi, S. Abu Turab (2006), 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 after thirty year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8, pp. 228—245.

Sonnenschein, Hugo (1973), Do Walras' identity and continuity characterize the class of community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6, pp. 345—354.

Stiglitz, Joseph (1993), Post Walrasian and post Marxia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 1, pp. 109—114.

Walras, Leon (1874), *Ele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 ou théorie de la richesse sociale*, Paris, R. Pichon and R. Durand-Auzias. English translation (2003):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Or the theory of social wealth*, London, Routledge.

Weintraub, Roy (2011), Lionel W. McKenzie and th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a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5, n. 2, pp. 199—215.

Williamson, Oliver (1993), Contested exchange versu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 1, pp. 103—108.

第四章



权力去神秘化

为推论的方便起见,假设在一开始就存在市场。

(威廉姆森,1975,p. 21)

当政治经济学家试图进行解释时,不要让我们回到虚构的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的情况什么也解释不了。它只是将问题推向一个灰色的模糊地带。根据假定的事实,应该推断出事件的形式是什么……神学以同样的方式解释了人类堕落的邪恶起源,也就是说,它以历史的形式假定了必须解释的事实。

(马克思,1844,ch. 4)

在这一章中,我将讨论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它所预设的本体论和它的意识形态。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方法论、本体论和意识形态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它的方法论、本体论和意识形态的假设都与瓦尔拉斯模型相一致。在这点上,我会批判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把这些假设发展成一个神秘的权力概念的方式。

首先,我讨论方法论。为了回答自身的科学问题——这是由瓦尔拉斯的观点衍生出的,但并不吻合——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介绍了两种新的解释类别:缺陷和机会主义。然后,我会批评将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模式,解释真实的历史进程的做法。我特别关注威廉姆森,他已经明确地将他的市场层次结构框架作为一种解释制度演化的工具,我还讨论了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学者们试图将实际的制度配置解释为帕累托最优的想象过程的产物。

瓦尔拉斯经济学方法论预设了一个特定的本体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本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不足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问题有两方面:首先,它假设资本主义与自由承包相吻合;其次,它混合了生产和流通等领域。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没有发展任何明确的本体论;其基于有缺陷的具体方法为本体论提供了新的条件。因此,我的批评将继续讨论: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继承而来的这两个问题是如何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更复杂的本体论中呈现出来的。

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的“科学批判”。然而,我的“去神秘化”工作仍在继续,讨论的是一些科学以前的元素,这些元素引领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们去定义他们的科学问题。在科学的学术概念中,科学问题的选择通常不是批评的对象:研究者应该自由选择他们的科学问题,而不是被要求为这些选择辩护。然而,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对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的接受和对完全相同的科学问题的定义——从极端自由主义者到激进分子——都是这一现象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加以批判地审视。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分类

从方法论上来说,缺陷和机会主义是权力关系存在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两个类别都是历史上定义的。结果是一种对权力的历史性概念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真正胁迫形式。让我更仔细地介绍这些解释类别。

不完全

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历史时间等不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特有的;相反,它们在任何历史环境中所有人类关系的特点。显然,合理性原则和不完善之处会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但每个社会都有其不完善之处,存在着各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不可逆的现象等。因此,根据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逻辑,所有社会系统中都存在着权力关系,因为它们的起因——缺陷——是无处不在的。

现在不是讨论这种说法是正确或错误的时候。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所有的社会都基于一定的劳动分工,而其成员的专业化程度则被认为是建立在权力关系之上的。在方法论问题上,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历史范畴来解释历史进程。

这种方法意味着权力关系是一直存在的,甚至先于历史关系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竞争。然而,它们是不可见的并且无法通过科学调查来检测。只有在资本

主义的历史发展以及由此产生完全市场模式和完全竞争模式(以及基于不完全对称性模型)的可能性下,它们才能被看到。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必须认为自己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唯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永恒的权力关系终于可以显现出来,这是瓦尔拉斯模式的一个例外。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不同的。市场互动和经济竞争根本不是永恒的社会协调的形式。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经济竞争在近代才成为社会协调的主要形式。如果前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缺乏发达的市场,没有受到经济竞争的约束,那并不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正如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所建议的那样——而是由于市场的缺乏。

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合理性原则。从方法论上讲,这是一种以不完善为特征的 DMC 中对瓦尔拉斯经济学最大合理性的概括。新奇之处仅在于,在可违背合同的 DMC 中,最优策略可能是承诺一件事,而所做又是另外一套。因此,优化和机会主义在 DMC 中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会主义的引入本身是引入缺陷的后果。

作为瓦尔拉斯范畴的方法论的副产品,机会主义是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被引入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崛起被假定为一个自然的事实,是人类本性的后果。因为某些原因(我将在后面讨论),与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相比,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更被工人的机会主义所吸引。然而,即使是工人的机会主义,也主要被看作一个永久的问题,是源于工人的天性,而不是某种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

在关于工作的讨论中,马克思(1867, ch. 10)指出,设立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是几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并不能认为工人的行为就是“作弊”,因为还不存在一名普通职员应该做些什么的社会标准。只有当制度性的纪律机制出现时(由米歇尔·福柯做了研究),工人才可能分为“正常”和“堕落”,而那些更不愿意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纪律的人可能会表现为“作弊者”,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术语,或者按照福柯(1977)的说法,甚至可以描述为“疯狂”。

与此同时,马克思从资本家这一面描述了机会主义的发展:例如,1840年后,在英国颁布的工厂固定一天工作长度的规定,大量的作弊是在雇主这边,而雇主只是为了获得额外劳动时间而调整工厂的时钟。

尽管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派将机会主义视为一个自然的起点和一个普遍的原因,但事实上它是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将劳动转变为异化的劳动,并将

生产手段的所有者转变为资本家。这些是监督和约束劳动力出现问题的先决条件。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一个历史性方法论无法解释它试图合理化的问题的历史性质。相反,它表明,约束劳动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原因必须是历史范畴的。然而,从历史上看,问题和原因都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

权力和竞争

基于一个历史范畴的方法论工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一个历史范畴。在这个概念中权力只作为违反了完全竞争而存在。它与竞争并存,因为在不完美的DMC中,它拥有两个协调机制,而不是一个效率更高的协调机制。但权力和竞争并存并不是历史性的,而是作为抽象形式的人际关系。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甚至没有试图解释在资本主义中权威和强制机制发展的真正过程,并将竞争转化为一种强制力。相反,它以一种与竞争不相容的方式来定义权力。竞争是如此的空洞,其强制性和资本主义中存在的强制形式被找了出来。竞争的无权力本质不是分析的结果,而是一个定义。瓦尔拉斯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科学支持竞争作为自然和社会有益的机制的神话,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无可奈何地支持了新的神话:竞争是自由的统治,没有权力和强制的空间。

然而在这里,我们还有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入侵,隐藏在明显的方法论选择的背后。从方法论上来说,这种权力和竞争概念问题是抽象的、互不相容的,这意味着这个框架无法解释两者。它必须假设一个,以描述另一个作为它的反例。因此,在这种方法下,竞争和权力是完全对称的。那么为什么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会不对称地对待它们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一例外,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把权力当作解释竞争的现象,将其视为一种自然而永恒的范畴,不应得到科学的解释。“从一开始就存在市场”是威廉姆森明确的出发点。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在原子代理商和完全竞争范畴内,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相比之下,权力被看作一种不自然的现象只是因为它不存在于瓦尔拉斯模型中。这是问题的根源。

竞争是个体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自然模式,这一观点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评。正如他所说的,在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中,“私人利益已经是一种社会决定的利益,只有在社会和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马克思,1857,笔记1,关于货币的一章)。因此,竞争不仅是个体根据自己的先天偏好追求自己的自主目标的机制,而且是一种社会个体的协调模式,它具有趋同和分化的社会利益,主要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竞争不能先于社会交往,而是一定会遵循它。

在解释权力是对完全竞争的侵犯之前,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应该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竞争作为他们的出发点。如果他们甚至都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只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中,竞争表现自然,而瓦尔拉斯的模型只会使这种表象形式化。

经济史

在关于权力的辩论中,威廉姆森(1975,1980,1985,1996A)对用静态方法解释历史过程进行了精确的讨论。让我们跟随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推理模式来进一步解释。在他的市场等级制度框架下,他将资本主义制度解释为从一种假设的完全竞争的OS开始,向经济最优性进化的产物。然而,他的论点纯粹是推测性的。他没有研究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但分析了使制度安排有效的条件,并由此推断出它们的历史性出现。

请记住,“在一开始就存在市场”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权宜之计引入的,在比较静态的背景下,这种假设不是限制性的。然而,在构建了他的市场体系框架后不久,威廉姆森就用它来解释了一些历史进程,并参与了关于等级制度起源的历史争论。例如,他论述了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1965)的著作,他强调,在技术发展和工厂制度的影响下,需要对等级管理和控制进行监督。具体来说,威廉姆森批评了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玛格林(1974)的著作,他认为对企业等级制度做权力导向性的解释具有较弱的解释力。针对这些理论,他认为,工资—劳动、企业—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度都是出于效率的原因自愿选择的,没有任何形式的胁迫。^①

但是由于论点是演绎的而不是历史的,威廉姆森被迫创造了一个历史进程,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基础模型的有效性是无关紧要的。似乎是“预测力”,而不是历史的准确性,推动了这一论点(参见弗里德曼,1953)。作为一种历史方法,这几乎是荒谬的,因为我们对过去认识的有效性,不能从定义上看作它的预测能力。对威廉姆森来说,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方法是,假设在历史上,

① 这个假设继续被另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5)所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所发展,从张五常(Cheung,1983)跨越到普特曼(Putterman,1995),分别从契约论和激进的视角。然而,研究劳资关系的历史学家和牢固的等级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汤普森,1978,1993;霍布斯鲍姆,1964;鲁尔,1986)还是权力导向(玛格林,1974,1975,1991),抑或技术导向(朗德,1969;伯格,1984,1991;波拉德,1965),甚至受后结构主义解构的影响(伯兰斯坦,1993)——所有这些似乎都汇聚到一起,即资本家的等级制度强加于工人和企业家身上,工人和独立的生产者面临很大的阻力,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童话故事中没有任何对“自愿交换”的描述。

同样的运行机制是无处不在的。然而这导致了他在历史方面的严重缺失。

威廉姆森实际上不考虑严肃的历史研究,他被迫讲一个符合他理论的故事。他不会尝试解释实际的事件,充其量只能(但可能不能!)说明可能的历史发展。这个故事并不是从“曾几何时……”开始的,而是让我们假设世界仿佛是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就像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一样,历史被视为对模型的概念没有影响;相反,历史对模型的有效性是“假定”的(阿克罗,2002)。但是,由于历史上等级制的生产组织先于市场体系,封建主义先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无产阶级等都是历史产物,威廉姆森的理论假设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困境。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威廉姆森描绘了微观经济理性的代理人,他们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市场凌驾于制度之上、资本主义高于封建制度,计算他们各自的效率来选择资本主义。^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理性选择和效率选择的论证都面临紧张的局面。如果假定市场在选择之前就存在,那么没有人会在历史上选择它来提高效率(即无法从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市场)。换句话说,如果市场被看作有意识的选择,市场就不能被看作进化的无意识的、“自发”的结果,或社会的自然选择。

威廉姆森被夹在中间。第一个论点坚持有限理性,效率通过选择来保证。面对批评,这一论点从理论上讲是不健全的,造成历史是错误的,威廉姆森重新提出了第二种观点,即全面的理性经济学,它选择了最好的制度体系。而当这被批评为隐含的庞洛斯主义时(格兰诺维特,1985;霍奇森,1998,1991,1994),他又提出了有限理性和选择(威廉姆森,1996A)。

威廉姆森试图通过逃避来解决这些难题。市场无处不在。资本主义微观理性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即使在没有价格和市场的情况下)。但他的假设在历史上并不成立,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其他制度的解释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它们仍然不够充分。因此,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如何解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消失了。但事实是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市场也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原因。

历史和效率

将实际现象解释为假想的历史过程的产物,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一个普

^① 这也是诺斯(North)在他的新的接近于经济史的体系方法下形成的一般方法(诺斯和托马斯,1973;诺斯,1981)。

遍特征。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方法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要多。首先,从理论上讲,没有理由认为一个系统应该朝着帕累托最优的方向发展。虽然假定现有的帕累托最优均衡是稳定且唯一的,但其他情况则不然。更一般地说,这个过程的演变效率一直受到制度主义学者的批评,他们拒绝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霍奇森,1994)。

其次,从方法论上讲,这一实用主义的解释模式假定现有的规则和制度必须是最佳的(否则它们就不会存在),并且维持现状是所有可能中最好的。这带来了理论的规范性或积极内容的模糊性。乍一看,这一理论的目标似乎仅仅是规范性的:问题不是要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而是要指出不同的互动模式及有效解决预定的经济问题的条件。然而在此之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使用他们的规范性框架来解释现实,并假设它是有效的,但它很可能是凭经验观察到的。

关于经济史学家,他们因此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是从过去开始解释现在,相反,他们从现在开始,认为现在在经济上优于过去。

这个奇怪的历史方法使得对真正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一定的问题。只有从对真正的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考察开始,我们才能了解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渊源。相反,如果我们通过假设一个想象的系统来开始我们的演化理论,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到一个假想世界的理论解释。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现实,则假设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否则,我们会认为这个系统是一个完全理想的系统,与真正的资本主义没有关系。

无论制度变迁的引擎是什么,我们都期望目前的制度安排是前面安排演变的产物。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原始的理想系统从未存在过,我们就会阻止自己去理解真实的、实际的系统。只有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历史事实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全无关时,我们才会选择原始的制度背景,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

而且,即使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也并不存在,或者它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次要的作用,但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市场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不是试图通过前面社会的演变来理解实际社会,而是假装理解过去,就好像它是按照与现在一样的原则运作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们讲述的资本主义的故事,就好像它的机制和原则一直存在。但是,由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得不摆脱历史,创造一个虚构的故事。市场一直存在的假设是不可避免的。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是建立在一个符合理论的故事基础之上的,目标是根据理论来定义现实,而不是提供解释现实的理论。

自由契约、不完全和阶级关系

假设在资本主义之前,没有出现任何封建主义或其他生产方式,这是由利昂·瓦尔拉斯提出的。权力关系的本质并不是研究调控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的权力关系的转变;相反,它被解释为真实资本主义与抽象瓦尔拉斯模型的背离。

根据瓦尔拉斯经济学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定义,完全信息和自由契约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权力关系的世界。从理论上讲,这是为什么瓦尔拉斯经济学需要不完全假设去处理与权力相关的现象的原因。合同代理人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他们“自由”地在合同上签字的事实并不是他们权力关系的潜在原因。他们在生产中的不同角色,即作为反对社会阶层的成员,在他们的权力关系中没有解释力。相反,其隐含的假设是,合同是在真空中签订的,只有主观选择才是重要的。

正如马克思(1867, ch. 6)所表明的那样,自由契约只是资本主义正确关系出现的历史条件之一。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工人关系的出现,劳动者必须是双重自由的:“作为自由人,他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自己的商品来处理,另外,他没有其他商品出售,缺乏实现其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

自由契约和生产资料的缺乏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两大要素。在资本家的权力关系中,没有滥用,没有不对称的信息,也没有有限理性。后者服从前者的事实,甚至不是马克思本体论中问题的实质。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取决于他们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剥削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强制性本质并不是在孤立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单一人际关系中体现的,而是在社会阶层中分离人群并重现这种社会结构的社会机制中寻求到的。

在这一本体论中,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再生产条件——一个人自由的交换和生产中的社会胁迫都是同一种剥削方式的一部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则是向右拐,他们确认劳动者是自由的个体,每当他/她想要离开时都可以随意离开资本家。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资本主义不会仅仅依靠杂货商和顾客之间的交换来重现自己。在自由契约的抽象符号中,这种关系就相当于资本主义中工人的关系。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中,硬币有着另一面。工人仍然可以自由地切断与资本家的关系,但他/她的选择自由是非常奇特的:他必须服从一个资本家或选择另一个资本家来服从(或者更现实一些,希望被资本家选中)。在一个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中,工人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不与任何想要指挥

和剥削他/她的资本家发生关系。

这不是一个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或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工人可能知道或无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他/她必须接受资本家剥削价值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都是游戏的规则，如果他/她不接受，他/她将不会得到任何的生存手段。这并不是说不完美是毫无用处的范畴。相反，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更精确的本体论中明确地介绍了这些，很显然，不对称的信息、有限理性和其他的“不完善”就会改变现有的权力关系。但是并没有创造出这样的环境：如果一个工人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或者理性受到限制，他/她可能会接受比他/她的同事更糟糕的条件。然而，即使是最理性、消息最灵通的工人，如果他/她还没有做好服从和被利用的准备，就永远找不到工作。

相比之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则在一个矛盾的本体论中引入了不完美，在这个本体论中，资本主义被简化为自由契约。在瓦尔拉斯模型中，这种假设被加上了完美的DMC。其结果是一种假设，即唯一的协调机制是竞争。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本体论中，自由契约是在一个不完美的DMC中进行分析的。其结果是一种权力关系存在的概念，除了竞争之外，是通过建设来改善缺陷。

这表明，在一个社会中，契约是个人自由的最高表达形式，而权力关系只有在其运行存在问题时才会出现。鲍尔斯和金蒂斯批判瓦尔拉斯模型通过假设“握手就是一次握手”——如果你做一个交易，你就必须尊重它——来简单地处理这些问题。然而，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世界，事情并不是如此：机会主义者的握手不再是一次有效的握手，但是就像在瓦尔拉斯的世界中，合同仍然是合同——如果你签字，那是因为你想签。

在这一概念中，权力和胁迫只有在合同受到侵犯时才出现。马克思的批判是如此被忽视，甚至没有考虑到它：在寻找这种生产方式的强制形式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理论关注的不是合同有时被侵犯，而是它们普遍受到尊重。

无生产交换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时，现有市场的假设与政治经济的历史一样古老。对这样一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假设提出批评的传统，并没有新意。后者说明：“生产可能发生在没有交换的情况下，但交换的事实——它只是产品的交换——在没有生产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恩格斯，1877，p. 186）

在对权力的辩论中，交换和生产之间的区别被弗雷德里克·傅立叶所解决（Fourie, 1989, 1991, 1993）。他也认为交换是以生产为前提的。因此，从逻辑上

讲,公司先于市场,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的交换。

傅立叶(1993, p. 44)说:公司可以存在于无市场的情况下,即不以物易物或交易。然而,与公司不同,市场无法生产。因此市场关系只能连接到(生产单位)公司。……市场和企业并非互相替代的生产方式,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尽管一些公司可能在实践中形成或调整以消除或避免市场(交易所)交易,但所有公司的出现和存在是不能用交易成本来解释的。

因此,市场是一个原始机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没有解决生产问题的机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关于公司性质和权力起源的平行辩论的起点上,公司性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即公司是一个生产单位(傅立叶, 1989, 1993, 1993; 迪特里希, 1994; 哈利勒, 1995)的事实。即使在没有缺陷的情况下,仍有一些生产单位而不是市场,例如,家庭、家族或公司最终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运作。如果要分离市场和公司,首先公司必须被视为生产组织。

试图解释公司作为市场的替代品在本体论方面没有意义。一种是生产性组织,另一种是交换机构。与其用机构来解释组织,不如用其他组织来解释组织。资本主义的公司不能取代市场,但可以替代其他的生产单位(庄园制、家庭生产、生产系统等)。

在后瓦拉斯拉斯经济学中,所有的经济机构都被构造用来解决同样的问题:稀缺资源的分配。有一个经济问题和一些工具——替代经济体制——来解决这个问题。^①诉诸不同工具的必要性取决于复杂 DMC 的假设,其中每个 DMC 都可能失败。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替代关系:为一个机构保留的空间只能由其他机构接管。在本体论中,市场与企业的共存是不同工具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我们假设它们失败的原因,那么每个制度体系将变得完全一致。

但是,倘若我们认识到,如果不处理其他功能,就不能执行分配功能,那么单一机构系统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假设生产单位的存在,没有它就没有任何交换。虽然这些组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交换机构发挥交换功能,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交换机构重合,但它们与市场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的替代关系。在资本主义中,效率较高的组织和市场是相互补充的。用马克思的话说:

孤立于社会的个人的生产……是荒谬的,这就像语言的发展,没有人生活

^① 即使是诺斯(1981, p. 41)也指出:“所有现代新古典主义文献都将公司作为市场的替代品来讨论。[这]忽略了历史的一个关键事实:在价格市场化之前,是以层级组织形式和合同安排来进行交换。”

在一起,相互交谈。这里也没有必要针对这点进行更长的论证。如果这是废话,那这个观点不可能被提及,这对18世纪的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它没有被认真地拉回到现代经济学的中心。

(马克思,1857,引言)

简而言之,纯粹市场的原始制度的概念在内部是不一致的,因为交换机构的工作需要有生产组织的存在。

生产、流通以及自由贸易

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描述为商品生产体系的过程中,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离。这种分离使他可以讨论资本如何看起来是生产性的(在流通中),尽管它具有非生产性(在生产中),并批判基于流通的经济概念。

在流通领域,资本家和工人一开始并不是作为社会实体出现的,而只是作为交换商品的个人出现。因此,他们似乎是在相同的位置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纯粹基于自由意志:“只有独裁统治自由、平等、财产和边界。”马克思如是说(1867,ch.6)。但在交换之前,必须生产商品。在讨论直接在流通领域产生的权力形式之前,马克思解释了从生产中产生的强制形式。正如他所写的:

离开这个简单的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他为“自由贸易者”提供了他的观点和想法,以及他根据资本和工资来判断社会的标准,就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感知戏剧人物的外貌变化。他以前是货币所有者,如今在资本主义面前大步前进,他拥有劳动力就像这是他的劳动力一样。一个是一种重要的、傻笑着的、专注于商业的人;另一个人则胆小怕事、退缩,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东西藏到市场里,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就是藏起来了。

(马克思,1867,ch.6)

通过对生产领域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资本家阶级占有他们没有生产出来的价值。这种形式的社会剥削也是造成资本家和工人在工作场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控制和监督生产过程的需要是从工人的劳动权利中榨取活劳动力过程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的不同部分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讨论,并解释了公司内部组织和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如何根据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发展的方式。他举例说,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的发展是非常不同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对同一问题的反应:在一个案例中,从工人的劳动权利中榨取的活劳动力被交给一个管理者,在另一个案例中,则是交给工人自己(马克

思, 1894, ch. 27)。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 如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 1974)、玛格林(Marglin, 1974, 1975, 1991)还有爱德华兹(Edwards, 1979)通过讨论20世纪资本主义公司内部阶级关系的演变和不同形式的权力、权威和等级制度的发展, 形成了这一概念。在这些作者的成果中, 社会剥削和人际权力关系是辩证联系的: 一方面, 社会剥削阶级关系是工作场所人际权力关系的原因;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公司内部的权力形式的演变改变了阶级关系, 也改变了剥削率。

在本体论中, 在生产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形式与必须在流通中发生的交换联系在一起, 以使系统能够自我复制。资本主义生产从销售工人劳动力开始。通过购买这种商品, 资本家获得了处理它的权利。这不是价格问题。工人可能会以高价或廉价出售, 但出售他/她的劳动力的行为会使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对他/她产生一种人际关系的权力。

然而,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对权力的态度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和它的再生产机制开始, 而是从一个抽象的模型开始的。这个模型基于一个本体论, 它实际上是一个循环的子集合, 一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一个更复杂的本体论, 仍然以纯粹的循环为基础, 而流通中却包含了不完美。即使是生产的中心关系——资本主义工人关系, 也被认为是一种交换形式, 这种交换发生在复杂的DMC中, 但仍然是一种流通现象。

在流通领域内, 不可能产生价值, 只有等价交换。因此, 如果在一个均衡的位置上, 个体资本家对个体劳动者拥有权力, 那只是因为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交换之前, 信息优势属于工人, 就像他/她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一样。在交换之后, 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并且在工人的口袋里相当于货币。

在这个本体论中, 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价格不是简单的工资,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而是它的一部分。从定义上讲, 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 市场结算工资不涉及权力关系。后者只有当资本家支付额外的钱来诱导工人自律时才会出现。因此, 权力是一种商品, 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购买商品——除了他/她的劳动能力——以提高他/她的生产力, 就像他购买机器、工具和创新技术一样。和所有商品一样, 权力也有其均衡价格, 它被定义为补偿工人的金钱,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 对资本家来说, 生产的价值独立于价值的真正起源, 是由他投资的总资本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的激进分子通过正式将权力纳入商品统治, 保留了这种表象。如果资本家购买机器或权力关系, 那只是因为预期收入的增加大于投资的成本。对他来说, 权力关系是生产要素, 与他购买的任

何其他工作工具一样,都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因此,在购买一种权力关系之后,生产价值的增加似乎是资本投入在这一投资中的一种效果,而不是由于工人的努力提升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相当于增加了从他/她的劳动能力中所提取的活劳动的数量)。

没有任何生产与流通之间的本体论分离,资本是生产性的,个人是平等的,这就成为资本主义的真正本质。在这个神秘的概念中,最终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必须直接在流通中引入,即使是在与资本家和工人打交道的时候。市场上的正式平等成为“自由”的同义词,而权力关系只有在不对称的市场关系中正式表现出来时才会被发现。资本主义的所有其他形式的胁迫都是不可见的。

但是,即便在这种基于循环的狭义概念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也没有形成一般的权力理论。与激进经济学家的说法相反,权力只能是这种方式的一个例外,不能成为规则。如果由于DMC的普遍缺陷,所有的员工都很难监控和被赋予信息优势,那么市场上就不会存在有竞争力的工资。因此,被解雇和失去工资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资本家对他们没有权力。请记住,在这个权力理论中,就像效率工资理论一样,工人只有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较低(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才会努力工作。换句话说,这个理论最多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工人与他们的雇主有一种权力关系,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一般的工人会受到资本家的权力关系的影响。相反,一些工人受权力关系影响的论证建立在标准工人不受权力关系影响的假设之上。

科学研究和文化霸权

在结束我对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权力概念的批判之前,让我来讨论一下在辩论中发展起来的科学问题的意识形态性质。如我们所见,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继承了自私的个人的假设。然而,它将谋私利的行为描述为“利润最大化”,即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逃避”或“欺骗”。这个问题不仅是术语,它反映了一种确切的、含蓄的意识形态立场。

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系列合同没有得到正确执行的例子:几个月不支付工人工资的雇主,不偿还储户资金的银行,不尊重其国际承诺的国家,妇女在工作场所受到工人的性骚扰。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扭曲,而是在一个以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中追求自我利益行为的正常影响。

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显而易见的是有权力而非无权力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机会主义。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当资本主义工人关系处于紧张时,后瓦尔拉

斯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人休息的可能性,减缓工作的速度,或者在工作中没有最大化他/她的努力,这可能是资本家比经济学家更关心的问题。这是关于监控、逃避、激励计划、委托代理问题和其他方面的文献的研究目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瓦尔拉斯框架已被应用于一些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如那些合同执行有问题的情况。然而奇怪的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并没有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每天都在虐待数百万工人的老板身上,他们没有办法(也许没有兴趣)把他带到法庭上去;或者是那些接受合同的人,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无论合同条款如何只能接受;或者是那些属于非法移民的工人,他们甚至都不愿签合同,但比其他他人更努力工作,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在有种族主义歧视的老板无法被取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通过假设,正如鲍尔斯和金蒂斯明确指出的那样,雇主的承诺是有法律效力的,而问题只存在于工人一方。

从形式上看,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并没有不对称。作为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会在每次增加预期效用的时候违反他们的承诺。然而在具体的模型构建中,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对两个数据进行了不对称的处理:一个是主管,另一个是监督;一个是主体,另一个是代理;而“科学问题”则是找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方法,促使代理人以最大的利益服务于委托人。隐性或显性地,资本家的利益被转化为社会目标。

从一场对称的冲突开始,后瓦尔拉斯学派引入了一种不对称性,并让自己服务于冲突各方。经济学家应该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不是从工人的观点,这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但一旦这个理论上的选择被含蓄或明确地采纳,所有的“作弊”“逃避”和“懒惰”问题就都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中,懒惰的人是工人,他们工作 7 小时 55 分钟(在厕所里“躲”了 5 分钟),而不是根本不工作的资本家。

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资本家对其雇员的机会主义做法。如果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是因为科学界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929, p. 35)在他的文化霸权研究和知识分子角色研究中指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倾向于将统治阶级的观点作为一种文化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既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影响。一方面,其科学问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问题在于监视和管理劳动。另一方面,通过将资本家的问题(工人的机会主义)转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人的纪律是一个普遍的目标,而且所有的研究都明确地表明工人的立场和利益是有政治偏见的,因此根据这一概念,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者采用新古典主义方法(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条路线之前,对资本家在工作场所的利益的科学辩护并没有隐藏在帕累托最优和次优解的问题后面。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工作中付出更大的努力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抵触。

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他在书中研究了如何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以及如何从他们的劳动力中榨取得尽可能多,其对政治和科学辩论的影响是明显的:他的工作不仅受到资本家的赏识,而且也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科学管理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新的大学教育学科和专业学术期刊。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这一管理方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受到了公开批评,即所谓的劳动过程辩论的发展。

泰勒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完全意识到他的财富是由于他有能力把科学放在为资本主义的服务中。相比之下,不大明显的是激进分子的真实意图,他们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作为纯粹方法论的问题,而不理解根本的本体论,也不讨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其理论的具体效果是明确的:在历史背景下,工人试图在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中团结和组织起来。而后瓦尔拉斯学派则致力于将资本主义的永恒问题合理化,并根据资本的需要来组织它,试图强化一种观念:权力只是一种人际关系。

结 论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科学选择到方法论和本体论。在对资本主义工人关系的分析中,从极端自由主义者到激进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都一致关注资本家的立场,从而为理顺和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做出了贡献。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已经不自觉地将一部分社会的问题转化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相比,这种选择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更强,试图在原子化的个体之间形成市场互动的优点。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更进一步,在同样的个人主义框架中,它不给阶级关系分配任何角色,通过将“经济问题”定义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来秘密地引入社会阶级。这种激进思想的意识形态退化,我认为是两个相互依赖的过程的结果:(1)在科学界,人们倾向于接受新古典主义方法论;(2)巩固文化和社会中的新自由主义霸权。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于两个主要部分:不完美和机会主义。这些是历史性的。由此产生的权力观念也是历史性的。权力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所

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目标是在一定条件下证明这是竞争的有效替代,其结果是一种权力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竞争是没有权力的。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观点中,资本主义的强制性法则并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而是缺乏竞争。

这些历史范畴是在比较静态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通过选择方便的假设这一初始条件,来对真实历史过程作出可能的解释。这种方法甚至并不试图解释作为过去过程的结果的现在意义;相反,它假定过去,以使现在出现帕累托优化。经济史学家在试图解释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供了一幅由矛盾、冲突、融合和分歧构成的当前图景。威廉姆森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认为现在是理性和效率的连贯表达,并创造了一个故事,其逻辑的终结实际上是由于现实。所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矛盾和妥协成了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一致性条件。这意味着,经济史学家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所讲的故事是相反的:从过去到现在是第一种情况,从现在到过去是第二种情况。经济史学家尝试解释历史,相反,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则讲述了一个童话故事,幸福的结局是现在。如果大卫·休谟(David Hume)极力主张,从现有的东西中推断出应该是什么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从应该是什么中推断出了结论,这在方法论上同样是不健全的。

这种方法对瓦尔拉斯模型的隐性本体论提出了新的条件。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资本家和工人不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社会实体,而是具有永恒的内在品质的个体。他们最终的权力关系只取决于这些品质以及他们与不完美的DMC的契合程度。一个是资本家,另一个是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也可能是一家银行和一家公司,两个国家,或客户和杂货店。只要模型的参数一致,权力关系的性质就是一样的。当权力在流通中出现时,只有等价物的交换会发生,如果一个人想证明在交换之后——当个人优势被货币化——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那么在交换之前的人际关系不对称就必须被认为是对其有利的。

当我们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权力的正式论证过渡到对权力关系的起因和机制的讨论时,结果就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了。相反,它是由瓦尔拉斯的模糊概念的逻辑发展而来。证据是,在这些模型中,权力是一种资本形式,因此,它被认为有生产力。但这也证实了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只不过是马克思批评旧资产阶级概念的一个复杂版本,在这个概念中,所有形式的资本都被概念化了。我的结论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对有争议的交换进行完美化是一个连贯的扩展。然而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在已经矛盾的观念中加入了新的矛盾。

为了解释为什么在这种方法中,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也将注意力集中在提倡极端自由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力概念上,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竞争。他们的权力概念的相似之处实际上是他们对竞争概念困惑的结果。因此,问题是对这一神秘概念的解释是如何成为整整一代学者的讨论的起点的,更普遍地说,竞争是如何在社会中以一种自然的互动方式和一种普遍的政治指南形式来肯定自己的。只有在对竞争进行有机的批判之后,我们才能重新回到权力,并在科学研究和阶级斗争中完成关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思想政治角色的讨论。

参考文献

- Ankarloo, Daniel (2002),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history*, *Capital and Class*, vol. 78, pp. 9—36.
- Berg, Maxine (1984),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London, Fontana.
- (1991), *O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hierarchy*, in Gustavsson, Bo (ed.), *Power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Berlanstein, Lenard (1993), *Rethinking labor history: Essays on discourse and class analysi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heung, Stephen (1983),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 1, pp. 1—21.
- Dietrich, Michael (1994),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beyond*, London, Routledge.
-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s Books.
- Engels, Frederick (1877), *Anti-Dühring.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7/anti-duhring (accessed 1 March 2016).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 Fourie, Frederick (1989), *The nature of firms and markets: Do transaction cost theories help?*, *Th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7, n. 2, pp.

142—160.

——(1991), The nature of the market: A structural analysis, in Hodgson, Geoffrey and Emesto Screpanti (eds), *Rethinking economics: Markets,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evolution*,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3),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markets?, in Pitelis, Christos (ed.), *Transaction costs,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riedman, Milton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Friedman, Milton (ed.)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amsci, Antonio (1929 — 1935), *Prison notebooks*.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gramscilprison_notebooks/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ology*, vol. 91, n. 3, pp. 481—510.

Hobsbawn, Eric (1964),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r*, London, Weidenfield and Nicolson.

Hodgson, Geoffrey (1988),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Economic evolution, intervention contra Panglos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5, n. 2, pp. 519—533.

——(1994), Evolution and optimality, in Hodgson, Geoffrey, Warren Samuels and Marc Tool (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Khalil, Elias (1995), Organization versus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51, n. 3, pp. 445—466.

Landes, David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glin, Stephen (1974),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Part 1,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6, n. 2, pp. 60—112.

——(1975),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Part 2,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7,

- n. 1, pp. 20—37.
- (1991),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Control versus efficiency, in Gustavsson, Bo (ed.), *Power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Marx, Karl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4/manuscripts/preface.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manuscripts/preface.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57), *Outline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57Igrundrisse/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Igrundrisse/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67),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 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index.htm) (accessed 18 April 2016).
- (1894),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II,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
chive/marx/works/1894-c3/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North, Douglas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North, Douglas and Robert Paul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llard, Sidney (1965),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 Putterman, Louis (1995),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information: On a paradox i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26, pp. 373—390.
- Rule, John (1986),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early industrial England 1750—1850*, London, Longman.
- Sawyer, Malcolm (1993),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he market, in Pitelis, Christos (ed.), *Transaction costs,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tiglitz, Joseph (1975), Incentives, risk, and information: Notes towards a theory of hierarch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 pp. 552—579.
- Taylor, Frederick (1911),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Thompson, Edward (197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nguin.

——(1993),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Penguin.

Williamson, Oliver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Contested exchange versu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 1, pp. 103—108.

——(1994), Visible and invisible govern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4, n. 2, pp. 323—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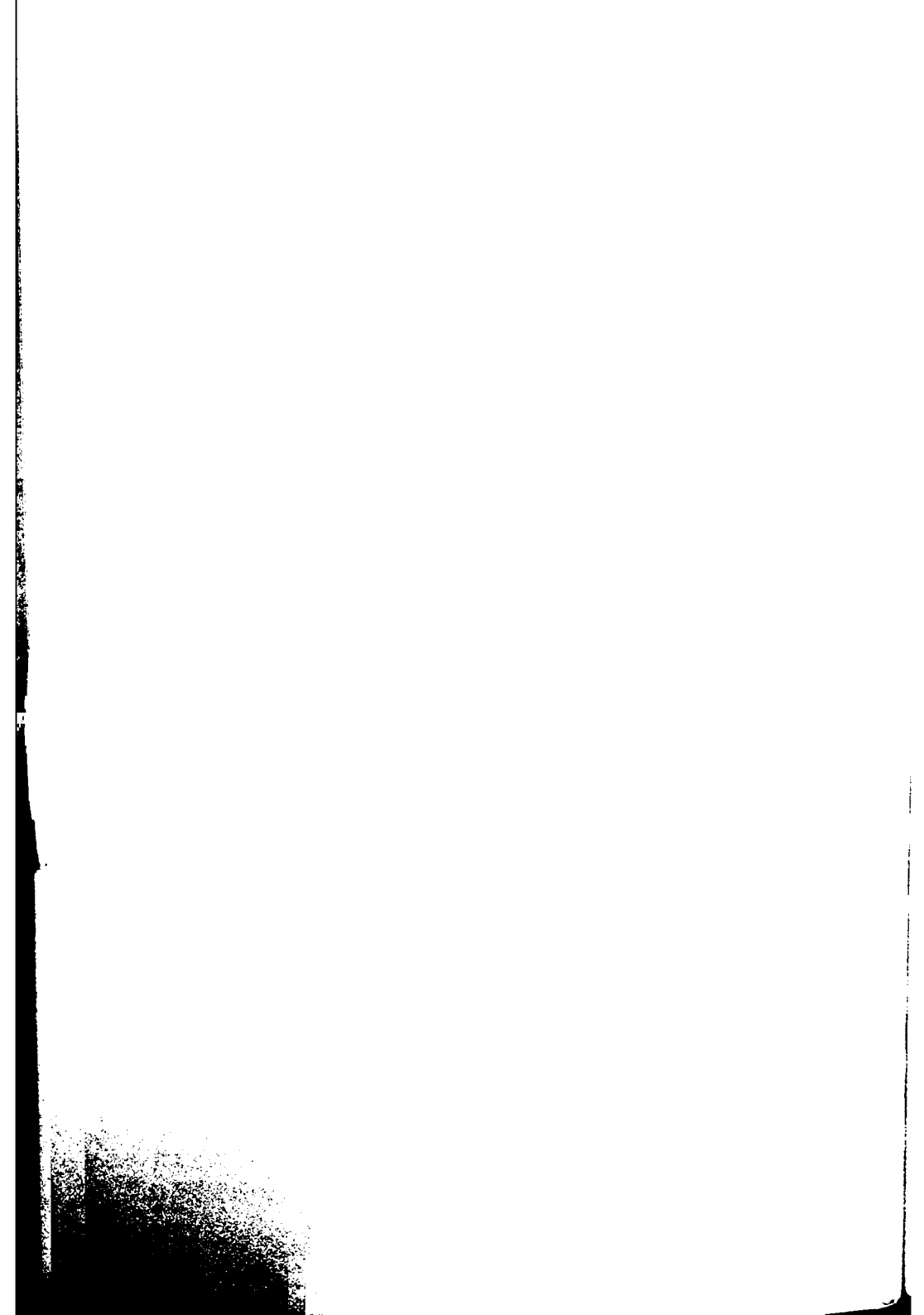
——(1995), Hierarchies, markets and power in the economy: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4, n. 1, pp. 21—49.

——(1996A),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第二部分 · ——



关于资本主义权力和竞争的
强制性法则的本体论



第五章



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

一切似乎在竞争中出现反转,因此在其代理人的意识中……庸俗经济学家实际上只是将处于竞争之中的资本家的单一概念转化为看似更加理论化和一般化的语言,并试图证实这些概念的正义性。

(马克思,1894,ch. 13)

竞争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是一个神奇的词语。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竞争是人类互动的一种自然模式,甚至是整个生物领域的一般互动形式。在这个概念中,科学问题不是要去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是如何成为一种机制的,或者说是社会协调的机制的,而是要评价它的经济后果。这种经济评估是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型来完成的。该模型基于不切实际的假设和概念问题,但是允许展示这种交互模式的优点:它的经济效益、伦理公正性和能力允许个人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喜好,没有任何形式的强迫和权力关系。在政治上,这些“示威”是过去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科学基础。国际机构、国家政府和资本家以竞争的名义推进资本流动、工作灵活性、私有化进程、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其影响是工人一直不稳定、加剧剥削和加速社会商品化进程。今天,反对竞争是非理性的、效率低下的,与个人自由和共同利益不符。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时期政治辩论的条件。

然而,竞争不过是一个自然现象。首先,其最终社会目标是阶级利益问题。正如恩格斯(1845, ch. 3)指出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是……无产阶级手中对抗资产阶级的最尖锐的武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科学问题不是评估

竞争的可取性,而是要了解它的运作方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马克思将竞争作为一种强制性机制,将资本逻辑强加于社会关系上,并管理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批判中,接受了无阻碍竞争的假设。然而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刻画一个完全与“人类固有权力的伊甸园”相互竞争的世界(马克思,1867, ch. 6),或者由平等交换和个人自由所统治的世界,而是展示了一个受到剥削和社会胁迫的世界。竞争的自由运作根本不是阶级利益和剥削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是阶级权力的最高表达形式和最大化剩余价值率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界定规范经济标准的尝试也是矛盾的。

对于那些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是过时的批评家,我认为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竞争的起源和发展的分析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方法,可以用来理解甚至导致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新变革,其中包括完全竞争和学术研究神话的兴起。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竞争观念,我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对资本主义胁迫机制的解释,而且在于科学地对抗后来的资产阶级观念和政治含义。

我首先选择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将竞争作为一种施加资本“强制性规定”的社会机制。然后,我重点关注社会总资本与个人资本竞争的区别。从表面上看,马克思证明了前者自然存在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实际上限制了后者的发展,而并非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考察了整个资本的性质之后,才能正确地理解资本之间的竞争。接下来,我将研究竞争的起源。的确,资本与竞争的关系表明,竞争不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人类互动模式,而是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协调机制。

我在论述中继续讨论了竞争作为资本规律执行者的作用,以及作为调节资本包容过程的机制。马克思与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类似,将竞争视为引导个人选择并产生超越个人意志的社会效应的方式。斯密(1776, book 4, ch. 2, par. 9)有个著名的比喻:“每个人都是由无形之手来领导,以完成终结,这不是他的意图。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他经常比他真正打算做的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发展“无形之手”的作用是他对资本积累矛盾进行批判的一部分,其结果是与斯密完全相反的竞争观念:看不见的手不能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而只能强化资本的矛盾。其社会效应不是个人利益的和谐重组,而是在资本原理下的全社会征服。

我结束了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和竞争的批判的重建,通过展示它们非常敌对的关系,讨论了关于竞争结束的问题。虽然在我对马克思的解释中,竞争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基本且必要的强制性机制,但它通常不是孤立的。管理阶级关系的第二个机制是联合。不同于竞争,联合不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而是有目的和故意选择的产物,往往被视为对抗竞争的反应。在具体发展中,竞争和联合往往会产生垄断的市场结构。卡特尔和市场力量只能取代竞争的市场结构,不能停止竞争机制的运作。它们并未标志着竞争的结束,而是往更高层次上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法则的执行人,竞争并不是被“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所取代,而是被资本主义终结。

最后,我讨论了完全竞争神话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扮演的角色。在社会商品化的过程中,竞争往往会把自己置于一个主观层面:由于竞争所控制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扩大,后者往往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力量,一种一直存在的互动形式,是人的本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只是把这些现象转化为数学语言,并为政治家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商品化的“科学”论据:当然不是明确地捍卫阶级利益,而是为了共同利益。

马克思著作中的竞争

在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竞争观念时,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解释说,在解释了“一般资本”之后,他打算把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处理。然而,“一般资本”一词并未出现在他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引起了争议。一些作者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实际上与“一般资本”相关,仅包含为此目的而严格必要的竞争内容。根据这样的解释,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找到关于竞争的系统分析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一生中甚至没有时间来完成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相比之下,其他人认为,马克思终于放弃了“一般资本”的概念,当他组织《资本论》三卷时,他将竞争分析纳入其中,部分归结于第一卷。

在《资本论》中,“竞争”一词在第一卷第10章中首次出现,题为“工作日”,马克思在书中解释了竞争是如何调节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剩余价值时的冲突的。然而,在第12章中,他很快澄清,他不打算在这里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法则作为强制性的竞争法则,并重申在对我们资本的内在本质概念尚未解释清楚之前,不可能对竞争进行科学分析。在我们认识到资本的内在本质之前,就像才观察到天体的表面运动,只有了解其真实运动的人才能有所理解,而这种运动是不能靠感官直接感知的。

只有在第三卷证明资本积累是增加剥削的结果之后,马克思才更加系统地

讨论了个人资本和交易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竞争的影响(罗斯多洛斯基,1977, ch. 2)进行了讨论。更确切地说,在第三卷第10章中,他解释了竞争在利润率均等化中的作用。他表示,生产价格包括平均利润,基本上与斯密的自然价格、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生产价格或生产成本一样。

然而,与他的前辈相反,马克思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无法解释利润的本质,并将其视为竞争的结果。马克思指出,竞争不是利润的原因,而只是通过其对生产价格的影响,使不同的经济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还指出,在每个行业中,如果生产成本是异质性的(查托帕答雅,2012),竞争往往会产生特殊价格,这意味着不同的利润率。

在书的最后一部分,马克思讨论了“竞争创造的幻想”(第50章)。他解释说,“竞争已经预示着利润的存在”,并批判在流通领域中可能产生利润和租金的观念。他的批判取决于他已经解释了第一卷前六章的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而没有反复提及竞争(除了讨论竞争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以及确定工资和正常工作日的长短)。

马克思从方法上解释了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里的概念,从资本的本质到资本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① 不过请注意,他的步骤并不意味着竞争只能在第三卷中出现。事实上,马克思的分析是从第一卷开始的,和他讨论资本积累(第七部分)时一致。

在这一阶段的分析中,我们假设了积累,而不是解释积累,马克思的目标是展示其对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的影响。马克思还没有准备讨论构成社会资本总额的各个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必须先对社会资本总额的发展规律进行分析。但具体而言,正是通过个人资本之间的这些关系,社会资本才会发展和积累。在第一卷的最后一部分中,虽然只有几次提及,但竞争都涉及积累。

如果没有对许多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中所提到的关于资本竞争的原因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蓄意行为”。但这是在竞争压力下的一种蓄意行为:“竞争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被每一个资本家所感知,并且作为外部的强制性法则。”它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本,以保存它,但是除了通过逐步积累的方式来扩大,其他方式都行不通。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资本论》中找到标注竞争的地方,事实上并不是

① 在这个方向上许多方法论的贡献(作用)都受到了价值论和转型问题方面的争论。

在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都有,而是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在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积累的段落中。

简而言之,通过假设资本积累,在第一卷的第七部分(以及从流通的角度看待同一个过程的第二卷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假设了竞争。这不是一个方法上的疏忽,而是一个明确的科学项目的结果。首先,他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将资本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在竞争中反复出现的事物(第一卷的前六部分)。然后,他专注于资本积累,他从它的一般效应开始,即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因此在第一卷(第七部分和第八部分)中确立了它的逻辑地位。在这里,竞争连同资本积累被隐晦地暂时“假定”。最后,马克思从社会资本的总量转移到许多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在这里,他表明竞争是对个人资本的强制机制,其总体效应是资本积累本身的过程。

因此,他在第三卷关于竞争的分析中,解释和证实了他的初始“假设”(或者说是用历史现象来解释),资本实际上是积累的。这样,《资本论》不是三部曲,而是一部统一的、有机的科学作品。因此,任何企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淘汰竞争的做法不应该被过度推行,因为他的经济范畴之间的线性、单向因果关系与他的辩证法几乎不相容。

除了试图将批判中的有机竞争整合在一起之外,马克思还在作品中对竞争进行了更准确的反思。就竞争的起源而言,恩格斯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提出了更明确的讨论,他认为这一点与私有财产和市场关系的发展有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处理了同样的问题,他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私有财产和所有它(包括竞争)的假定类别,并解释称它们是疏远的、被异化的劳动的结果。在第一卷未发表的第6章中,马克思重点关注竞争发展与资本中劳动包容过程之间的关系。最后,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从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工作中得到灵感,他发现了资产阶级竞争观念最明确的论据。

在马克思去世后,他的竞争观尤其是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中得到发展。垄断市场形式的历史性崛起,实际上反映了竞争与垄断的矛盾。鲁道夫·希尔弗丁(Rudolph Hilferding)的《财政资本》和列宁(Lenin)的《帝国主义》将竞争的不同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市场结构,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协调和胁迫机制的主要理论参考。

社会总资本和个人资本之间的竞争

马克思在对资本的系统性批判中,把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和众多彼此竞争

的个人资本进行了讨论。在现实中他注意到,资本表现为一种自主的个人资本,总资本只是作为它们的汇总而出现。前者似乎是资本的真实性质,而后者则表现为传统实体,没有任何真正的自主权。只有通过科学的分析,才能把握社会总资本的本质和构成它的个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资本之间的竞争之前,马克思分析社会总资本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方法选择或阐述上的权宜之计,更是一个本体论论证的结果。社会总资本不是任意的、虚幻的、抽象的。正如杰夫·皮林(Geoff Pilling, 1980, ch. 3, ch. 6)所说的:“这是一种谬论,该谬论认为抽象因素(比如一般资本的抽象)是通过渗透进事物的外观形成的,深入相关现象的本质中形成的,这就使得这种抽象是不真实的。恰恰相反,它们有一个强大的客观存在,正是因为抽象,它们拥有所有有关现象的财富。”

社会总资本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抽象物,它描述了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实体。它的存在是这个特殊阶级社会的直接后果,人际关系在个人层面上是自由的,但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作为个人,工人和资本家都是纯粹以自愿为基础的;然而作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前者必须给后者带来他/她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中,剥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人际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竞争不能成为剥削的原因。剥削是社会总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资本与单个工人之间的关系。

在努力获得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工人面临着一个总资本(尽管他们只能渴望进入这个社会整体关系中):如果他们不喜欢特定的资本家剥削他们,那么他们可以寻找另一个愿意更轻松利用他们的资本家,但他们不能逃避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工人没有义务用特定资本家的工资来交换劳动力,而是有义务用资本家的工资来交换劳动力,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性质。但是,这种剥削形式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是看不见的,在那里工人似乎只依靠他/她的特定资本,人际关系似乎在社会上是没有约束的,只是通过竞争来管理。

在本体论中,社会总资本不仅仅是自主的个体资本之和,它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构成它的特定的个人资本。相反,它是工人脱离生产资料的一种普遍和必要的后果,工人的生存取决于他们与资本建立关系的能力。当然,在每个具体的工资关系中,劳动者的劳动力只是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但如果工人必须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一旦他/她必须出售劳动力,就是因为他/她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因此,后者相对其某一成分自主存在,反之亦然。它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体工人和个人资本之间彼此竞争的众多关系的总体结果,而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的一般发展决定了这些对立阶级成员之间的单一关系。

通过只关注单一资本家和单一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无法理解支配所有人的一般关系。相反,人们的印象是,这些孤立的关系在社会上是不受约束的,因此可以按照所有可取的路径发展。这是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神秘表征的起源,他们并没有从分析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开始进行调查,甚至不接受社会总资本的存在,而是开始于抽象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真空社会中,只有渔民和猎人,鲁滨逊和星期五,或在关于权力的文献中,只有才华横溢的资本家和懒惰的工人——就好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于这种基于资本的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的。

事实上,在竞争中,只要工人愿意,他/她可以离开雇用他/她的个人资本,这个神秘的概念是重要的。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如果他/她真的这样做,他/她只需要找到另一个愿意雇用他/她的个人资本。正如马克思(1847A, ch. 2)所说:

工人离开了那个曾经雇用自己的资本家,就像他自己经常选择的那样,而资本家经常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解雇工人。但是工人不能离开所有的买家,即资产阶级,除非他放弃自己的存在。他不属于这个或那个资本家,而是属于资产阶级;是工人自己需要找到适合他的人,即在这个资产阶级中找到一个买家。

这名工人从个人资本中被解放出来,但与社会资本整体挂钩。这是资本主义强制性的特点:“罗马奴隶被羁绊束缚:雇佣工人通过看不见的线索与他的主人联系在一起。”(马克思,1867, ch. 23)

社会总资本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作用不仅仅是逻辑上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1857)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的一般特征也在经验上表现为国家的资本或地理区域的资本。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是社会总资本存在的经验表现之一。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对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影响了所涉国家的所有个人资本,无论国家的自治程度如何,这都是两国社会总资本之间的直接关系。

竞争的起源

社会总资本作为自主本体的发展,是了解竞争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转变为胁迫机制的关键。正如马克思(1857)解释的那样:“从概念上讲,竞争只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性质,它的本质特征是作为许多资本相互作用的表现,或作为外部必然性的内在倾向。”(资本是存在的,并且只能以许多资本的形式存在,因此,资本的自主性表现为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

竞争不是普遍和永恒的,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可能是一个观察因素。它的历史发展是资本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它的普遍性只是这种基于资本的新型生产方式的普遍化的结果。

从分析上看,解释经济竞争起源的第一个经济范畴是私有财产。用恩格斯(1844)的话说:

我们已经看到,只要私有财产存在,一切都归结于竞争……因为私有财产使每个人都孤立于自己的原始状态,而且尽管每个人都与他的邻居有相同的利益,但一个地主站在另一个地主的对立面,一个工人站在另一个工人的对立面。在这种完全相同的利益不一致中,身份所产生的不和谐,是迄今为止人类状况的不道德性的体现,这就是竞争。

然而,私有财产无法解释竞争在资本主义中的核心作用。事实上,只有当私有财产成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时,竞争才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协调机制。

在资本主义中,财产的特征不仅体现于它作为一种法律形式,还体现于它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最终,这种不平等分配将这两个阶级推到了劳动力市场的对立面。因此,财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中也是阶级关系(坎贝尔,1993)。个人财产的分配可以随时间而改变,但这些变化仍然是阶级关系的内部变化:一个人变得更加富裕,而另一个人变得更加贫穷。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只是产生一类所有者和一类无产阶级、一类劳动力买家和一类劳动力卖家。

在社会层面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可能被简单地定义为生产资料与工人的分离以及资本主义的垄断。财产的这种社会概念对于个人财产的变化是不变的。私有财产的这种双重性质——个人差异和社会不变性——在资本主义中并不是偶然的。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个人财产分配的变化和阶级财产的再生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查托帕答雅,1994)。

马克思详细讨论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以及私有财产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平行形成。他解释说,对于工资—劳动关系的出现,工人必须在法律上自由地卖掉他/她的劳动力,并在经济上依赖这种销售(马克思,1867, ch. 6)。然后,他讨论了产生“一方拥有金钱或商品,另一方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的历史环境,

以及产生这些阶级的机制。^①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发展和竞争的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一部分,并且相互加强:私有财产使个人相互抵触,释放竞争行为;经济激励的竞争有助于发展和推广财产关系。然而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路线略有不同。

恩格斯(1844,1884)旨在表明:所有的政治经济范畴和它们所对应的现实都预设了竞争和私有财产。然而,在他的批判中,他解释了竞争是私有财产的结果,但他对私有财产来源的处理主要是历史性质的。

正是马克思承担了在逻辑上解释私有财产来源的任务(克拉克,1991)。事实上,尤其是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把私有财产与另一种社会关系,即异化劳动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私有财产与竞争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他解释说,为了以财产的形式来分配劳动力,首先必须采取异化劳动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基础和原因,但实际上却是后果。但是后来,这种关系变得相互关联(马克思,1844)。

换句话说,马克思通过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来实现他的社会竞争观,在逻辑上将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类。恩格斯的重点是将社会阶层之间的私有财产的不均等分配作为再生产条件。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竞争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原因。^②

竞争与资本矛盾

通过资本法则,竞争将资本的矛盾性强加于社会,这种矛盾的本质就表现在资本—劳动关系的双方身上。

如前所述,马克思关于资本竞争的讨论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核心冲突开始,即工作时间的长短。在工人阶级内部,工人被迫削弱他们的劳动权力,并将工作中的努力和工作的时间最大化。这些都是被雇用的条件,是竞争对工人的要求。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内部,竞争迫使资本家尽可能地从工人的劳动权力中榨取更多的劳动力:不是因为他们的主观欲望,而是因为资本的客观需求。

① 马克思将《资本论》第1章第8节用于研究“原始积累”和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并把“粗俗的经济学家”称为对资本主义起源作抽象臆测的作者。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基于假设个体之间相互独立的推测方法,在今天已经成为新制度主义和后瓦拉斯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② 克拉克(Clarke, 1994)从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略有不同的理论目标出发,探讨了危机研究中竞争分析的不同含义。

马克思(1867, ch. 10)写道:

“我死后哪怕是洪水滔天!”这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因此,除非受到社会的强制,否则资本罔顾劳动者的健康或生命。对身体和精神退化、过早死亡、过度劳累的折磨的抗议,它的答案是:这些会让我们因为增加利润而烦恼吗?但是看整个事情,这些并不完全取决于资本家个人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形成了对每个资本家权力的外部强制。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好或坏的意愿”,而是尽量减少成本和保持业务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动力”。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竞争也往往会恶化劳动力,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工作日的不自然延长,缩短了个体劳动者的生命长度,从而缩短了劳动力的持续时间。”这增加了其再生产的成本,就像机器,每天重现价值的一部分,机器的有些部分也磨损得更快。如果没有能够抵制竞争的力量,剥削的必要性就会产生“过度开发”的倾向。就像一辆在进入下一个加油站之前就被过度使用并耗尽燃料的汽车,资本往往“过度利用”劳动力,使其再现自身的能力趋于恶化。

资本的矛盾性不仅表现在对待活劳动力的方式上,还表现在对待死劳动力的方式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倾向于增加固定资本,无论是绝对资本还是可变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劳动力资本的增值往往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辩论中关于竞争最激烈的后果。马克思认为,竞争促进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的方式则导致了制度的停滞和危机。让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发生的。

为了增加自身的利润,在竞争的压力下,每一个资本家都被推向创新,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利用更大的规模和分工回报率。承受风险能力、预测能力和其他主观因素是影响资本家战略的关键因素。但是,所有命令是一样的:“积累,积累!那是摩西和先知!”(马克思,1867, ch. 24)

在竞争推动单个资本改革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之后,它继续行动,将这些变化推广到整个经济。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创新,竞争对手就没有选择:要么跟随,要么被迫退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创新企业利润增加,积累速度加快,以小成本为代价增加市场份额的方式已无法赶上竞争的步伐。因此,资本的集中与其说是资本家主观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强制性竞争法则的结果,它迫使每个个体资本增长,以避免死亡。

资本主义积累中兼并和收购趋势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资本集中的过程。在分析这些过程时,马克思(1867, ch. 25)考虑了信贷体系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危机引发的加速。这些集中过程的效果是越来越少的资本家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因此,竞争过程有市场垄断的倾向。

在提升经济资本有机构成的过程中,平均利润率下降(对利润率的影响)。竞争的无形之手在这里展示了资本积累的矛盾性质:创新资本成功背后的利润动机事实上是资本危机的原因。个人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是资本理性的两个方面。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利润率的下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颇具争议的话题。在古典主义经济学时期,利润率的下降是基于经验而被普遍接受的。问题不是用经验证明,而是从理论上解释。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之后,一些批评家和他的观点的支持者主要以经验来解释他的倾向,并作为对实际经济进程的描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试图通过实证检验来驳斥或捍卫他的理论。^①

然而在我试图发展马克思的观点时,这个问题并不属于严格的经验主义,而首先是理论上的。虽然经济倾向可以在经验领域中进行研究,但在马克思的概念中,经济倾向与经验表现并不一致,而仅仅是对实际经济过程的支配。它们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不是由实际发展的经济过程所证明的,而是直接来自资本的矛盾。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部分标题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定律”的研究中,马克思的方法是直截了当的。他首先审视“这样的定律”(第13章),然后是“抵制影响”(第14章),最后是“内在的定律矛盾”(第15章)。通过这种方法,他将这种趋势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必然性,并分析了这种趋势在具体的经济过程中如何与其他或有力量相互作用。马克思没有试图提出一个典型的机制模式来应对危机,或者表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命运。相反,马克思指出竞争

① 实证文献丰富,但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领域,吉尔曼(Gillman, 1957)和玛格(Mage, 1963)的评论揭开了这场辩论的序幕。曼德尔(Mandel, 1975)、马蒂克(Mattick, 1972)和罗森(Rowthorn, 1980)对马克思的概念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实证研究的新动力来自垄断资本方式的发展以及对过度积累、消费不足和利润挤压的争论(Weisskopf, 1979; Wolff, 1979; Moseley, 1988, 1991; Dumenil, Glick and Rangel, 1984, 1985; Dumenil and Levy, 1993; Sherman, 1997; Van Lear, 1999; Goldstein, 1999; Kleinknecht, Mandel and Wallerstein, 1992; Shaikh and Tonak, 1994; Brenner, 2002)。此外,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了对实证研究的兴趣(Kotz, 2008; Roberts, 2009; Kliman, 2011; Carchedi and Roberts, 2013)。

应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一趋势,但不能违反规律本身。^①

竞争的发展和资本包容的过程

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基于资本的劳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以竞争为指导,加强了竞争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作用。

马克思(1864)区分了形式包容和真实包容。前者发生在资本重组,即预设的非资本主义工作过程中,而不是通过工人的具体活动;资本将其逻辑强加于劳动过程中,并允许其所有者将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加以利用。这种类型的剩余价值源于在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之前就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工人们继续做着同样的工作,但他/她的剩余劳动力现在都流向了资本家而不是封建领主。

当资本以资本主义的原则重新组织劳动过程,改变和重塑工人及其工作方式时,就会出现后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形式包容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真实。只有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劳动过程才不断重演。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需要扩张的内在动力系统,产生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后果:技术不断创新;更便宜的生产流程取代旧的、竞争力较弱的流程;大型资本比小型资本更能利用规模经济。在这些过程中,在竞争的控制下,工人的工作逐渐适应了资本的组织原则。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改革的具体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工人本身成为机器的附属物。针对这些倾向,个别工人没有有效的抵制方式,他/她可能会破坏机器——这是指定他/她任务和工作节奏的具体商品,但不能废除控制这些过程的外部力量——竞争。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竞争已经将资本流动的过程引导至两个主要轨迹。一是通过跨越国家边界,把资本强加于不被资本占有的地区,引导资本广泛扩张(所谓的全球化进程)。二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经历了资本、土地、矿物、植物和动物的发展。在竞争的影响下,健康、教育、文化、体育、科学,一切都要转化为商品。

虽然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包容的经济方面,但并不局限于劳动过程,而是适用于整个社会互动领域。资本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竞争是在严格的经济领

^① 有学者研究认为,竞争作为实现这些倾向的机制,由垄断市场形式的发展而得到加强而不是被削弱。

域之外发展起来的。它不再是在生产过程的严格界限内强加于资本的强制性规律,而是存在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竞争就这样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强制和协调机制。

当然,这些趋势并没有自动地出现。通过制度安排,经济政策和主观选择、形式和真实包容、全球化和商品化都可能会得到加强、对比或简单地直接指向特定的轨迹。然而,这些控制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不能将竞争作为资本自我扩张的内在动力。

反对竞争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反对“资产阶级最尖锐的武器”(竞争),他们的答复带有政治色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联合,在许多方面与竞争相反,试图将人民团结起来,以抵制竞争的隔离倾向。然而,与竞争不同的是,这种机制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并不是必要的,其具体运作依赖于阶级意识和政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具体的社会形态时和在他们的政治著作中讨论工人协会的原因。在这些著作中,协会以对竞争的客观、强制性规律的有意识的主观反应形式出现(马克思,1847,1867;恩格斯,1844,1845,1847;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协会可以对资本—劳动关系双方的竞争做出回应,但并不一定没有政治斗争,尤其是当工人协会岌岌可危时。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协会的具体发展实际上受到阶级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制约。协会在资本家当中是自发的(合法的),而在工人中间却存在很多障碍,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必须保密。事实上,联合的权利本身就是工人运动的一场政治胜利,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一结果永远不会被认为是确定的,就算阶级关系允许他们这样做,雇主也随时可能对此提出质疑。

还要注意,在资本主义的具体运作中,在某些情况下工人协会可能会产生稳定效应。正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2010)所指出的,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强制性竞争的影响,工人们有时会设法对从他们的劳动中提取劳动力的方式、形式和速度进行监管。通过捍卫工人的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有助于解决我们已经研究过的由于过度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而产生的矛盾。

但是协会并不仅仅是用来对付竞争的强制性作用的手段,它也是最终从私有财产和竞争中解放出来的新社会的目标。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ch. 2)“这个新的社会秩序是什么样的? 换句话说, 就是废除竞争并用联合取代它。”(恩格斯, 1847)

当然,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像蒲鲁东(1847)所设想的那样, 建立一个由小财产所有者组成的自由联盟, 而是一个由生产者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自由联盟。这些不同的概念实际上是他们不同的竞争概念的直接结果。蒲鲁东并不认为竞争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一种历史机制, 而是一种普遍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私有财产及其延伸到劳动权力的结果。正如他所断言的, “在这里消灭竞争是毫无疑问的, 就像消灭自由是不可能的”(蒲鲁东, 1847, ch. 5)。相比之下, 马克思分析了竞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 批评“社会主义竞争”是一个矛盾(多伊彻, 1952)。在他看来, 竞争可能作为人类互动的一种自然形式出现, 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人性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并随着对资本中所有社会关系的吸收过程而得到充分发展。

马克思(1847B, ch. 2)写道: “蒲鲁东不知道所有的历史只不过是人性的不断变化。”因此, 这个问题不能解释上帝或不可变的人性如何产生资本主义, 而是要了解历史上资本如何将其逻辑强加于社会, 并导致发展出具有竞争力的人性,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人性, 以同样的生产方式塑造了完全不同的人性。^①

蒲鲁东把协会看成对永恒竞争的补充, 是对它带来的不便的一种补救,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建议发展协会用以反对竞争, 反对它的强制作用, 并作为可能废除它的一种手段。

竞争的结束

竞争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马克思去世后批判发展的主线之一。希尔弗丁、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尼古莱·布查林(Nikolai Bucharin)、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列宁等人分析了竞争的历史发展以及市场力量和垄断的实证倾向。根据列宁所说(1917, ch. 1), “把竞争转化为垄断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欧洲, 这一进程已经彻底改变了产业结构, 自20世纪初以来, 卡特尔和垄断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导形式。

^① 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中, 引入了上帝的假设。

与工商业企业一样,银行也受到集中过程的制约。工业和金融市场力量由于两个部门之间相互的渗透而得到加强:通过股权交叉收购,以及银行与企业监事会监事的交叉任用,资本往往集中在一起。经济活动的规划和明确协调取代了旧式的企业分散决策体系。在现阶段,银行在产业政策中发挥明确的协调作用。它们的战略不再局限于单一企业的租金,而是可以协调和规划整个工业部门甚至整个经济体的活动。

垄断的蔓延和银行与行业的融合,导致“金融资本”的崛起。从历史上看,“金融资本”将资本主义的普通工作置于金融寡头的监管之下。垄断和卡特尔现在是规则,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列宁,1917)。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转型对个人资本协调模式造成的后果已经引发了长期争议。考茨基(1914)将这一垄断过程视为结束经济和政治竞争的倾向。在他的“超帝国主义”观念中,他认为在经济垄断之后,竞争趋势将会导致伟大的非殖民主义者联合和结束军备竞赛。然而,希尔弗丁(1910)更准确地发展了这一概念的经济方面。他认为,资本集中和集中化的过程必将导致形成“普通卡特尔”。在这一点上,单一的机构将有意识地调节整个工业所有分支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产量,事实上,这将取消竞争和它在经济中的协调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垄断消除竞争、改变资本积累机制的观点,尤其在“垄断资本学派”中得以体现。^①

然而,这个概念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验方面的。一般的假设是,竞争与垄断之间存在实证关系,前者不可避免地被后者所取代。那么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命运。不过这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的观念。实际上,马克思指出了竞争产生的一些反倾向,它们与集中的主要倾向相互作用。他认为,垄断市场形态的实证发展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这一趋势与反趋势之间辩证关系的结果。这就解释了市场形态演变的复杂动力学特征。垄断资本传统中也承认了垄断机制概念的实证限制。特别是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 2004)指出,在竞争的压力下,现有公司的解体和新公司的建立,在历史上“阻止了任何与希尔弗丁的普通卡特尔相差甚远的争情的形成”。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上的。垄断市场的兴起真的取消竞争了吗?显然,如果

^① 垄断与竞争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受到了克利夫顿(Clifton, 1977)、威克斯(Weeks, 1981)和哈维(Harvey, 1999)等人的批评。

竞争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市场结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巨型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然而,如果竞争被认为是随着资本发展而发展的协调和强制性机制,答案就不那么明显了。列宁(1917, ch. 7)认为,主导市场结构的转变和新的金融寡头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帝国主义不会取代资本主义,它只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自由竞争中崛起的垄断,不能消除前者,而是存在于它之上,并与它相伴随。”

垄断和帝国主义并不是竞争消失的经验证据,而是相反的情况。它们是竞争作为一种强制性机制发展的表现,强制要求资本的增长、合并和在越来越高的资本集中水平上与其他资本斗争。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的暂时或偶然的特征,而是其基本的协调机制。帝国主义降低了竞争市场的实证性作用,但并没有消除竞争作为连接个别资本的机制。竞争作为一种市场结构成为一种例外,但其作为一种协调和强制性机制的作用在更高的阶段发展。

列宁还意识到在扭曲的竞争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的背后还隐藏着科学和政治风险。随着垄断和金融寡头的发展,他注意到,一个神秘的竞争观念也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弊端不是在其内在逻辑中,不是在其一般和必要的管理机制中,而是在其特定和偶然的发展中。垄断和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固有产物,而是令人讨厌的对竞争的违反。金融资本不是资本积累的高级阶段,而是对工业资本积累的一种损害。

在政治辩论中,这个神秘主义的观念表明了对竞争和产业的捍卫,谴责垄断和金融:前者似乎是社会上可取的,而后者则是社会上不合理的扭曲:“基于这些理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小资产阶级批评家梦想着回到“自由”“和平”和“诚实”的竞争中去(列宁,1917, ch. 1)。但是,无产阶级政策的目标在今天不能是恢复自由竞争的理想,自由竞争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动思想,但是废除资本主义至少要完全消除竞争(列宁,1917, ch. 9)。

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完全竞争的神话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的社会融合,社会目标、道德规范、传统风俗和习惯都让位于商品生产和“现金支付”。生产变成寻求利益的一件事,而个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起点——不过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只有在这个阶段,竞争才会显得自然。竞争成为个体与同伴交往的自发方式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行为中,它成为一种社会标准,是规范的基准,远远超出了商品生产的范畴。竞争在学校、体育活动、艺术、写作中变得很自然。对

于科学家来说,最终可以设想一个完全由市场关系和竞争来监管的世界。

这就解释了一般均衡模型如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知识参考。原子化的个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并不被视为几个世纪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而是所有经济现象的最终原因。竞争的历史、社会性质和强制性内容都已不复存在,其作为一种普遍的互动方式,同时也作为人类自由的最高表现形式。

从竞争出现以来,一般均衡模型在科学界受到极大关注。瓦尔拉斯的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和德语,在学术研究方面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尽管这位法国经济学家从未在他的国家担任过学术主席)。像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和所谓的边缘革命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理论一样,他的模型是对资本主义和谐的复杂尝试,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危机的明确学术回应。在这种新的方法中,剥削和阶级斗争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结果消失了,它否定了社会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实体的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有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任何直接的批判,而只是通过方法论的假设否定其范畴。

尽管最优秀的数理经济学家做出了努力,但是这项研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产生严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完全竞争几乎从真正的资本主义中消失了,这是集中过程的结果,也是由竞争机制驱动的。历史上,这些过程发展得非常迅速,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数学方面进展缓慢。正如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所展示的,在最初的几十年后,一般均衡模型至少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模型。

当严格的理论结果最终出现时,它几乎是成功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模型实际上解决的是这个竞争概念的内部矛盾,而不是它的科学有效性。在经济学教学中,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于处理阿罗和德布鲁针对问题的解答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相反,不太受欢迎的是稳定性和唯一性的负面结果,这剥夺了模型的任何实际效用和解释力。

矛盾的是,正是在一般均衡范式走到其经验和理论的死胡同时,它在学术上成为霸主,正如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罗,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德布鲁就可以作为例证。而最为矛盾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奖励了后者在存在帕累托最优问题上所做的贡献,认为他通过对稳定性和独特性的分析,为整个方法的界限做出了贡献。

但这些悖论只是关于经济理论的问题。在政治上,这是新自由主义学说兴起的年代。它明显支持工人的灵活性,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自由流动、竞争胜利的理论现在绝对受到欢迎。人们不再需要现实主义和内部的一致性。目的不是要理解资本主义中竞争的作用,而是要表明竞争对个人有利。对假设

和方法论选择不需要严格审查,只有它们的含义才是重要的:竞争在道德上是公平的(按照边际生产率分配),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福利定理),并且与所有形式的权力和胁迫(二分权力—完全竞争)不相容。^① 这就是完全竞争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的科学证明,即使模型是不真实和不一致的。

当然,如果这个概念只是存在于经济学家和学术期刊中,它不会对实际经济过程产生严重影响。然而,由于科学的社会声望以及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这种“科学”观念强化了竞争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在社会上是可取的。

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合意性标准的定义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阶级关系和剥削的社会需求,只有阶级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经济学通过从阶级关系中抽象出来并定义规范性标准,只不过是社会利益和政治中立的名义来捍卫资本主义利益的笨拙尝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作为这种剥削制度的辩护者。他们的经济理论有助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思想复兴,把它作为一个规范指导施加于整个社会:阶级斗争在这个概念中是废话,它是非科学的,因为它不能中立。竞争是规范社会关系的唯一中立和自然的方式,其社会愿望不是阶级利益问题,而是经济效率问题。

将竞争关系作为社会的必要条件,是意识形态和物质生产漫长而相互冲突的过程,本身就是阶级斗争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员。但是,从历史上看,竞争的神话已经成为一种特权,这得益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资产阶级最尖锐的武器现在掌握在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的手中,它们希望以竞争的名义重塑整个经济关系。在这个神秘的概念中,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政治对抗已经过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认为,社会只能在竞争面前卑躬屈膝。懂得如何与工人和政治对手打交道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说过:“没什么可选的。”

结 论

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关键路径。马克思的科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的竞争观念相违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发展了它的强制性和矛盾性。这个批判表明,竞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科学机制,而是存在其他的生产方式。更确切

① 尽管这些理论成果被用作对“科学的”竞争的辩护,但严格意义上,关于边际生产力和福利定理的争论事实上证明了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和真实资本主义与这些社会愿望标准的距离。

地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存在于私有财产和市场存在的所有经济体系中。然而,在资本主义中,竞争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私有财产和市场将其逻辑强加于整个生产过程中。竞争成为调节这种生产方式的一般机制。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协调机制的运作进行系统的阐述,但其原因和作用是他分析阶级关系和解释资本内部矛盾的核心。竞争和资本积累的辩证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我们关注资本的内在本质,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就表现为资本自我扩张与资本本身存在的障碍之间的对立。如果我们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过程,这种矛盾似乎就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个人理性与阶级利益之间形成对比:通过推动资本积累,竞争增加个人利润,刺激经济发展。然而,通过资本法则,也实现了阻碍资本定价过程,压缩总体利润率,并导致经济危机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竞争的历史发展只不过是资本积累成为独立力量的过程,它脱离了个人和社会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竞争作为一种外部强制性规律,将资本逻辑强加于个人意志上,并定义了主观选择的边际。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工人和资本家可以自由互动,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停止干涉。然而,在社会层面上,竞争根据他们在阶级关系中的角色来引导和限制他们的选择。

作为资本服务的无形之手,竞争将资本积累作为社会的唯一目标。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有种神秘感,但是,完整市场和完全竞争的假想世界并不是个人和社会真正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世界,而是相反:这是资本自治与人类需求和愿望最高的表达形式。在资本主义中,个人的主观偏好和资本的客观需求是不相容的。恰恰相反,这表达了竞争在人际和社会层面上管理人际关系的方式。

以这种竞争观念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力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竞争视为社会理性的基准。由于无法解释其起源,他们将其定义为所有经济关系都应遵循的永恒准则。关于竞争的科学问题即如此从一个实证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规范的问题:问题不在于理解竞争是如何运作的,而在于证明竞争是有效的。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由竞争引起的,而是缺乏竞争所引起的。

为了总结我对竞争的批判,可以回顾一下我对马克思概念的消极重构,作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完整的社会资本概念,就无法把握资本与竞争的关系以及竞争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具体作用。它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永恒的体系,因此,它认为竞争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不需要有科学的解释。它正确地将竞争与指导资本主义发展的“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却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性以及竞争在实现这些矛盾中的作用。它梦想着

一个完全竞争的统治,将其作为个人自由的最好保证,但它不能看到,在这个统治下,唯一自由的其实是资本,它将整个社会逐步地纳入其中。凭借其个人主义方法论,它隐藏了竞争的阶级性质和“协会”对阶级斗争的政治反应的作用;关于工人协会的一切,可以说是它违反了竞争。像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一样,它将竞争视为市场结构,并认为其作用随着垄断的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束而停止。正确追求共同利益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尝试,即“科学地”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最尖锐的武器。

在这种竞争理想化和神圣化的过程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只能拾起老派庸俗经济学的指挥棒。就像后者一样,它“实际上只不过是把资本主义的独特概念(这些概念被竞争所束缚)转化成一种似乎更理论化、更一般化的语言,并试图证明这些概念的正义”(马克思,1894, ch. 13)。但这只是学术界的答案。如果撒切尔真的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行事,我会让英国矿工来判断。如果真的没有其他选择,那就由反资本主义运动来决定。

参考文献

- Armstrong, Philip, Andrew Glyn and John Harrison (1984),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two*, London, Fontana.
- Arthur, Christopher (2002), Capital, competition, and many capitals, in Campbell, Martha and Geert Reuten (eds), *The culmina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3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algrave.
- (2010), Capital in gener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8, pp. 209–212.
- Baran, Paul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London, Penguin Books.
- Baran, Paul and Paul Sweezy (1966),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2012),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Monthly Review*, vol. 64, n. 3. Retrieved from <http://monthlyreview.org/2012/07/01/some-theoretical-implications/> (accessed 1 April 2016).
- Brenner, Robert (2002), *The boom and the bubble—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 Campbell, Martha (1993), Marx's concept of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method of *Capital*, in Moseley, Fred (ed.),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

- examin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 Carchedi, Guglielmo (1993). Marx's logic of inquiry and price formation, in Moseley, Fred (ed.),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 Carchedi, Guglielmo and Michael Roberts (2013), The long roots of the present crisis: Keynesians, Marxians and Marx's law,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 n. 1, pp. 86—115.
- Chattopadhyay, Paresh (1994). *The Marxian concept of capital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Westport, Praeger.
- (2012). Competition, in Fine, Ben and Alfredo Saad Filho (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Marxist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Clarke, Simon (1991). *Marx, marginalism and modern sociology: From Adam Smith to Max Weber*, London, Macmillan.
- (1994). *Marx's theory of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 Clifton, James (1977). Competi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 n. 2, pp. 137—151.
- Cockshott, Paul, Allin Cottrell and Greg Michaelson (1995). Testing Marx: Some new results from UK data, *Capital and Class*, vol. 19, n. 1, pp. 103—130.
- Deutscher, Isaac (1952). *Socialist competition*.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deutscher/1952/socialist-competition.htm#n2 (accessed 1 March 2016).
- Dumenil, Gerard, Mark Glick and Jose Rangel (1984).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 1, *Contemporary Marxism*, vol. 9, pp. 148—164.
- (1985).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 2, *Contemporary Marxism*, vol. 11, pp. 138—152.
- Dumenil, Gerard and Dominique Levy (1993). *The economics of the profit rate: Competition, crises, and historical tendencies in capitalism*,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Engels, Frederick (1844).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df-jahrbucher/

- outlines.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45),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5/condition-working-class/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condition-working-class/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47),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7/11/prin-com.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7/11/prin-com.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84/origin-family/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4/origin-family/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Fine, Ben (1982),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London, Edward Arnold.
- Foster, John Bellamy (1986),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An elaboration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oster, John Bellamy and Henryk Szlajfer (1984 eds), *The faltering economy: The problem of accumulation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illman, Joseph (1957),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Marx's law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Dennis Dobson.
- Glyn, Andrew (1991),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profitability, in Dunne, Paul (ed.), *Quantitative Marx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lyn, Andrew and Bob Sutcliffe (1972),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 London, Penguin Books.
- Goldstein, Jonathan (1999), The simple analytics and empirics of the cyclical profit squeeze and cyclical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Clearing the ai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1, n. 1, pp. 74—88.
- Harvey, David (1999), *Limits to Capital*, New York, Verso.
-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New York, Verso.
- Heinrich, Michael (1989), Capital in general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x's Capital, *Capital and Class*, vol. 13, pp. 63—79.
- Hilferding, Rudolf (1910),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hilferding/1910/finkap/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ilferding/1910/finkap/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Kautsky, Karl (1914), *Ultra-imperialism*.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http://www.marxists.org).

- org/archive/kautsky/1914/09/ultra-imp.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Kleinknecht, Alfred, Ernest Mandel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1992 eds), *New findings in long wave researc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Kliman, Andrew (2011), *The fail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London, Pluto press.
- Kotz, David (2008),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 S.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40, n. 2, pp. 174—188.
- Lenin, Vladimir (1917),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A popular outline*.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llenin/works/1916/imp-hsc/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lenin/works/1916/imp-hsc/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Mage, Shane (1963), *The law of the falling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Its place in the Marxian theoretical system and relevance to the US economy*, Ph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 Mandel, Ernest (1975), *Late capitalism*, London, NLB.
- Marx, Karl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4/manuscripts/preface.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manuscripts/preface.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47A),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7/wage-labour/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7/wage-labour/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47B),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7/poverty-philosophy/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7/poverty-philosophy/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57), *Outline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64),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capital, Draft chapter 6 of Capital-Results of the direct production process*.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64/economic/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4/economic/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67),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

- works/1867-c1/index.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94),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index.htm)(accessed 1 March 2016).
- Mattick, Paul (1959), Value theor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23, pp. 27—51.
- (1972), Ernest Mandel's late capitalism.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ttick-paul/1972/mandel.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ttick-paul/1972/mandel.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Moseley, Fred (1988),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and 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 in the U. S. economy, 1947—67: A critique and update of Wolff's estim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 1, pp. 298—303.
- (1991),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econom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1993), Marx's logical metho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Moseley, Fred (ed.),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 Pilling, Geoff (1980), *Marx's Capit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pilling/works/capital/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pilling/works/capital/index.htm)(accessed 1 March 2016).
-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47), *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or, 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proudhon!_philosophy/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proudhon!_philosophy/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Roberts, Michael (2009), *The Great Recession: Profit cycles, economic crisis. A Marxist View*, Lulu Press, eBook.
- Rosdolsky, Roman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 Rowthorn, Bob (1980),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Shaikh, Anwar (1978),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risis theories, in

- URPE (eds), *U. S. capitalism in crisis*, New York, URPE.
- (1980), Marxian competition versus perfect competi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 n. 1, pp. 75—83.
- (1982), Neo-Ricardian economics: A wealth of algebra, a poverty of theo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14, n. 2, pp. 67—83.
- (1999), Explain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5, pp. 104—144.
- Shaikh, Anwar and Ahmet Tonak (1994),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erman, Howard (1997), Theories of cyclical profit squeez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9, n. 1, pp. 139—147.
- Smith, Adam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trieved from [www. gutenberg. org/files/3300/3300-h/3300-h. htm](http://www.gutenberg.org/files/3300/3300-h/3300-h.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Sweezy, Paul (1942),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Dobson Books Ltd.
- (2004), Monopoly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56, n. 5. Retrieved from [http://monthlyreview. org/2004/10/01/monopoly-capitalism](http://monthlyreview.org/2004/10/01/monopoly-capitalis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Van Lear, William (1999), Profitability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 and forecast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1, n. 2, pp. 46—60.
- Weeks, John (1981), *Capital and exploi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0), *Capital, exploitation and economic crises*, London, Routledge.
- Weisskopf, Thomas (1979), Marxian crisis theory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 S. econom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n. 3, pp. 341—378.
- Wolff, Edward (1979),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and 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 in the U. S. economy, 1947—6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9, pp. 329—341.

第六章



作为权力运转的资本主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ch. 4）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创造和发展社会高压统治与资本主义人际关系的所有要素。马克思的批判表明，它们在不同的本体论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资本。分清资本对社会和个人施加的不同形式的压力和权力至关重要。在这一章中，我将强制与权力的形式放在一起，讨论它们再现的机制，并解释它们在经验主义领域的产生和发展。简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形成了明确的强制与权力本体论。

为了发展这种本体论，激发了我对现实主义哲学的批判。后者着重于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并且捍卫前者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简而言之，方法论选择总是以特定的本体论假设为前提。然而，如果现实被认为以某种方式进行，那么某种调查工具可能是合适的。但如果现实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那么相同的工具可能是错误的。从这个几乎微不足道的考虑出发，批判现实主义发展出了分层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经验实体与管理它们的不可观察实体被有逻辑地分离，并批判那些基于只有实证条件存在的简单本体论的方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种本体论的推理使得马克思开始对资本进行批判，在这种批判中，生产模式（其主要是看不见的经验）的基本社会胁迫形式在逻辑上是分离的，但与在人际关系中出现的权力形式是辩证联系的（至少部分是凭经验可测的）。相反，本体论论据的缺乏是造成新古典主义权力矛盾的

原因。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一种“经验现实主义”本体论为前提,从本质上讲,经验观察到的东西被视为与以下内容是同义词:一种“所见即所得”本体论。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预先假定一个结构化或深入的本体论,其强调实证观察和实际发生的基础,以管理社会结构和机制。简单地说,对于那些像批判现实主义者 and 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致力于结构化本体论的人而言,本质潜藏在外表之下;而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致力于经验现实主义本体论的人来说,外表是全部。然后,两个不同的本体论激发和维持他们不同的权力研究方法论。

因此,我重新考虑经济辩论中权力的基本概念及其与马克思批判中范畴的关系。一般而言,权力是全体员工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在社会科学中,这种权力称为“行动权力”(PTA)。然而,经济辩论主要集中在另一种不同的权力上,这种权力只存在于人际关系中,即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一般被定义为“对某人的权力”(POS)。虽然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由于其本体论的原因而无法解释 PTA 及其与 POS 的关系,并且完全局限于 POS 的分析。这体现在文献中就是双重假设,即 PTA 在社会中的分布给定,并且在一个完整的(瓦尔拉斯)竞争体系中,人际关系中没有权力。这是因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具有天生禀赋的个人可以在许多等同的人际关系中进行选择。因此,如果一个人试图将他/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人,后者可以简单地选择停止与他/她进行互动,而不依赖于他们各自的 PTA。在这种情况下,无论 PTA 的分布如何,POS 都不存在。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关系在本质上被认为是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PTA 在社会中是不对称分布的,这种不对称(对资本主义的日常运作是必要的,与具体的市场竞争性或非竞争性形式无关)确实是造成 POS 关系存在于个人层面上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胁迫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掌握这些形式的社会强制及其与 POS 的关系,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却不能,严格来说,不是由于理论层面,而是由于元理论层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假设,它阻碍了个体理论的发展,并且促进了理论在代理人与他们进行互动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发展。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是权力主张的载体。

我首先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接下来,我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考虑不同权力形式之间的关系。基于 PTA 和 POS 的实际经验概念,我讨论了不可观察的实体,如“约束和调节结构”“胁迫机制”“反权力”和“权力制度”。我用来描述这些本体论实体的分析工具是从决策理论中借鉴而

来的。决策理论是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大多数方法的基本框架,但实际上是一个更宽泛的框架,也可以用来讨论社会类别。对它的使用有助于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进行比较,也可以发展个人和社会类别之间的关系。^①

这个抽象的本体论框架被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权力的具体形式。本节的结构与前面相同。但在这里,PTA、POS 和其他与权力相关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背景下被当作购买力、市场力量和权威等。这种分析依赖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认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本体论实体,其特征是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分离。我的论点是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体系,具有特定的经验表现形式,具有潜在的不可观察的权力结构。

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运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所建立的哲学阵营,由于泰德·本顿(Ted Benton)、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和威廉·奥特维特(William Outhwaite)的贡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了起来(诺里斯,1999)。今天,批判现实主义是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不同学科的运动。

这一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批判现实主义协会、论坛和研讨会数量不断增长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主题有关的学术期刊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已经展现了这一点。自 1998 年起,国际批判现实主义协会出版了一本专门刊物《批判现实主义期刊》。在哲学和经济学的背景下,玛格丽特·阿彻(Margaret Archer, 1995)、巴斯卡(Bhaskar, 1978, 1979, 1996, 1991)、科利尔(1994)、托尼·劳森(Tony Lawson, 1997, 2003)和奥特维特(1987)的著作提供了一些主要的理论参考。阿彻、巴斯卡、科利尔、托尼·劳森和诺里斯(1998 eds)收集了一些重要的读物。史蒂夫·弗莱特伍德(Steve Fleetwood, 1999 ed.)对经济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做出了贡献。批判现实主义观点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受到劳森强烈影响的“剑桥学派”(其中一些贡献出现在《剑桥经济学报》和《社会经济评论》中)。

根据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是基于封闭系统建模的演绎方法论。像任何其他的方法一样,演绎主义预先假设一个本体,从某种

^①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巴特利特(Bartlett, 1989)做出了通过决策理论来概念化权力的尝试。作者的目的是促进在新古典主义建模中正式考虑权力。结果是,他仍然依赖于人际关系的权力观念,并在新古典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在这种新古典主义本体论中没有社会强制的空间。

意义上来说,现实的本质是可以通过演绎方法来研究的。

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少开展本体论论证,但它的隐含本体论是由原子化的、经验性的事件组成的。更确切地说,现实应该由“实际”和“经验”两个领域构成,前者包括事件和事态,后者是人类经历的事件。这两个领域应该是融合的,所以实际的事件按推测与经验并存。因此,现实是观察到的或至少在一定条件下被感知到的,并且通过观察其他(可感知的)事件来提供现实的解释,因为这个本体中没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据说,如果通过观察和记录事件(作为数据)来获得知识,那么只有当这些事件产生某种稳定模式时才能获得广义的科学知识。如果只是产生完全随机的事件,在这种理解下,则无法获得知识。事实上,这些事件产生的模式必须有规律性或恒定性。通常情况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来产生这些事件规律,结果是一个人为封闭的系统。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体制几乎总是开放的系统,即事件规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系统。

相比之下,根据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世界不仅包括事件和事态、我们对它们的经验或印象,而且包括存在的基础结构、权力、机制和倾向,无论是否被发现,这些因素都管理或促进了实际事件”(劳森,1997,p. 21)。

批判现实主义本体论是分层的,由三个领域组成:“经验”“实际”和“真实”(也称为“深层”)。这三个领域被假定彼此不同步,这意味着不可能在经验和事件之间或事件与机制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这种本体论鼓励与演绎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与演绎主义推论模式相比,可观察事件不以其他可观察事件的方式进行解释,而是根据基础结构、因果关系、运作机制及其产生的趋势来解释。这种从现实到深层领域的转变称为“再造”的推理模式。然而,结构和机制不一定单独行事;相反,一般而言,事件或事态是由不同结构和机制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科学问题是确定管理现实的结构和机制,并解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

这些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权力概念。根据批判现实主义观点,权力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三个领域的实体,PTA 和 POS 是实际经验领域中主要的可见形式的权力,然而其隐形机制处于深层领域。因此,方法论问题解释了权力的经验形式与基础结构和机制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在经验现实主义引出的理论中,权力的概念仅限于特定的经验现象。这导致了不同的方法论。事实上,研究经验现实主义中权力关系的最常见方式是,将原子论者作为 POS(方法论个人主义)最终关系的唯一解释单元。

但是,为了封闭这个体系并且使演绎主义适用,原子论者也被剥夺了所有

的真正代理者。因此,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相结合后,一个缺乏分析能力的人,注定只会亦步亦趋,因为没有固有的特性可以改变,从而在不同的时间对相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反应。只有具有原子论构想的经济人才能有相似的反应,并且每一次他都可以预见他将面临的情况。^①

在这种方法论框架内,从经验现实主义本体论出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了狭义的权力概念。

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关系并不明确。如今,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越来越多,显示差异的共存,至少部分不相容的观点共存。

首先,我们要鼓励对这种关系的探索,它由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巴斯卡(1991, p. 143)发展而来。他肯定了“马克思的作品最好地解释了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作品缺失的方法论支柱”。马克思的分析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兼容性在不同层面得到了捍卫,从简单的形式一致性到深层次的元理论统一。汉斯·埃尔巴尔(Hans Ehrbar, 1998)甚至认为马克思在批判现实主义诞生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并提出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逐句翻译成现实主义的术语(埃尔巴尔, 2001)。特别是科利尔(1979, 1989)、肖恩(Sean, 2001, 2003)、弗莱特伍德(2001)和约瑟夫(Joseph, 2001)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另一方面,理查德·甘恩(Richard Gunn, 1989)、凯文·马吉尔(Kevin Magill, 1994)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 1999)提出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之间具有相容性的公开批评。

在布朗、弗莱特伍德和罗伯茨(Andrew Brown, Fleetwood, Roberts, 2001)编写的一本书中,他们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对比与融合的要害。编写者们在开篇中探讨了三个不同的观点。根据弗莱特伍德的说法,批判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哲学的。在他看来,批判现实主义可以提供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中所缺乏的全面的科学哲学,并使我们能够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放在更安全的哲学立足点上。

相比之下,罗伯茨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为批判现实主义哲学服务,并且表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类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而不是把一些

^①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之最——虽然也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做了严厉批评,但从来没有真正参与到主流经济学的权力辩论之中。

批判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类别放在一起。他认为,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

布朗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现实主义中学到的教训是需要哲学普遍性的层面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更确切地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包含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结构因果关系、思想与独立思维对象之间的区别、倾向的概念、结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等。然而,这些概念在其他哲学视角中也受到强调。因此,布朗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接受严格的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而是应该捍卫“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此作为能够接受和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

这里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总体一致性的细节。为达到我的目的,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足够了,并且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它。这足以确定社会胁迫和资本主义权力的基本形式。^①

权力的本体论

为了在抽象的决策系统中有机地讨论不同形式的权力,我们首先必须定义它们的本体论本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些定义可用于表现每个具体决策系统的内在权力形式。但是,首先让我从决策理论的角度来定义一个“决策制定系统”,如:(1)一组“代理人”;(2)他们个人的“决策集”和“目标”;(3)这些个人的决策集和目标之间的关系。

采取行动的权力

PTA 由代理人的“决策集”定义,它详尽地描述了其潜在的行动过程、智囊团或任何能够做出决定的角色。这里没有理由假设他们确切地知道并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决策集和其他决策集。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可能导致偏见和不完善的知识。然而,与此无关的是,代理人是否能够实际承担一系列行为并不依赖于代理人所知道的内容。

^① 在对劳森于 2003 年出版的《重新定向经济学》的评论中,平克斯顿(Pinkstone, 2003)批评作者从社会关系方面界定经济学,但没有具体的权力参考。他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否认资本家和工人有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一定涉及权力。平克斯顿表示,马克思是经济学家,他把社会权力作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解釋的核心。书中后面的内容可以看作试图通过平克斯顿的批评来跟随劳森重新定位经济学。

当然,对现有 PTA 的分析不足以确定代理人会做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对 PTA 存在的分析不能解释代理人如何实施它;选择不仅取决于物质约束(或对它们的看法和解释),而且同样依赖于目标。PTA 只是决策过程的客观方面,代理人的目标定义则是其主观方面。

代理人的目标是根据他们的主观偏好和他们对决策集的主观知识来定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这两个要素都是没有问题的;主观偏好被认为是给定的,主观知识被假定为与客观信息相符(当信息被假定为“不完善”时)。然而,在这个更宽泛的本体论框架中,代理人的偏好可能受到其他代理人的行为和社会背景的制约。另外,信息在本体论中与知识不同;前者在决策系统中是客观存在的,后者则是在决策系统中代理人的主观感知和解释。^①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即使代理人的主观偏好一致,相同的信息也可能会被不同的代理人作出不同解释,导致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目标。

在实际操作中,在给定的时间点,现有 PTA 的衡量标准是由每个决策集中的行动范围定义的。这一标准是事前的,因为它是指行使权力的手段,而不是指行使权力本身。购买力由财富决定,而不是由实际购买力决定,军事力量由火力值决定,而不是由实际投掷的以吨计的炸弹决定。当权力被执行时,对其测量是事后的。就存在而言,这一标准对于事前标准来说仅仅是一个不完美的替代指标:购买力与财富相关,炸弹与火力相关,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即使在实际的经验领域,经验相关性也不是分析这种权力存在的适当工具。

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力

当 B 的选择取决于 A 在其决策集中选择的具体行动时,A 对 B 具有权力。这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况下:第一种,当 A 有一个控制 B 的决策集(在这种情况下,POS 可以被看作改变其他代理人的 PTA 的能力);第二种,当 A 能够影响 B 的目标(通过调整其偏好或知识)。第一种情况描述了客观 POS 的形式,第二种情况描述了主观 POS 的形式。客观 POS 和 PTA 密切相关,因为前者的出现取决于后者在决策系统中的分布。在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系统中,客观 POS 的最强形式是“权威关系”,其中 A 可以命令 B 做某事,并且 B 必须遵守;在约束条件下,A 对 B 的权威表现为 A 将 B 的决策权重重新设置为仅有一个选项的

^① 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中,奥地利经济学派在信息与知识之间形成了这种差异,但同时也假设不存在对个人解释框架的任何外部影响,而偏好被认为是个人素质。

能力。^①

主观 POS 取决于一个代理人调整另一个代理人目标的能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体系中,方法论个人主义通过假设排除了这种形式的权力,然而,代理人目标的定义必然是一个不能排除外部条件的社会过程。目标调节最显著的形式是“操纵”,其中 A 能够意思明确地决定 B 的目标。

在操作上,POS 的现有关系的事前测量必须至少要通过两个维度给出宽泛的定义。前者由行为依赖于 A 所采取行动的代理人的数量给出。后者由 A 的选择对其他代理人的目标和约束的后果的类型给出。这些维度在概念上是独立的:一方面,A 有可能有凌驾于很多代理人之上的权力,但是对每个代理人的权力都很弱;另一方面,A 只对一个代理人有绝对权力,但这种权力关系是最强的,即权威(客观 POS)或操纵(主观 POS)。

主观 POS 不能提供事后措施,因为从概念上讲,在 B 决定之后,B 的目标的起源是不能被检测出来的。如果 A 没有影响其目标,那只有 B 可能知道他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是外部观察者没有经验方法可以证明这种改变会有效地发生,或者相反,B 的目标是由 B 本身(如方法论个人主义者所假设的那样)发展出来的。对于客观 POS,只有当 A 所施加的约束相反时,A 才能提供事后措施,即 A 修改 B 的约束,但 B 不改变其选择,POS 的这种关系不能通过对 B 的行为的经验观察来检测到。对 POS 的逻辑检测能力的这些限制意味着经验主义分析可以最好地揭示 POS 现有关系的子集。

约束结构

个人决策集及其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决策系统的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在集合理论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决策集是不可比较的,在某种意义上,A 可以采取行动 X,而不是行动 Y,而 B 可以选择行动 Y,而不是行动 X。在其他情况下,B 的决策集可以是 A 的一个子集,也就是说,B 比 A 更受约束(A 可以采取排除 B 的行为)。这种不对称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并且可能在决策制定系统或所有决策系统中只考虑少数代理人。当这种不对称存在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决策系统的结构本质上都是“约束结构”:即

① 这个权威的定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把另一个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恩格斯,1872)。它也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定义,虽然在这篇文献中,权威的概念也被称为“层次”“垂直性”或“命令”。在政治著作中,有时用“权力”一词来描述“B 遵守的情况,因为他承认 A 的赞扬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出发点”(巴拉克和巴拉兹,1970, p. 34)。后者的含义来自韦伯(1968)“合法权威”概念,其前提是同意遵守命令。与我的定义不同,这种权威概念是基于决策过程的主观因素。

使 A 对 B 没有直接的权力, A 在结构上比 B 受到的约束也更少。

有了这个术语,我就能强调决策系统的结构对不同的代理人施加了不对称约束。但另一方面,这种结构也可以被理解为能够实现个人行为,而这种行为如果不存在就无法实现。从不对称约束或不对称 PTA 角度观察,这些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与属于特定代理人的 PTA 和 POS 不同,约束结构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约束结构的存在是客观形式的社会胁迫的信号,只有通过对整个决策系统的检查才能理解,当分析单一人际关系时,它们仍然是不可见的。

调节结构

单个目标和相互依存关系确定了决策系统的主观因素。像讨论客观约束一样,这些主观因素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 A 和 B 的目标可能是独立的主观偏好和不同的信息解释框架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可能是由类似甚至重合的偏好和解释框架来定义的。这种相似性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决策系统中所有这些都可以有几个代理人。当存在偏好和解释框架一致时,决策系统的结构本质上就是一种“调节结构”。

像约束结构一样,调节结构是一个社会实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其目标调节不一定归因于任何特定的代理人,而是决策系统的一个总体特征。与约束结构一样,它也是客观的,因为它的存在是决策系统的客观质量。将这些结构放在一起表达了决策系统中的一般(客观)不对称性和(主观)同质性。由于约束结构预示着社会胁迫的客观存在,调节结构的存在就是社会胁迫主观存在的信号。

胁迫机制

当约束结构或调节结构在时间上保持相对稳定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发现机制的再现和演化。为了在决策系统中重现一般的不对称性或同质性,这些机制必然涉及一些一般形式的强制。我称之为“胁迫机制”。

“社会胁迫”是约束结构或调节结构与再现机制的结合。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种结构都是客观的,所产生的社会胁迫形式可以分为:第一种情况,当强制通过客观约束施行时;第二种情况,当强制通过主观目标施行时。

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胁迫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不仅反映了决策系统在一个时间点上的一般不对称性或同质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再现不对称性或同质性。这只有通过全局和动态地查看决策系统才能领会。

反制机制、反倾向和反权力

除胁迫机制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机制干预约束和调节结构的复制,并可能加强或对比现有胁迫机制的运行。这些机制的存在可能是独立于决策系统的一般存在条件或过程的内生产物,这是现有胁迫机制的后果。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机制才具有科学的相关性,并且是权力本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它们只是在决策系统中扮演简单的外力。当这些机制发展成对某些胁迫机制的内生反应时,我称之为“反制机制”。与胁迫机制不同,它们在权力本体论中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要条件,它们的具体发展只是由胁迫机制的存在而产生的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作为对其他机制的反应,反制机制也预先假设有意识的行动。它们不会自动产生。

反制机制的总体效果是对照胁迫机制的倾向,而产生“反倾向”。具体来说,这是通过产生 PTA 和 POS 的新形式或通过改变现有的权力形式而发生的,这与胁迫机制管理的权力形式相互作用。实际经验形式的权力的具体发展是通过这些倾向和反倾向的相互作用来规范的。

这种双重对立机制——反制机制和反倾向,并不一定产生反对意见,事实上是不同的本体论层面:偶然机制和倾向是深层领域的实体,而 PTA 和 POS 是在实际经验领域中发生的。原则上,权力的形式由反制机制所控制,可能会削弱或加强约束和调节结构。为了区分这些权力形式,我称之为“反权力”。只是这些权力与约束和调节结构的强制作用相反,而反制机制也可以支配胁迫机制和调节结构的权力形式。

实际经验领域的反权力是由深层次的反权力机制造成的,但是它作为反权力角色并不是深层次领域的胁迫机制与反制机制之间对立的直接结果,而是这种反制机制在实际经验领域影响的结果:胁迫机制往往会在约束结构中再现对称性并在调节结构中再现同质性;而反制机制倾向于产生形式权力和反制权力,这可能加强或削弱这些不对称性和同质性。也就是说,反制机制和反倾向是必要的,但不是发展反权力的充分条件。

反权力并不是简单地弱化决策系统中的社会胁迫形式,而是构成决策系统的内部动态因素,可能会产生稳定或不稳定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反权力可以促进决策系统的再现;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成为其不稳定的潜在原因,并最终导致危机。

权力系统

当我们讨论一个特定的决策系统作为一个权力系统时,我们并不只是简单

地指出 PTA(和最终产生的 POS)是否被精确定义。我们的意思是存在约束或调节结构和一些胁迫机制(最终有一些反作用力)。这是使决策系统成为“权力系统”的原因。

A 的 PTA 和目标可能受到完全不同的因素的影响:它们可能受到整个 PTA 和目标系统演变出的强制机制的倾向的影响,而与 POS 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结果是一组具体的决定,那么不同情况之间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这表明权力分析不能归结为 POS 研究,因为如果两个代理人是权力系统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可以是非对称 PTA 和同质偏好,解释框架可以通过非个人化的结构和机制系统地复制,而不一定引起 POS 关系。这也表明,在一个权力系统中,POS 并不代表决策系统中一种基本的权力形式,而仅仅是一种管理 PTA 和 POS 的整体复制的、一般形式的社会胁迫的表现形式。

权力系统的这种抽象定义可能适用于非常不同的具体情况。它基本上是从个人和人际权力的一般结构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胁迫。它可能是经济关系的特征,也可能是性别或种族关系或任何其他社会互动和重塑机制领域的特征。

这种一般的社会胁迫概念绝不直接取决于经济中的剥削概念。恰恰相反,社会胁迫的存在提供了这种社会不对称和产生经济结果的可能性,就像剥削一样。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换句话说,社会胁迫是剥削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例如在资本主义中,种族关系、性别关系与阶级关系和剥削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也具有自主性。这些关系施加的权力和胁迫形式远远超过经济剥削的严格结果。

另外,如果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下解释这个抽象本体,并且考虑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条件,那么剥削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社会胁迫的根本动力。正是这种经济关系在每种生产方式中具体塑造了社会胁迫的形式。尽管在逻辑上,剥削的存在取决于社会胁迫的存在,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剥削成为社会胁迫的基本经济动机。

但现在是时候从一般权力系统的讨论转移到考虑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了。

资本主义权力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马克思,1867,1885,1894)并不是从孤立的个体开始

的,而是从商品开始的。^① 商品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显著社会关系。物质的东西并不存在于它们自然的商品中。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们才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

商品类别包括私有财产和市场的类别。私有财产是一种社会关系,定义了社会中的一系列义务和权利及其在代理人中的分配。因此,私有财产的存在意味着以行动权力(PTA)的形式存在的权力关系。^②

在市场上,商品得到了社会评估(价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交换。商品交换改变了社会的义务和权利体系,即改变了各个 PTA 的体系。私人 and 私人市场的并存形成了 PTA 在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即购买力。在易货交易中,各方直接交换他们各自的 PTA 商品。相反,在货币交换中,一方拒绝具体的 PTA(处置特定商品的权力)并接受货币,即未来获得商品的权利。因此,货币可被视为对商品的抽象 PTA。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私有财产和市场不足以描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商品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从货币流出的行动权力(PTA)的抽象形式也采用 POS 关系形式,是劳动力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直接人际关系。更广泛地说,劳动力的商品化将预先存在的剥削模式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在这个过程中,私有财产成为资本主义财产,其特征是个人差异和社会不变性,并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约束结构为形式。

该过程也改变了预先存在的约束和调节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往往融入劳动过程 and 全社会。社会中存在的家庭、性别关系和其他客观不对称现象被置于资本治理和胁迫机制之下。这些客观的过程也伴随着主观偏好和解释框架的转变,最终改变了人性。

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这些客观和主观因素的演变被视为辩证关系。然而,阶级关系在所有可能的约束和调节结构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因为它们资本主义剥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社会结构不同,阶级关系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要特征。其他结构与资本主义胁迫这种基本形式相互作用,并加入

① 马蒂克(1993)认为,资本从商品开始只是因为马克思旨在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常以商品开始),但真正的理论出发点是阶级关系。这种解释与由恩格斯(1886)提出并由米克(1976)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历史解释相反,资本结构反映了从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到正常资本主义的理想化时期生产。对这种解释的早期批评是从巴纳吉(Banaji, 1979)和史密斯(Smith, 1990)开始的。对于《资本论》的重要性的分析,参见皮林(1980, ch. 4)。

②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特别是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Veblen, 1934),塞缪尔斯(Samuels, 1979 ed., 1984, 1994)和施密德(Schmid, 1987)对财产带来的经济强制进行了调查。克莱因(Klein, 1992)以及达格和谢尔曼(Dugger and Sherman, 1994)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制度主义在权力和阶级分析中的关系。

其他形式的胁迫,不仅是作为独立的过程,而且是作为与剥削过程辩证联系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解释了以资本主义剥削为特征的社会胁迫的基本形式之后,才能连贯地发展的原因。

因此,让我从作为私有财产和市场的 PTA 形式的购买力开始,然后发展 POS 的主要形式和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权力体系的不可观察的结构和机制。

表 6.1 资本主义作为权力制度

本体论	权力本体论	资本主义权力本体论
实际经验	权力行动	购买力
深层	权力超过某人 约束结构 调节结构 胁迫机制 反制机制	权威(生产) 市场力量(流通) 阶级关系 上层建筑 竞争 协会

购买力

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所有社会都存在购买力。在资本主义中,私有财产和市场的核心作用使购买力成为经济中 PTA 的基本形式。它取决于产权分配和定义每个代理人预算约束的一系列价格。一般来说,代理人的决策集定义了代理人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在市场关系中,购买力决定了代理人可以购买和不能购买的内容。

代理人购买力之间的量化差异,是衡量经济领域现有 PTA 不对称性的因素。^①在资本主义中,这些量化的不对称性也产生了一种质的不对称性:一方面,有人认为,由于他们缺乏购买力,必须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有购买力,可以用它作为资本,购买别人的劳动力,进而从中获利。

在关于权力的经济辩论中,这种一般形式的经济 PTA 完全被忽视。所有作者都直接关注经济 POS,而没有发展这些本体论中不同形式的权力之间的关系。鲍尔斯和金蒂斯(1994A, p. 301)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示:“通常来说,购买力在我们的使用中根本不是权力,因为在竞争经济中获得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包括使用制裁。”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个奇怪的术语悖论,取决于他们对 POS 而

^① 在制度主义传统中,舒尔茨(Schutz, 1995)讨论了购买力的不对称分布作为 POS 市场关系的潜在原因。然而作者并没有把这种不对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是 PTA 的兴趣。并不是他们的理论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强制的某些重要方面,而是作者没有找到任何逻辑关系。这些在本体论中是不同的实体(以及它们与控制它们的不可观察实体的关系),在他们的权力理论中,购买力和社会中的不对称分配根本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财富可能会使 POS 只能被分配给代理人一小部分。例如,当金融市场不完善时这可能会出现,但鲍尔斯和金蒂斯(1994A, p. 301)表示:“财富所有权对于持有短期权力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

权威和市场力量

POS 在生产和流通中有着不同的形式:在生产中,它采取权威关系的形式;在流通中,它采用市场力量的形式。

权威

虽然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但购买力不对称)在市场上相遇,但是在一个人出售劳动力而另一个人购买它的过程中产生了 POS 生产中的直接关系。生产中的这种权力关系并不是由流通领域的不平等交换造成的,而是交换这种直接涉及人的商品的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主义观点的支持者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否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任何真正的不对称,理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就像其他市场关系一样。新制度主义者,如科斯、威廉姆森、哈特和摩尔都批评了这个观点,因为前者涉及正式的权力,而后者则是无权力的。而鲍尔斯和金蒂斯遵循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观点,资本—工人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市场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市场关系可能涉及权力。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本体论中,这些概念是错误的和误导性的。

当一个杂货商卖掉一公斤咖啡时,他/她卖出了自己的一份财产,并转让了他/她的劳动价值。当一个工人卖掉他/她的劳动力时,就剥夺了他/她生活的一部分,以及向其他人交换其他商品的权利,直接涉及人际关系。资本家为了换钱而获得的 PTA 本身就是 POS。他给予工人购买力并且从中获取凌驾于工人之上的权力。显然,权威关系并非绝对的,因为像任何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使用受法律和制度规则的制约。然而,在现行规范中,经济 POS 是经济 PTA 赋予的对任何商品的所有权。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威并不是由最终存在的不完善所引起的,而是将劳动力纳入商品统治时期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生产方式的特征。

POS 在工作场所中的这种关系可能是社会不对称的最明显的表现,这迫使

工人屈服于人际关系本身的资本主义权威,就像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方法所预设的那样。虽然公司内部的关系通常为权威的形式,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不对称是调节生产进程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真正必要条件。相比之下,在一个代理人的企业中下达命令,进而要求另一个代理人去执行,执行的方式虽然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方式,但根本不是必要的,只有当资本家和工人确实产生了直接的人际关系时才会发生。权威关系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劳动进行规范的基本模式,但是纪律机制在历史上是可变的,并不一定会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产生如此公开的对抗。

例如,考虑一下合作企业,在这里,工作场所中的权威被削弱甚至消失。但这并没有减轻工人对资本的依赖,也没有消除对资本的征服。生产资料的阶级垄断变得非个人化,但不会停止。劳动报酬不再像传统资本主义企业中那样受到资本主义监管者的约束,而是受到市场价格的动态影响,这使得合作企业的工作能够自我组织,向资本靠拢。在市场胁迫机制的直接引导下,形式上的权力被自律所取代。利润正式消失,但资本所有权所赋予的剩余价值权,仍然是企业合作的重要动机。“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为市场生产商品的工人合作社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自己的资本家,“他们将被驱使通过市场竞争去积累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形成自己的品牌,以投资新的生产资料,这些新的生产资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反抗的机会来满足市场上的生存条件”(麦克莫利,1993, p. 181)。

在资本主义中,工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过程,而是一个在资本规律下发生的过程。工人可以没有资本家,但他们需要资金来开始合作生产。他们可能通过贷款来获得资金,或者合作本身可能就是资本家为了摆脱监督这一烦人角色的倡议。但是,预期资本报酬将是工人的剩余价值。

劳动纪律可以由个人或非个人的手段来管理,但对工人的剥削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形式的企业中,显然是没有权威的。工作场所中的具体权力只是社会不对称的体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是必要的。劳动过程中个人间的无权力关系,并不能带来所有工人在资本面前平等的基本条件:因为他们不受生产资料的限制。

市场力量

在流通领域,只有通过价格体系进行一定的控制,代理人才能影响他人的行为。因此,市场力量是POS流通中的经济形式。它被定义为卖方/买方价格高于其他卖方/买方价格的权力。这种经济权力形式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主义,而是基于私有财产和劳动力市场交换的所有制度的潜在特征。特异性资本

主义存在资本集中趋势,随之而来的是现行市场结构转向垄断。

将权力和市场力量作为 POS 的经济形式,并且脱离资本主义的一般结构和机制,似乎只是理论上有可能性,而不是强制的基本形式的经验表现,在其具体的历史发展中这不是严格的经验法则,因为实际经验形式的权力与它们所控制的机制是“不同步”的。只有当这些权力形式与资本主义必要的本体论实体相联系时,它们才能在生产和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趋势的结果,而不是其特定的经验表现形式。显然,权力和市场力量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不必要的。然而,在资本主义中它们起着支配生产和交换的社会结构与机制的重要作用。

在形式层面上,作为经济 POS 的形式,权力和市场力量都以购买力为前提,成为经济 PTA 的一种形式。为了拥有生产权或流通权的市场力量,首先必须拥有购买力,原因很明显,如果没有购买力,就不能以任何价格购买劳动力或任何其他商品。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要解释如何购买权力,另一方面要解释权力和市场力量如何不断地相互转化,转变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和机制。

资本主义结构

资本主义约束结构的特点是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所有模式都采用资本整体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就需要一种社会形式通过购买力在社会中的不对称分配来运作,使得一个阶级自愿地为另一个阶级工作。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没有系统地讨论如何在资本主义中界定社会阶级。^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的,它具有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两个类别的结构,在对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中(马克思,1847B,1852;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马克思毫不犹豫地考虑了更多的阶级。这就对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理论地位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资本论》中,根据经济学的解释,阶级只是在经济结构方面通过每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界定,在对具体的社会阶级进行分析时,还必须考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这种解释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一方面分离了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区分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似乎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可以纯粹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有效地界定。特别是尼古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73,ch. 2)认为,阶

^①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一个专门讨论这个主题的章节。然而,其目的似乎更多是要指出定义的问题,而不是为这样一个问题提供蓝图。

级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特征,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经济结构。^①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人口与劳动力买卖双方的经济分离足以确定这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并不是要将社会阶级缩减为经济约束的不对称,而是要认识到购买力的不对称分配是资本主义结构定义的一个基本方面。

有了这些警告,资本主义结构的特点就是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抽象地说,私有财产和市场可能没有阶级划分。然而,生产资料的阶级垄断是发展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运作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劳动力买卖双方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就不会存在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因此,社会购买力的不对称分配不仅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是制度再生的必要条件。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是平等主义,但如果社会上购买力的分配是对称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甚至都不会开始。

从约束的观点来看,只有一类人被迫卖掉劳动力,雇佣劳动才有可能存在。硬币的另一面是另一类人能够购买劳动力。这是资本主义约束结构的重要不对称(资本家可以称之为“有利结构”);工人受到购买力不足的制约,资本家却能够拥有它。

这种社会不对称的经济结果是阶级剥削。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一定通过 POS 的直接关系来实现,而是通过将 PTA 社会塑造成约束结构来实现。

封建主由于他/她的直接权力而获得了他/她的农奴的产品的一部分(还有更多)。他们之间的 POS 关系是剥削强加于封建社会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占有的价值只不过是他的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普遍剥削的一种功能,但与他和自己工人的权力关系并不直接相关。他们的 POS 关系不是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手段,而且甚至可能像合作企业那样消失。与封建主义不同,这里的剥削是通过约束结构来强加规则的,而不是通过 POS 关系。

资本主义上层建筑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个人可以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自由行事,但

^① 普兰查斯(1986)、科莱蒂(1972)批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正统观和拜姆斯坦的修正主义将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的其他社会结构分开,并认为马克思的“经济领域”实际上包含观念和物质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产生。在发展科莱蒂的解释时,萨耶尔(1987)认为,对于分裂力量和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好像提到了不同的经验现实,预先假定了一个与马克思无关的原子论本体论。

是在他们的物质生活模式下形成意识是有条件的(马克思,1859,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第一部分)。这意味着主观偏好和解释框架,如客观约束,会受到社会交往形式的影响。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这些客观和主观的过程被视为资本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一部分。^①

上层建筑的作川及与来自经济基础的社会强制形式的关系,是由葛兰西(1929—1935)发展出来的。在他的批判中,革命领袖讨论了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它们在阶级关系的再生与演变中的作用。他指出,这种辩证关系并不是机械的或预定的,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开放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加强的胁迫趋势可以通过反权力形式的发展、社会斗争实践以及社会解放进步进行具体对比。在他的政治策略中,他坚持上层建筑的作用,强调经济基础的改变。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颠覆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些斗争在经济领域不产生影响,那么它们的革命作用将仍然是有限和无效的。

毫无疑问,这种辩证观点对权力的经济辩论没有影响。但是,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下,葛兰西的贡献也并不总是得到准确的发展,有时还会导致过度强调上层建筑,并将经济基础的辩证性淡化。

在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思想中,剥削的逻辑关系是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和超结构)中权力的本质或非必要形式的关键。这不是关于机械生产模式的先验假设。它不是一个上层建筑,而是正如一些对马克思的批评者所主张的,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胁迫力量进行本体论调查的结果。

从理论上讲,即使仅通过再现其调节结构,权力系统也可以自我复制,而没有任何约束结构。例如,道德、宗教或文化实际上可能为代理人的主观偏好和解释框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以便引导他们的选择和行为,再现社会中存在的不对称性和同质性。然而,这些(上层建筑)权力系统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后果。因此,当资本主义实际发展时,它们必须与规范剥削进程的胁迫共存。即使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它们自己的发展也因此资本规律下发生了转变。像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它们被归入资本。在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们可能发挥重要的强制作用,但只有考虑到它们与资本主义强制的具体形式的

^①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制度学派特别研究了权力关系塑造个人目标和解释框架的机制。加尔布雷思(Galbraith,1983)分析了三种形式的权力:“权力是威胁的结果”“补偿性”(权力是通过奖励获得的)和“条件化”(权力是通过改变个人的信仰行使的)。前两者在给定的偏好和解释框架内运行,第三种则转变为主观因素。达格(1984,1989)着重于研究企业将其价值观和文化强加于社会的过程。在经济辩论之外,这个问题是由克莱因(2000)提供的丰富的实证证据来说明的。

相互作用时,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作用。相比之下,作为纯粹的自主力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它们根本就不是必需的。

从伦理上来看,虽然它们可能表现为一组基于历史和国家间差异的永久性原则,但迄今为止,所有道德理论都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而随着社会倾向于阶级对抗,道德则一直是阶级道德(恩格斯,1877, ch. 9)。在资本主义中,对资产阶级道德的肯定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统治的结果。虽然道德体系有自己的再生机制,但这些机制在与阶级关系再生机制接触时会发生转变。一种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并不仅仅是由于重复不对称的阶级关系,并将统治阶级的道德强加于整个社会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主观权力和调节结构的分析中,我们也必须讨论它们与约束结构所表达的社会胁迫形式之间的关系的原因。

竞 争

调节资本主义关系再生的主要机制是“竞争”。竞争是随着市场形成而诞生的,但只有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竞争才成为资本主义的具体再生机制。换句话说,竞争的存在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结果,但只有在资本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总体协调和强制机制。

资本的发展和竞争的发展实际上是分别从整体资本角度和个人资本关系的角度来看的。从历史上看,这并没有造成剥削,而是通过将这种过程置于受竞争管制的资本主义框架中,而改变了原有的阶级社会及其剥削模式。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成为整个社会融资的手段。它的运行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往往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中发展,即使在文化、道德体系、政治和宗教的再现中也是如此。作为社会资本包容过程的载体,竞争也转变了指导主观偏好和解释框架复制的价值观和规范,将其阶级性质置于其上。因此,竞争是主观内化的,并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非常人性化的特征。

在对资本主义约束结构的再现中,竞争是资本的无形之手。它通过执行一般资本规律来调节个体资本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这些包括剥削在内的规律在竞争之前就已存在。竞争只是在资本积累的具体过程中,通过在资本主义剥削过程中指导个人的行动来强制。科学问题是,这些规律在竞争的统治下是看不见的,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有通过资本的整体分析才能发现。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竞争通常被视为一种事态(奥地利经济学派将市场视为发现过程)或者一个过程(新古典主义竞争)。然而,与权力一样,这些观念只会将实际经验现象与现象本身混淆。在将实际经验与深层次领域分开的分

层本体论中,竞争被更好地理解作为一种因果机制。

一般而言,“竞争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最重要的表现”。然而,在阶级社会中,这场战斗“不仅是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而且也是在这些阶级的个体成员之间进行的”(恩格斯,1845,ch. 3)。这两种战争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竞争管理阶级关系再生的具体方式,并使其成为制约结构的形式。首先考虑阶级之间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就像任何其他战斗一样,强者往往获胜。不难理解,工人和资本家的力量并不一样,因为前者必须为了生活努力工作,而后者则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阶级之间的不对称程度也影响着阶级的竞争,在弱势阶级,即工人方面,竞争往往更为激烈。反过来,这种不对称又加强了阶级之间的不对称程度,因为一个阶级内部的竞争越强,整个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就越弱。

阶级之间的不对称竞争会调节工资和失业状况。它将工资推向维持生计的水平,并在资本增值需求[即所谓的“劳动行业后备力量”(马克思,1867,ch. 22)]方面创造了人口结构性剩余。这些倾向强烈地阻止了工人试图脱离雇佣劳动。虽然不排除个人的社会流动,但无数个人的社会效应受到了限制。作为一个整体,这些过程必须不断地重复,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出售他们的劳动力。这是社会胁迫的基本形式,使得剥削过程受到动摇。

这一资本积累的趋势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胁迫形式与竞争的最终缺陷无关。它们是正常的内在结构性后果。在新古典主义模式中,清算市场可能无处不在。然而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中,劳动力市场永远不会消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会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寻找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是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中,正是竞争导致了它。

协 会

“协会”与社会生活一样古老。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且自从原始共产主义的第一种形式以来就存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作为强制机制的竞争的崛起,其经济作用发生了变化。作为反作用机制,协会通过竞争并作为对它的反应而发展。它以一只可见的手,由社会统治的形式,反对资本看不见的手,将社会分为孤立的个人——一种反对非人格化竞争机制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

像竞争一样,这种有意识的(反馈)行动在阶级关系中发展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自身也成为阶级机制,并且在阶级内部或者外部运行。

在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协会和竞争相关联,并且倾向于产生联合形式,其中

阶级冲突和每个阶级的不对称力量都集中在协会。公司和其他最终形成的制度形式是阶级利益冲突的具体例子,而不是利益冲突的终结。但从定义上讲,在阶级制度中,没有办法真正全面地协调对立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跨级协会只是通过将阶级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对称内在化,简单地扼杀了阶级斗争和公开的阶级冲突的爆发。因此,尽管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对称作用,但跨级协会在内部权力关系方面在结构上是不对称的。

协会在阶级内部与竞争形成对照。在两个阶级之间,它引导同一阶级的成员合作以对抗他们之间的竞争效应。在跨级协会的情况下,它的社会效应是将原先被竞争分离的阶级重新联合起来。然而在这里,协会比较关注的是同一阶级的成员,而不是对立阶级的成员。约束和调节结构中的阶级不对称在这里产生了在每个阶级内部协会发展方式上的不对称。在一定意义上,协会更容易并且自发地在阶级关系的主导中产生,然而它在主导方面会遇到更多障碍,其中阶级内部的竞争是协会的最大障碍。

在资本家方面,协会导致正式组织或非正式协议的形成,其整体效应是在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中强化资本家阶级。这种趋势加强了在阶级关系中竞争的不对称影响。资本家协会与竞争朝同一个方向发展,表现为资本对劳动力的主导。

工人之间的协会倾向于削弱资产阶级最尖锐的武器,削弱竞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强制作用。从阶级不对称的角度出发,协会与竞争在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上产生影响。通过工会、政治协会和阶级斗争,工人们可以公然对抗这种生产方式的约束结构,并且改善与资本的一般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形式的集体权力可更好地理解为“反权力”。

这种权力和反权力之间的并列并不是竞争与协会之间对立的结果,而是将竞争和协会与约束结构相互作用的方式相结合。竞争,作为执行资本剥削的机制,加强了资本的社会胁迫。具体地说,它通过调节和约束结构的再生来实现。相反,协会对竞争的反应产生了集体PTA的形式,可以加强或削弱约束和调节结构。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描述那些像权力和反权力一样出自协会的PTA。

与竞争不同,协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真正必要的,它可能在资本—劳动关系的一边,或者两边都有,或者两边都不存在,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的沃尔玛模式下,工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有用的。

通过抵制竞争,协会可以对制度再生产生稳定或不稳定的影响。例如,考

虑工人协会的影响。通过反对竞争“过度开发”劳动力的趋势,协会像一股稳定力量那样行动,这样有助于劳动力的再生和剥削过程的持续发展。然而,通过对比从劳动力中提取活劳动的最大限度,可以发现它往往会压低剥削率,从而加强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协会也是一种机制,这种对抗权力的制度是前所未有的,它既是所有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也是将竞争的胁迫机制与资本主义目标进行对比的手段。这是一个新的社会,没有剥削、执行机制和相关形式的社会胁迫。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竞争的胁迫机制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权力制度,在这种制度下,PTA 和 POS 的分配在竞争规则下不断重现。这些规则是资本强加的社会形式手段,是执行剥削过程所必需的强制。

这种形式的社会胁迫是资本主义权力本体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客观的,它的存在确实取决于对立阶级的某些代理人的具体研究。它仅凭借经验是不可见的,并且只能靠科学调查。其不可见的原因是竞争。后者实际上倾向于分离个体并使它们彼此独立。因此,它们倾向于掩盖自己的社会角色,并赋予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形成一种自由的人际关系。

这个权力系统的反制机制是协会。与竞争不同,这种机制通过产生可见形式的集体 PTA 来运作。矛盾之处在于,一旦竞争的强制作用变得不可见,这些在本体论中甚至不是实体的反势力就会成为权力的源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些 PTA 并不是作为对资本主义胁迫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反动力量,而是作为一种无权力体系中的权力原因而出现的。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概念中,工会不是保护工人免受资本胁迫的工具。它们是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其后果是失业、就业租金和权力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发展中,社会强制的基本形式往往与其他形式的权力和强制并存,而这种权力和强制对于资本主义权力制度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种族关系、性别、政治、宗教和其他客观或主观社会分歧因素可能与新形式的权力和胁迫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强制力有关。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并不依赖于阶级关系,而是重新进行塑造(并为塑造做出贡献)。这就是研究这些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抽象出来的权力可能会造成误导的原因。

让我举一个粗略的例子。在基于性别或种族关系的理论方案中,从阶级关

系中进行抽象。撒切尔在英国的首相职位或奥巴马在美国的总统职位——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黑人达到了这个职位,反映出平等主义和真正的民主出现了。然而,如果考虑到阶级关系,那么他们登上英国和美国政治权力的顶端,就是可疑的,因为这会降低英国女性和北美黑人(黑人和妇女)的角色地位,他们将继续遭受双重压迫。也许性别和种族关系在抽象的反性别歧视和反种族主义上、在个人政治生涯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这只能证实,在资本主义方面,这些社会分裂在阶级关系上是次要的和无关紧要的。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工人都知道,撒切尔夫人和奥巴马先生根本没有表现出社会中被剥削和被支配所产生的反权力,而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积极参与阶级斗争,与工人、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进行斗争。^①

在政治上,这种不考虑资本主义胁迫基本形式的权力方法论本身就面临各种机会主义。“积极地歧视”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和黑人资产阶级打开了权力之门,但并没有改善甚至可能恶化女性和黑人工人的客观条件。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可能坚持认为,一个女首相和一个黑人总统是决定性的民主化步骤,但是,是女权主义运动和黑豹党,而不是撒切尔夫人和奥巴马先生,将因争取英国妇女权利和美国黑人自卫而被铭记。

结 论

经济力量在资本主义中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只考虑人际关系的表象,而权力关系是以 POS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限制发生在没有对影响社会中 PTA 分布演变的因素进行调查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原因在于经验现实主义本体论,它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为了反对这个观念,我利用批判现实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下权力关系的复杂本体论,一种与管理它的结构和机制相联系的经验 and 可观察权力形式的本体论。根据马克思的方法和分析,我已经表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体系,其中 POS(市场权力)的形式取决于 PTA(购买力)在社会中的分布。这些显著的权力形式,是现有约束结构(以阶级关系为特征)所造成的社会胁迫关系现象与强制机制(竞争)之间关系的表现。除了这些基本形式的权力和胁迫之外,我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其权力和强制形式是由它的调节结构(上层建筑权力)所产

^① 威尔逊(Wilson, 2011)提供了一个在马克思和葛兰西的阶级框架中如何发展种族关系的清晰示例。他批评了分析种族压迫的进步学者,将其从经济剥削中剥离出来,并讨论了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发展,将其作为阶级关系转型的一部分。

生的。而且我已经提出,受竞争强制机制支配的一切形式的权力都可以通过反制机制(协会)的发展来对比并最终被废除。

这种本体论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的神秘概念可能是自由形式权力关系的局限所在。问题不仅在于瓦尔拉斯竞争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且在于这样一个假设的系统,如果没有由结构和机制所控制的、在经验上不一定能觉察得到的社会强制形式,就无法表达和复制自己。主流的本体论不一定是凭经验可以检验的。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考虑不到这些形式的社会强制,因为更一般来说,它不允许区分形式和实质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表象和本质。然而,如果资本主义关系是权力关系,那么不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上必然出现,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制度。

参考文献

- Archer, Margaret (1995), *Realist social theory: The morphogenetic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cher, Margaret, Roy Bhaskar, Andrew Collier, Tony Lawson and Alan Norrie (1988 eds), *Critical realism: Essential readings*, London, Routledge.
-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Baratz (1970), *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naji, Jarius (1979), From the commodity to capital: Hegel's dialectic in Marx's *Capital*, in Elson, Diane (ed.), *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r in capitalism*, London, CSE Books.
- Bartlett, Randall (1989), *Economics and power: An inquiry into human relations and marke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haskar, Roy (1978),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Press.
- (197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Press.
- (1991), *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Oxford, Blackwell.
- (1986),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 (1993),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Verso.
- Bowles, Samuels and Herbert Gintis (1990),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 vol. 18, n. 2, pp. 165—222.
- (1994A), *Power in economic theory*, in Philip Arestis and Malcolm Sawyer (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Brown, Andrew, Steve Fleetwood and Michael Roberts (2001), *The marriage of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 Happy, unhappy or on the rocks?*, in Brown, Andrew, Steve Fleetwood and Michael Roberts (eds),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Colletti, Lucio (1972), *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Colletti, Lucio (ed.),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 Collier, Andrew (1979), *Materialism and explanation in the human sciences*, in Mepham, John and David-Hillel Ruben (eds),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 (1989),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ocialist thought*,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1994), *Critical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 Creaven, Sean (2001), *Marxism and realism: A materialistic application of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2003), *Marx and Bhaskar on the dialectics of freedom*, *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 vol. 2, n. 1, pp. 63—93.
- Dugger, William (1984), *An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retrenchment*, New York, Petrocelli Books.
- (1989), *Corporate power*,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Dugger, William and Howard Sherman (1994), *A comparison of Marx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8, n. 1, pp. 101—127.
- Ehrbar, Hans (1998), *Marx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University of Utah. Retrieved from www.criticalrealism.com/archive/hehrbar_mcr.pdf (accessed 1 March 2016).
- (2001), *Critical realist argument in Marx's Capital*, in Brown, Andrew, Steve Fleetwood and Michael Roberts (eds),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Engels, Frederick (1845),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5/condition-working-class/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condition-working-class/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72), *On authorit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72/10/authority.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2/10/authority.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77), *Anti-Duhring. Herr Eugen Du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77/anti-duhring](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7/anti-duhring)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86),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86/ludwig-feuerbach/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6/ludwig-feuerbach/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Fleetwood, Steve (1999 ed.), *Critical realism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 Galbraith, John (1983), *The anatomy of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ramsci, Antonio (1929—35), *Prison notebooks*.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gramsci/prison_notebooks/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gramsci/prison_notebooks/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Gunn, Richard (1989), *Marxism and philosophy: A critique of critical realism, Capital and Class*, vol. 37, pp. 86—116.
- Joseph, Jonathan (2001), Five ways in which critical realism can help Marxism, in Brown, Andrew, Steve Fleetwood and Michael Roberts (eds),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Klein, Naomi (2000), *No Logo*, Toronto, Alfred A. Knopf.
- Klein, Philip (1992), Institutionalists, radical economists, and clas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6, n. 2, pp. 535—544.
- Lawson, Tony (1997), *Economics and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Magill, Kevin (1994), Against critical realism, *Capital and Class*, vol. 54, pp. 113—136.
- Marx, Karl (1847B),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7/poverty - philosophy/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7/poverty-philosophy/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52),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52/18th-brumaire/](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2/18th-brumaire/) (accessed 1 March

- 2016).
-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59/critique-pol-economy](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9/critique-pol-economy)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67),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67-cl/index.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85),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85-c2/index.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94),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index.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45), *The German ideolog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5/german-ideology/index.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index.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Mattick, Paul Jr. (1993), Marx's dialectic, in Moseley, Fred (ed.),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 McNally, David (1993), *Against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 market socialism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London, Verso.
- Meek, Ronald (1976), *Studie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Norris, Christopher (1999), Roy Bhaskar interviewed, *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 vol. 8.
- Outhwaite, William (1987),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Realism,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 Pilling, Geoff (1980), *Marx's Capit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Re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pilling/works/capital/index. 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Pinkstone, Brian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New horizons, Review of 'Reorienting economics' by Tony Lawson, *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 vol. 2, n. 1, pp. 149—155.
- Poulantzas, Nico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Verso.
- (1986). Class power, in Lukes, Steven (ed.), *Pow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Roberts, John (1999), Marx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Capital and Class*, vol. 68, pp. 21—49.
- Samuels, Warren (1979 ed.), *The economy as a system of power*,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 (1984). On the nature and existence of economic coercion: The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Lee Hale and Thomas Nixon Carver,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18, n. 4, pp. 1027—1048.
- (1994). Property, in Hodgson, Geoffrey, Warren Samuels and Marc Tool (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Sayer, Derek (1987), *The violence of abstra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chmid, Allan (1987), *Property, power, and public choice: An inquiry into law and economics*, New York, Praeger.
- Schutz, Eric (1995), Markets and power,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9, n. 4, pp. 1147—1170.
- Smith, Tony (1990), The debate regarding dialectic logic in Marx's economic writings,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30, n. 3, pp. 289—298.
- Veblen, Thorstein (1934), The beginnings of ownership, in Ardzrooni, Leon (ed.),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 Wilson, Carter (2011), The dominant cla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oppression: A neo-Marxist/Gramscian approach to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25, n. 1. Retrieved from <http://lsdonline.org/55/the-dominant-class-and-the-construction-of-racial-oppression-a-neo-marxistgramscian-approach-to-race-in-the-united-states> (accessed 1 March 2016).

第七章



结束语

斯蒂格利茨(1993)在他为《经济视角》撰写的题为“后瓦尔拉斯和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中,基于缺陷和交易成本,明确地讨论了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激进方法与主流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些方法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使用相同的方法和假设,并且基本上处理相同的问题。他认为,差异仅在于术语: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在解释经济现象方面发现剥削和权力等概念是无用的,而且他们会担心在分析中产生的这种情绪化的术语。但这可能正是为什么激进的经济学家选择使用这样的话“他们希望通过分析来激励行动”(斯蒂格利茨,1993, p. 112)的原因。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剥削和权力是“感情用语”而不属于科学范畴。相反,他认为效率——新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关键词——作为一种价值观并不令人惊讶——反映了自由的概念。^①但这只是一个结论,价值判断只有在打破构成文化霸权的信仰时才容易做出。否则,尽管社会研究中纯粹客观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争议的问题,但它们可能表现为中性。^②

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蒂格利茨的效率工资理论更多涉及剥削而不是效率,因为生产的增长并不是通过投入不变获得的,而是通过增加劳动者的劳动并提取劳动量来实现的。

② 多布(Dobb, 1973)在马克思主义中讨论了所有经济理论的必要思想内容。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米达尔(Myrdal, 1964)也许是最能说明实证和规范经济学中所引入的不同层面的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而社会需求一般被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的。然而,这个等式因其哲学上的弱点和它所包含的价值判断而受到批评(豪斯曼和麦克弗森, 1996)。巴勒莫(2005)讨论了价值判断在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两个主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规范性研究中的作用。

除了这个考虑之外,我完全赞同斯蒂格利茨在后瓦尔拉斯研究计划中一些关于方法的一致性的结论。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与马克思的关系。在这本书中,我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了对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本体论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我已经表明,马克思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是从商品开始的,是在一个基于商品生产的历史系统中;而其他则从个人开始,是在一个完整且完美市场的抽象系统中。马克思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类别的逻辑和历史的发展,辩证地开展他的批判;其他人则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演绎,他们描述了逻辑上和历史上与资本主义发展无关的过程。我认为这些方法论的选择是以不同的经济本体为前提的:一种是分层的,另一种是权力的经验形式与支配它们的不可观察的结构和机制之间的逻辑分离;一种是纯粹的经验,另一种则是权力和竞争,并根据 DMC 中存在/不存在的缺陷,探讨经济关系的范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竞争——根据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说法——是资本主义的强制机制。

现在从我的批评中总结出一些一般的结论。首先,我想质疑后瓦尔拉斯激进主义的存在理由,讨论纯粹形式的意义,以此来证实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这个问题不是纯粹学术性的。以不能或不愿意为由继承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严肃的做法。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权力和胁迫的社会运动时期,激进的后瓦尔拉斯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即权力是一种简单的人际关系,为了个人的方便而自然发展。其中一些人因其理论贡献而获得了声望和学术权力。但只能靠其他人,而不是反对资本链的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希望发展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第二个含义:无论如何,这种方法都是加大而不是缩短了经济理论与社会斗争之间的差距。今天,这个差距是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有机统一的战略定义的主要理论障碍之一。因此,总体而言,我试图提出资本主义作为权力制度的概念,从而重新调整科学研究和政治斗争的方向。

相反概念中的正式相似之处

马克思

试图解释资本主义运作及其胁迫形式所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是,这种生产方式是神秘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剥削性隐藏在竞争的背后。因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他的理论和政治对手的简单

回答。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现实神秘化的表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合理化的方式——且科学地解释了支配这种生产方式的机制,倾向于产生神秘的外表。马克思批判的复杂性源于双重的科学目标:发现资本主义关系隐藏的剥削性和胁迫性,并解释它们如何表现为自由与平等。这两个问题都导致深化竞争的作用以及与资本的关系。

在他的著作中,方法论和本体论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并得到明确继承和发展。分类选择和开发分析的方法是本体论推理的后果:与所有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首先必须再生产。像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这可能不是永恒的。但是它以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事实表明,再生产机制确实存在。那么科学的问题就是发现它,并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鉴于整个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这种再生产制也必然具有历史性质。

出于本体论的原因,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范畴。他很快注意到,商品的生产取决于不断需要出售劳动力的那一类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结构,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体论实体。明确考虑它们的必要性与其具体的经验形式没有多大关系,但首先是内部一致性:经济模型必须包含允许经济再生的机制。

在马克思的批判中,竞争是调节这一进程的机制。更确切地说,竞争调节了个人资本在整个资本增值过程中的关系。在分析这些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表明,竞争产生了一些矛盾倾向,这些倾向使得体系的再生越来越成问题,并为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对竞争的讨论始于其历史起源,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之前,由于劳动力,私有财产和市场产生了。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即私有财产的扩大和市场对劳动力的扩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竞争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阶级维度的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往往包含所有的人类活动,并将活劳动置于其指挥之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将其逻辑强加于扩大的社会关系领域,并趋向于成为整个社会的“协调原则”,即这种生产方式的“外部强制性法则”,它改变了先前存在的客观和主观形式的强制法则和人性。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资本主义权力关系进行适当的讨论。权力关系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发展的,而是嵌入资本主义权力体系中。只有在解释了塑造人际关系的社会不对称和再现这些关系的强制机制之后,才能掌握其必要作用。否则,它们在无权力情况下可能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

在人际关系层面上,竞争的强制性本质表现为指导市场参与者的无形力

量。工人没有义务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他的劳动力,资本家也没有义务寻求最有利可图的生产和更便宜的技术。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前者就不能获得生存资源,后者就会被赶出市场。因此,马克思对竞争市场的研究不是试图看到人际关系如何处于没有权力和强制的体系中,而是一种方法论的选择,旨在分离出这种强制机制在资本主义运作和再生产中的作用。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努力将竞争理念作为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驱动力:斯密、蒲鲁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和后瓦尔拉斯主义者后来发展出这种概念的不同科学变体。但他们忘了批判资本,其结果就是庆祝无形之手,将其作为服务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自然机制,违背了权力的概念。然而通过发展对资本的有机批判,马克思表明,事实上这只看不见的手只能服务于资本的需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共同利益是资本的好处,竞争只是将资本需求强加给个人、社会阶级和整个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无形的竞争之手就是资本的武装之翼。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

相比之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和更普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从任何本体论推理出发,两者很少明确地讨论方法论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性接受仅仅是科学威望的问题,这是在学术界受到关注的一个条件。与其他方法不同,事实上,方法论个人主义在主流经济学中被普遍接受,并且不需要任何科学的反驳。

后瓦尔拉斯本体论不是为了发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类别而建立的。对系统的再生性条件未进行调查。相反,本体论被认为是方法论选择的间接和隐含后果。没有太多的哲学讨论,本体论个人主义被认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一个隐含的前提。

分析的起点是抽象模型(后瓦尔拉斯模型),而不是真实的历史。问题不在于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和再生的,而是解释如何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引入权力关系。因此,关于权力的辩论基本上是纯逻辑的练习。这些理论充其量只能通过新的假设来解决后瓦尔拉斯模型的问题,而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真实历史中权力关系的本质。

在这些前提下,需要在特定 DMC 中相互影响的个人之间的不对称性中,寻求权力关系的最终存在。人性和不完善成为无法解释的普遍原因。社会阶级在经济工作中不起重要作用。它们可以被明确地正式化——作为经验同质的人群——或者被隐藏。然而,它们只是多余的附属物,因为模型中甚至没有

它们。

在后瓦尔拉斯本体论中,权力关系的本质只能在人际关系中被发现。通过建立,后者只能通过引入缺陷来实现权力内容。在这个本体论中,没有任何社会强制和权力关系的空间,权力关系只能作为完全竞争性互动而存在。权力的概念因此将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其基本前提,其研究成果不过是完全竞争模型的补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来:从一个神秘的竞争概念出发,发展出另一个神秘的权力概念。

令人奇怪的是,关于权力的学术辩论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来自激进派,他们的代表人物经常肯定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发展出马克思的观点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相反,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批判性地采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然后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得出结论。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的方法是无力的和模糊的,只有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方法才能克服其内部限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性崛起——对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性影响的学术反应——被认为是普适性经济学方法的诞生,甚至马克思也应该转向这一方法。这是“激进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考虑。这种新的学术“异端”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必然结果,或者被谴责为科学的谬论。(“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型马克思主义者给自己贴上的标签。)

不幸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能单独使用。当您采用其方法时,您会采用其隐含本体论和思想前提。其结果是,同样的说法——资本家对工人拥有权力——在马克思的概念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在这个观念中,证明经济关系可能涉及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设。“缺陷”和“具有不同内在特质的个体”是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基于自由契约和纯循环的隐含本体论中选择的内容。在玩这个游戏时,在交换之前,鲍尔斯、金蒂斯和其他后瓦尔拉斯学者们没有发现比假设工人反对资本家更好的不对称性,因而解释了为什么在交换之后,后者对前者有权力。

他们的故事从个体工人的优势开始,资本家对他/她有权力,但只是因为工人的初始优势是货币化的。工人所面临的权力关系似乎是由于他/她对资本家的有利地位,而不是相反。现实就如此颠倒过来,就像在庸俗经济学古老的神秘概念中一样。尽管后瓦尔拉斯主义者并不喜欢剥削概念,但在这种理论中,剥削者最终可能是支付地租的资本家,肯定不是获得它的工人。

但是要充分把握这个神秘的概念,我们必须在工人终于摆脱与资本家的权

力关系的那一天跟随工人：在资本家引进新机器的那一天，这台机器管理着工人的劳动、他们的工作速度和彼此之间的协作模式；同一天，工人失去了信息优势、收入或者工作。然而对于瓦尔拉斯激进分子来说，这是工人从资本家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的一天。现在，他/她终于可以离开资本家而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了他/她的劳动力之外，已经失去了一切），这便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自由。

为了表明资本家拥有对工人的权力，后瓦尔拉斯主义者认为个体工人并不是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的人，相反，他/她是这个阶级中享有特权的人，还有着其他的东西（他/她的信息优势）。在马克思观点的彻底颠覆中，个体劳动者的权力关系不是由对他/她进行剥削的阶级所造成的，而是由他/她在这个阶级中的特权地位所造成的。简而言之，在这个理论中，工人不是因为他/她的社会弱点，而是因为他/她的个人力量而产生权力关系。

一些激进分子可能对他们的结果与马克思的批判之间的形而上的相似性感到满意。然而，他们的科学观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庸俗经济学家（实际上只是将资本家的概念）翻译成更加理论化的语言”一样，并试图证实这一概念（马克思，1894，ch. 13）。

作为权力仆役的经济学家

1968年的运动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激进革命运动之一。那些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和世界各个角落进行权力斗争的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社会：他们想要一切，他们要求将“不可能”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唯一手段，他们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黑人权力、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战、反核武器主义、反禁止主义、生态保护、人民的自主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成为集体批评和政治斗争的对象。在工作场所、学校、街头和监狱里，无处不在的制度化权力受到了质疑并引发争执。罢工、占领、自发组织、文化、音乐、艺术、体育等成为集体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统治形式的一种手段。随处可见的反权力，是为了改变这个阶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除资产阶级霸权文化的强制性，重新思考社会交往规则。

在西方社会，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首次在社会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入了工人的主张，在激进的批判和社会解放的过程中与民权运动形成一种融合。学生运动破坏了学术平衡，让所有社会科学中的主流思想产生了激进的反应。在美国，这些过程导致激进学校的诞生，这是一个基于普通的进步政治目标而

不是一般方法和概念的学术项目。

关于权力的学术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被社会矛盾和公然的政治斗争所迫害的社会学家们被要求采取立场：一方面，试图掩盖现有形式的权力和胁迫的理由或理性；另一方面，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想方设法削弱或取代他们。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一些进步的学者已经开始了这种理论练习，并希望的主流经济学中“恢复”马克思。

像旧的修正主义一样，后瓦尔拉斯激进分子正式宣布同情马克思，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抛弃了他的方法和批判。后瓦尔拉斯主义者没有发展出可能使社会上集体斗争一致的理论，而是发展了一个权力对个人有利的框架，集体行动只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垄断形式。学生和社会要求批判性思维，攻击所有制度化权力，包括学术层面，“激进”教师和研究人員试图通过制定一个理论框架来回答：（1）世界上最伟大的集体斗争浪潮似乎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上没有根据的对一个虚构的胁迫世界的反应；（2）唯一严格的权力科学与孤立的个人则为自己而战。

为了肯定这一普遍的权力观念，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工作。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抽象的、有效的框架，并已将其应用于所有社交互动领域，从杂货商采购到国际关系。特别是激进派推动了这一观念并得出结论：权力关系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像科学家一样，也被嵌入一个由权力关系所统治的社区，并通过特定的规则和机制再现自身，其作用是塑造和选择科学生产。在他们看来，即使在学术界之外，这也是广泛的意见。大学是进行批判性思维、科学自治和研究自由卓越的地方。科学严谨和技术技能，而不是权力关系、阶级利益和文化同源性，才是学术成功的关键。在走上一条矛盾的科学道路之后，证明了这种学术方法在权力方面的最后一个矛盾，这种方式伪装成预言性的：权力无处不在，包括学术界。

历史上，大学教授一直不倾向于批评赋予他们经济特权和社会认可的权力制度，相反，他们对各种经济和政治权力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1931年，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意大利大学宣读了法西斯誓言，在1200多名院士中，只有12个人拒绝了（因此被取消了他们的职称）。而当今，欧洲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被重新定义，在所谓的“博洛尼亚进程”的国际协调下，为了满足国际资本重组的需求，研究人员再次温顺地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因此，在市场化的大学制度中，权力关系的作用并不是很弱：显然政治权力的侵蚀性较小，但仅仅是因为大学已经处于经济力量的严密控制之下。

虽然大学系统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机制运作和复制，但它们在科学和文化

生产中都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只有在不承认其社会和经济角色的科学家的领导下,大学才能被视为“自由的”,科学才能被认为“中立的”。只有这样,一个科学家才能认为,他的权力理论的成功与现实中存在的权力关系无关。然而,对知识分子最尖锐的批评并非偶然,这是由葛兰西提出的,他在法西斯监狱中为这种激进思想和政治连贯性付出了代价,而不是作为一个相信科学中立、进步的经济学家。

葛兰西(1925—1935)解释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任何人类活动可以排除任何形式的智力参与”。因此,他的批评不是关于知识分子,而是关于这个职业范畴的社会功能。在革命战略中,关键问题在于创造出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阵营”,其形式主要有“积极参与实际生活”、参与群众的社会斗争、表达社会运动的感受等。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对传统知识分子及其内在的保守主义发挥革命作用。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在阶级关系之外发展起来的,并且会在不同的阶级文化和实践之间产生公开冲突。没有意识形态的抵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容易占上风,成为全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甚至主流阶级也会用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认同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在葛兰西资助的周刊(*L'Ordine Nuovo*)的标题下,有一个口号“教育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所有的智慧。激励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所有热情。组织你们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们所有的力量”的原因。

对于葛兰西来说,“文化霸权”不是自由竞争文化的结果,而是阶级斗争双方的政治策略。

科学家的善意或恶意是无关紧要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兴起是这个霸权主义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征。把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变为主流经济学,也是文化霸权在科学中发挥作用的体现。这些项目并不是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排除在他们所定义的严谨科学之外。由于科学的严谨性和中立性,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假装比马克思飞得更高。如果不理解这只是他们霸权进程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会显得科学中立。

后瓦尔拉斯激进派不仅错过了他们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还甚至不理解他们实际上扮演的政治角色。在他们的“中立”权力观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符合工人的利益,客观上的需要(对资本和其主人)加快了工人的步伐和整体努力,这仅仅是为了后者的自身利益。这是左派经济学家在撒切尔和里根开始新自由主义计划时所肯定的。

虽然后瓦尔拉斯主义者可能相信他们的学术成功只是科学问题,但是当学

术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中大学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相联系时,就会出现一种更为线性的解释;这种做法的吸引力不一定在于自称的科学优势,而是在于它能够将更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纳入新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的更便利的框架之中,从而使其免于一切颠覆性和革命性内容。

1974年,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兴起之前,鲍尔斯写了一篇题为“作为权力仆役的经济学家”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社会关注经济学家的巨大可能性”,如果他们决定与社会运动合作,并批评“传统经济学家”,那么他们将分为两类:一类是“工程师”——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其他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来为大型企业合理化生产和扩大利润。另一类是“牧师”,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了一个稍微有用,但是没那么重要的意识形态角色,他们的作用是混淆社会问题的根源,将不平等和层次结构定位在人的本质(偏好)或者自然状态(技术)下,从而否认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可能性。

经济学家很难在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基于工人努力自发最大化的权力理论,并且在经济效率的原则下,才能期望两者兼得。

重新定位斗争

资本主义作为权力制度或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概念——无论是通过权力还是通过竞争——对经济研究和政治斗争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在第一个概念中,研究和斗争的方向应该是改变制度、约束和调节结构以及强制机制。协会和集体行动是反权力的物质基础和对比竞争的方式。社会和政治斗争威胁着资本主义势力。工人的团结是个体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的联合是改变工作场所和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具体方式,更普遍地说,被压迫者的联合是对抗和废除压迫的方式。

在第二个概念中,权力是个人的问题。权力关系是旨在从交易方获得特权的个人选择。这是一种分裂、不团结的个人策略。工人联合会只是一种垄断形式,反权力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整个理论框架只不过是把“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作为一个永恒的真理,甚至没有把它看作一个阶级策略。恺撒(Caesar)关于分裂的名言不再被视为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暴政策略,而是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

从这些普遍的差异出发,让我总结一下。我在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权力制度的政治问题上有一些话要说。

阶级斗争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希望实现阶级斗争的终结;阶级斗争在这种方法中简直荒谬。首先,在瓦尔拉斯本体论中不存在阶级关系;其次,斗争的概念与这种方法无关。

当然,社会阶级可以作为任何微观经济模型中的统计总量被引入,但不能在本体论中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ch. 1)认为“迄今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则认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历史,而且是根据帕累托改进而演变,碰巧上升到人际关系。

在这种方法下,即使是集体行动也成为个人的问题。再次引用激进的后瓦尔拉斯主义领导人的话:工资不仅是执行手段,也是通过集体行动赢得的奖品。例如,将种族、性别或族裔差异排除在外的一组工人可以提高工资(鲍尔斯和金蒂斯,1990, p. 197)。

在这个框架下,工会首先不是抵制资本的手段,而是在资本主义斗争中打败其他工人的策略。集体行动不是获得解放的做法,而是歧视的原因。面对来自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关系的许多权力和压力,瓦尔拉斯之后甚至没有人试图解开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并最终建议如何与多种形式的压迫做斗争。相反,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斗争方式,在这个斗争中,受社会歧视的群体在其他受压迫的群体中发现他们的敌人,而不是他们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即资本。

根据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观点,集体谈判、罢工、占领和在阶级斗争历史中的其他所有做法都是非理性行为和对共同利益的侵犯。将社会的真正转变归因于学术方法显然夸张了。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工资、集体谈判权和工人权利(包括斗争权利)的直接攻击正是这样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实施的: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而是作为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技术解决方案。

这种做法的结果显然是,只有明确抵制这些过程的尝试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因此被谴责),而过程本身显得自然且经济有效。如果在一个国家要工作40~45个小时,这是技术性事件,是国际竞争力强加的外部条件,每个人都应该迅速适应。但是如果工人为了缩短工作时间而进行斗争,那就是无效率的,会损害整个国家。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从阶级斗争中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在方法上排除了一般的斗争。的确,在这种做法中,系统被视为会自动改变并假定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的愿望,因此通过斗争改变它既不合逻辑也不可取。

在后瓦尔拉斯的框架中,问题是在现有的规范和约束条件下定义一个最优

策略。但是,这些规范和约束的转变问题是无法提出的。社会不对称不仅未被否认,而且被视为应当。个体理性被定义在这些社会不对称中,显而易见的结果是革命实践——或者简单地说,试图改变现有的不对称——显得非理性。在现有的规范和约束条件下,这种方法建议工人為自己着想,当他/她的同事罢工时去工作,甚至与他/她的同志分离,成为资本家的特殊合作者。这就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的工人理性。

但在社会斗争中,问题不仅是利用和平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改变了这种关系,为今后更深层次、更先进的斗争奠定了基础。根据社会变革的观点,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新古典主义者的怯懦,而是根据一个集体项目动态定义的。如果历史环境需要,即使是违反规则的选择也可能是完全合理的。

符合规则的“阶级斗争”是任何保守派的梦想。这就等于放弃一条战线,以便在另一条战线上前进。这种“斗争”只会加强现有的权力平衡,几乎不会扰乱它。然而从历史上看,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或者说所有被剥削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往往是通过打破现有规则而获得的。

只有当挣扎的过程具体地阻碍了权力制度的运作时,后者才会被迫深入改造,改变制度化规则,重新界定压迫和压迫者的一套职责和权利。只有当一个权力系统再生机制形成时,另一个世界才成为可能。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可能会教导我们,这些斗争与帕累托效率是不相容的。但是没有人会认为阶级社会可能通过帕累托改进而消失。

反权力

第二个政治问题是,可能通过发展斗争来颠覆资本主义权力体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后瓦尔拉斯本体论中,权力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对不完善的经验持有不同意见,但当经验背景类似于完美的DMC时,权力是缺位的。因此,权力只是偶然的、可能的,不是必需的。因此,权力和反权力之间的本体论区分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或非必要的实体。

所有形式的权力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原因:缺陷。工人的工作权力与资本家的解雇权相同,承租人的权力与出租人收回公寓的权力具有同等的尊严,人们捍卫其土地的权力等同于外国军队占领的权力。在这个概念中,以不对称的规则或直接的行动来维护一个弱者是非理性的。所有权力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强者胜。

然而,权力和反权力的区别在经济研究和政治斗争中都是决定性的。从概念上讲,权力直接来自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机制(可以通过占权力制度主导地位

者的自觉行动来加强);反霸权只是作为主导者有意识的反应而出现。这种概念上的差异预示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观点,其中管理该制度的结构和机制不是无权力的,而是发挥不对称的强制性作用。在这个制度下,并不是要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重构,而是强化资本主义权力和强制的形式和策略;当规则是对称的而权力关系不对称的时候,并不难预测谁会变得更强大,谁会变得更弱。

在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保护权力关系中弱者的必要性被认为是社会互动的构成要素。明确的不对称规则经常被引入以平衡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对称条件。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反权力的斗争,而不是由于超级政治哲学家的设计。

权力和反权力之间的本体论混淆只是满足了权力制度主导的需要:它表明工人的罢工和资本家的停工是一回事。

权力和反权力的理论与实践分离是制定推翻权力制度的总体战略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的力量是由资本主义剥削形成的,其真正的危险性来自改变这种阶级关系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停产、罢工和纠察、破坏、抵制、占领、工人的自我管理、无产阶级反抗剥削等形式的斗争既加强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力量,也加剧了资本化。但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不仅限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为反权力创造了许多可能性。在工作场所、学校,在捍卫权利、保卫领土、保护地球、文化、音乐、艺术、体育、法律方面,资本都可能受到攻击和削弱,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意识的行动和组织。

这是发展反权力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权力不同,反权力不会自发地产生,当它在这个神秘的制度中实现时,立即就会对自由竞争的神圣规则发起攻击。打击资本主义权力制度的核心力量越大,越不注意资产阶级的“普遍”价值观和违法行为的根源。结果,进行社会谴责和政治镇压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权力制度内的斗争是一个比人之间的斗争更为复杂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今天已成为反权力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除了枷锁之外一无所有时,反权力就成了一种必需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客观强制随着社会资本的逐步融入而增加,但“激进思维”是在主流文化和科学竞争的神话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当资本自由流动时,它倾向于征服整个社会。但它也表明,在任何资本发挥其强制性的地方,社会都不遵循学术教义。它自我组织,并在资本面前自我辩护。

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提出一个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总体框架,为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反资本主义斗争赋予连贯性和有效性做出贡献。我也建议,经济学家能够在革命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只要他们开始认识到即使是

他们所谓的中立科学也已经是斗争的一部分。我希望我对新古典主义方法及其政治作用的批判,将有助于学生和研究人员重新思考社会学家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但我完全知道,只有实践,而不仅仅是靠书中论道,才能产生葛兰西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果你有耐心一直跟随我的论点读到这里,那么现在该是停止阅读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 Bowles, Samuel (1974), Economists as servants of pow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 2, pp. 129—132.
- Bowles, Samuels and Herbert Gintis (1990),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8, n. 2, pp. 165—222.
- Bourdieu, Pierre (1984), *Homo academicus*, Paris, Minuit.
- Colonnetti, Gustavo (1973), *Pensieri e fatti dell'esilio* (18 settembre 1943—7 dicembre 1944), Rom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 Dobb, Maurice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Ideolog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nzi, Roberto (1997), *L'universita italiana e le leggi antiebraiche*, Roma, Editori Riuniti.
- Gloria-Palermo, Sandye and Giulio Palermo (2005), Austrian economics and value judgements: A critical comparison with neoclassical economic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 1, pp. 63—78.
- Gramsci, Antonio (1929—35), *Prison notebooks*.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gramscilprison_notebooks/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Hausman, Daniel and Michael McPherson (1996), *Economic analysis and mor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1894),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Retrieved from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

trieved from [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 - manifesto/index. 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index.htm) (accessed 1 March 2016).

Myrdal, Gunnar (1969), *Objectivity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alermo, Giulio (2011), *L' universita dei baroni ; Centocinquant'anni di storia tra cooptazione , contestazione e mercificazione*, Milano, Punto Rosso.

--- (2012), *Baroni e portaborse : I rapporti di potere nell' universita*, Roma, Editori International Riuniti.

Stiglitz, Joseph (1993), Post Walrasian and post Marxia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 1, pp. 109—114.